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



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

第一章 威力巨大的核武器

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的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时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如人们常说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在通常情况下，核武器还指由核弹头及其投掷发射系统组成的武器系统。核航空炸弹由重型轰炸机运载和投掷；弹道核导弹弹头和巡航核导弹靠导弹的推进系统携载和投掷；核炮弹的发射系统是大口径火炮。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拥有第一颗原子弹起，核武器就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支柱。提起核武器，就不能不谈到半个世纪前那震惊世界的一幕：美国用刚刚拥有的两颗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那是核武器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实战运用。

一、美国的“男孩”和“胖子”震惊了世界

1945年7月，美国已抢先制造出了三颗原子弹。一颗用于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沙漠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另外两颗，一颗是铀弹，长约2.5米，直径0.71米，重4.1吨，外形细而长，取名“男孩”；另一颗是钚弹，长约3.3米，直径1.5米，重4.5吨，外形浑圆，取名“胖子”。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法西斯德国已宣布投降。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尚在负隅顽抗。

1945年7月25日，美军代理总参谋长托马斯·T·汉迪给关岛战略空军司令下达了由总统杜鲁门批准的使用原子弹空袭日本的指令：“美国陆军战略空军关岛司令斯帕茨将军：第20航空队、509混合大队应于1945年8月3日以后，在气候许可目视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特别炸弹：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

（一）“男孩”把广岛夷为废墟

8月6日2时45分，第509混合大队的三架B—29型重型轰炸机从美国在太平洋的空军基地提尼安岛起飞。

第一架叫“伟大艺师”号的飞机上，载着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和他的仪器，以便实地测量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和破坏范围。

第二架编号“91”号的飞机上，坐着圣母大学物理学家拉里·约翰斯顿博士，他带着“快速”实验照相机，将用16毫米的彩色胶卷，拍摄原子弹爆炸时的火球和烟云以及破坏现场。

第三架是这次飞行编队的主角“埃诺拉·盖伊”号飞机。驾驶员是第509混合大队长保尔·蒂贝茨上校。

6时5分，飞机从硫磺岛加油后飞向日本。15分钟后，助手军械师帕桑斯爬进了弹舱，用15分钟为“男孩”完成了最后的装配工作。

8时9分，广岛目标在望，此时，飞机已经过2000多公里飞行，比预计到达广岛的时间只晚30秒钟。

8时15分零5秒，“埃诺拉·盖尔”号飞机载的“男孩”从9900米高空投下，在广岛上空约600米处爆炸，飞机投弹后急转150度，并加大速度脱离。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在往返整个航程中，未遇到敌机。在目标上空，只有几十发不准确的高射炮弹的射击。炸弹投下后约50秒爆炸，接着是一团火球。广岛上空有一团直径约4.8公里的深灰色蘑菇状烟云，随后，上升到高空。爆炸当量约2万吨。

威力巨大的原子弹给广岛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广岛是日本的第八大城市，面积约25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为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的军运港口，也是日本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地。这个城市主要集中在四个小岛上，城里有当地陆军司令部，约有军队两万五千人。

8时15分零5秒，当原子弹爆炸后，瞬间火焰四处蔓延，浓烟上下翻滚，一直上升到大约7620米高空，形成“蘑菇云”，完全遮住了太阳，天空呈现一片灰暗。整个广岛被笼罩在恐怖之中。

8时25分，炽热的金属碎片和燃烧的木头倾盆大雨似地降下来，有些落到了已经受伤的人身上。这又增加了新的伤亡数字。广岛第二陆军总司令藤井在最初几分钟内就被烧死在城堡附近的司令部内。整个指挥系统失灵。日

军通讯大楼的通讯器材遭到彻底破坏，9时，火势向周围蔓延。仍能走路的人纷纷朝着公园和郊区的帐篷跑去。由于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死的人越来越多，其状惨不忍睹。

10时，第一场“黑雨”——放射性微粒夹杂着灰烬和蒸气——开始在广岛市中心下了起来，带有放射性的“黑雨”下了整整一天，波及到原先未受到影响的地区。这又增添了新的灾难。

一位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景：突然间，象照像那样的白色闪光笼罩着天空，令人目眩；随后是猛烈的爆炸声，建筑群纷纷倒塌……路上躺着的许多已经面目全非的妇女和儿童……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坡上的树木也被烧焦……至到夜里，大火仍在熊熊燃烧，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已成为一片废墟……。

据统计，“男孩”在广岛的爆炸及其引起的风暴性大火几乎立即夺去了至少66000人的生命，后来又有数万人陆续丧生，160000亲人致伤，市区81%的建筑顷刻间变成残垣断壁和一片瓦砾……

（二）“胖子”把浩劫带给长崎

8月7日美国战略空军关岛司令斯帕茨接到总统杜鲁门的第二道指令：“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按原定计划进行”。

8月9日清晨3时48分，B—29新型轰炸机编队出发了。两架气象摄影飞机先起飞。这次担任主角的是B—29型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绰号为“伯克的汽车”，上面装载着代号为“胖子”的第二颗原子弹。

9时45分，查尔斯·斯威尼上尉驾驶着“伯克的汽车”起飞。当时风暴增大，为了节省油料，飞机没有经过硫磺岛，直飞日本海岸。他们预定在横岛上空与另两架气象摄影飞机会合。但是，担任摄影任务的飞机未能按时赶到汇合地点，查尔斯·斯威尼上尉和气象飞机驾驶员焦急地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仍未见到摄影飞机。最后得到了指挥官同意，他们即飞向袭击的第一个目标——九州的小仓。

当飞机抵达小仓上空时，由于受到邻近城市轰炸所产生的浓烟遮盖的影响，烟雾太大，飞机在那里环绕飞行三周，投弹手用肉眼找不到瞄准点。这时，斯威尼决定袭击候补目标长崎，并决定由目视投弹改为雷达投弹。

10时55分，飞机到达长崎上空时，发现云量为8/10，飞行中90%靠雷达。正当投弹手准备雷达投弹的一刹那，突然在云雾中出现了一个窟窿。投弹手瞄好山谷中的一条跑道，即将原子弹投下。爆心比预投目标偏离2.4公里，正是两家兵工厂中间。爆炸当量约2万吨。

11时零2分，长崎出现了异常炽亮的蓝色闪光。先是沉闷的轰响声，接着刮起一阵飓风。冲击波和震动延续了5分钟之久。

这次长崎袭击，由于有广岛事件的教训，人们从思想上到防护上都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加之长崎依托山地，因此，所受到的破坏程度比广岛轻些。但这次钚弹爆炸，仍使长崎20多万居民中的40000余人丧生，60000人受伤，68.3%的建筑被毁于一瞬。燃烧的烈火和翻滚的浓烟笼罩着依山傍海的长崎市达数日之久……

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枚原子弹，以其空前巨大的杀伤和破坏威力震惊了日本战时内阁，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这两枚原子弹的爆炸给千千万万日本平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这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核武器的出现和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

在核战争威胁下生活的时代。

二、揭开原子核能的奥秘

核武器是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反应在瞬间放出巨大能量、产生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核武器里面装的是核装药铀 235、钚 239 或热核装药氘(又名重氢)、氚(又名超重氢)或氘氚等。它们造成杀伤破坏作用的能量是由核装药或热核装药发生爆炸性核反应释放出来的,属于核能,也称作原子能。核能与化学能完全不同,它是从原子核内部释放出来的,比一般化学反应的能量要大得多,1 公斤铀 235 全部裂变放出的能量约相当于 2 万吨梯恩梯炸药爆炸时放出的能量,而 1 公斤氘氚聚变反应放出的能量又是 1 公斤铀 235 裂变时能量的 4 倍。因此,核武器的杀伤半径可达几公里至几十公里,能够对目标造成综合性杀伤和破坏,其巨大的威力是普通炸弹、炮弹所不能比拟的。

核武器的出现是人类智慧与一种战略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制造出具有如此大规模杀伤破坏威力的核武器,使得几千年所创造的文明和自身的生存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利用核能的一个错误。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出现,也代表了 20 世纪 40 年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成就。许多科学巨匠为揭开原子的奥秘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为人类科学认识微观世界与和平利用核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伦琴与伦琴射线早在 1895 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暗空中做放电实验时发现,被黑纸包住的放电管可以使一段距离外涂有一种莹光材料(铂氢酸钡)的纸屏发出微弱的莹光。伦琴就把这种来自放电管而又看不见的东西称为 X 射线。后又经过反复实验,他发现这种射线能够穿透人的衣服和肌肉。若把手放在放电管和莹光屏之间,莹光屏上就会映出手的骨骼影子。后来为了纪念这位科学家的伟大发现,人们把射线的计量单位命名为伦琴。

居里夫人萃取出新放射性元素镭和钋 1898 年,波兰出生的年轻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发现自然界有一些元素的原子核能自发地放出一些看不见的射线,这些元素在发出射线时,会释放出部分能量,同时它自身就转变成具有另一种性质的新元素。经过反复实验,她从粗杂沥青铀矿中萃取出放射性强于铀数倍和数百倍的两种新元素:镭和钋。由于天然放射线的发现,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原子结构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原子核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从而启发人们探讨可能利用原子能的新途径。

卢瑟福提出原子蜕变学说 1902 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建立了放射性蜕变学说,提出了原子结构模型,否定了 19 世纪之前原子不可分割的结论。他研究认为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原子核里面,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1919 年,卢瑟福用放射性元素镭中放出的 α 射线轰击其它元素,第一次实现了原子核的人工转变,这样,就为人们深入地研究核反应奠定了基础。

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 1905 年,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创立了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公布了质量与能量相互联系的质能关系式, $E = MC^2$ (E: 能量; M: 质量, C: 真空中的光速)。根据这一质能关系式,对应于 1 克质量的能量为 9×10^{12} 尔格,这就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的奥秘。

查德威克发现中子 1932 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在许多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种穿透力非常强、不带电的中性粒子——中子。利用中子几乎可以轰开一切元素的原子核。从此,科学家们得到了一把打开原子核的

好钥匙。正是这种极小的微粒——中子，后来成为释放蕴藏在原子核内巨大能量的最好工具。

费米决定用中子轰击铀 1934 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人工放射现象的可能性。费米发现，如果使中子的运动受到水或石蜡的阻滞，用这些中子轰击金属就具有大得多的放射性。中子是他实验的主要工具。他迅速证明，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每一种元素在受到中子轰击时都能够发生核转化。费米后来移居美国，主持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

哈恩分裂铀原子成功自从中子被发现后，人们就利用中子去做实验，轰击各种元素的原子核，研究各种核反应。直到 1938 年底，德国物理学家哈恩与同事施特劳斯曼在实验中发现，当把钡元素加到中子轰击过的铀元素中时，它可以带出一些新的放射性物质。后来，曾与哈恩一起从事过研究工作的奥地利女物理学家梅特娜分析证实，这种所谓新的放射性物质实际上就是放射性钡，并指出，这是铀原子核分裂的结果，她把这种分裂称为“裂变”。铀原子核裂变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且能同时放出 2—3 个中子，这就预示着发生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的可能。

波尔和惠勒从理论上阐述了核裂变反应过程 1939 年 9 月，丹麦物理学家与他的合作者惠勒进而从理论上对核裂变链式反应进行了阐述，并指出能够引起这一反应的最适宜的核原素是铀 235。1941 年 3 月，美国科学家西博格经过实验证实，在中子轰击下钚原子同铀-235 原子一样，同样可以发生裂变。

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惊人巨大杀伤破坏作用的新式武器——核武器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在一种战略需要的驱动下，1945 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随后出现了本书第 1 节所描述的那令人震惊的一幕。

三、核武器巨大的杀伤破坏效应

美国投掷于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威力分别相当于 2 万吨梯恩梯炸药。就是这两颗原子弹夺去了十几万人的生命，几乎摧毁了这两座城市。当前，在世界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中，许多核弹头的爆炸威力相当于 100 万吨以上的梯恩梯炸药。如果一颗当量为 100 万吨的核弹在产生最大威力所需要的高度爆炸，将会即刻摧毁半径 5.6 公里范围内的全部砖房；爆炸引起的气浪能以毁灭性的速度将物体甚至是人抛到 10.5 公里以外，在半径 9.7 公里左右以内的地区，绝大部分织物和纸张将会着火燃烧；爆炸能在 17.7 公里以外的地方造成二度烧伤，引燃草木；爆炸后数周乃至数月，将有更多的人由于患放射线病而死去；母体内的胎儿受到辐射，可能生下来就畸形……如果爆发核战争，那么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是无法估量的。

人们利用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和聚变反应在瞬间放出巨大能量的原理，制造了威力极大的核武器，然而核武器究竟有那些杀伤破坏因素和作用呢？

其一，高压杀伤破坏——冲击波核武器爆炸的冲击波，是核武器的基本杀伤破坏因素，大约占爆炸释放总能量的 50%。冲击波可以在空气、水和土壤等介质中传播。

冲击波对人员的杀伤作用，一般可分为直接杀伤和间接杀伤两种。

直接杀伤是指冲击波的超压和动压直接作用在人体上所造成的杀伤。其中超压的挤压作用，会使人员的听觉器官，心、肺、胃等内脏器官发生破裂和引起出血等。动压的作用，则是直接撞击人体，或是将人体抛掷空中，而后再被地面所撞击，造成人员的颅脑损伤，骨折，肝脾破裂等。

除了直接杀伤，冲击波还可以对人员造成间接杀伤，这主要是指在冲击波的作用下，某些物件，例如砂石、砖瓦、玻璃碎片等的飞进，或工程建造物的倒塌，对人员所造成的杀伤。冲击波对人员的杀伤，是直接杀伤与间接杀伤综合发生，但在多数情况下，主要在于间接杀伤。冲击波不仅对人员造成杀伤作用，而且对其他各种物质也有破坏作用，对各种武器装备等，主要是属于机械破坏或损伤。由于武器装备等的材料和构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受到的破坏程度也不相同。

冲击波对各种工程建筑物的破坏，也是十分复杂的，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使其变形、断裂、以至倒塌。被破坏的程度，可分为局部破坏和整体破坏两大类，而多数属于后者。

冲击波的杀伤破坏作用，不仅取决于核武器的威力和爆炸方式。而且还和目标距爆心（或爆心投影点）的距离和方位等有关。

其二，高温杀伤破坏——光辐射光辐射是核爆炸的基本杀伤破坏因素之一。一般说来，它大约占爆炸释放总能量的 35%，它的作用仅次于冲击波。空中爆炸时，特别是在晴天的情况下，光辐射的杀伤破坏范围最大。

当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时，弹体中的高能粒子所产生的电磁辐射被几厘米厚的空气层完全吸收，使得周围空气的温度很快上升到几十万度。因此，在核爆炸的反应区内，除了爆炸气体以外，还有炽热的空气。结果，在反应区内形成了一个高温高压的炽热气团——火球，并且向周围发射光辐射。就整个过程来说，火球所发射的光辐射，包括 X 射线、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几部分。

核爆炸光辐射照射到人体时，由于它的高热作用，可以使面向爆炸方向

的暴露部位受到各种程度的烧伤。除了光辐射直接作用于皮肤引起直接烧伤外，还可能因为服装、工事、建筑物或者装备器材等的燃烧而引起间接烧伤。在多数情况下，两类烧伤会综合发生。当人员直视火球时，还能引起视网膜烧伤；强烈的闪光可使人员遭到闪光盲。此外，当人员吸入高热的空气时，还能够导致呼吸道烧伤。

光辐射对技术兵器或武器装备的木质部分、漆等可以引起燃烧或焦化；使棉、麻类织物的套、盖布以及橡胶轮胎等着火；对油料、弹药和他物资仓库的危险性也很大。

核爆炸光辐射时能量虽然比起普通炸弹要大几千倍，但释放时间不长，它随着爆炸当量的减少而显著减小。例如，当量是 100 万吨的空中爆炸，光辐射能量的释放时间是 12.6 秒；当量是 10 万吨时，只有 4.7 秒，当量是 1 万吨时，还不到 2 秒钟。即使对于大当量的核爆炸来说，火球的整个发光时间，大约 10 秒左右，但光辐射的大部分能量，基本上都是在前 3 秒里释放出来的。

其三，特殊杀伤破坏——贯穿辐射核爆炸时，以核辐射的形式释放大约 15% 的总能量。核辐射是核爆炸不同于普通炸弹爆炸的独有特性。它是用人眼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的 射线、射线、射线和中子流所组成的。但是，由于 射线和 射线的穿透能力差、很容易被大气吸收。因此，贯穿辐射主要指在核爆炸最初的一分钟里具有较强穿透能力的 射线和中子流。

贯穿辐射大约占整个核辐射能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只占核爆炸释放总能量的 5%。按比例来说，虽然不是核爆炸的主要杀伤破坏因素，但具有特殊的危险性。

贯穿辐射对暴露人员的一次照射剂量，在 100 拉德以上时，就能引起不同类别的急性射线病。射线病的程度，不仅与人体在照射期间所接受的总剂量的大小、局部照射还是全射照射，以及照射的时间长短有关，而且还与人的特点和照射瞬时人体的一般健康状况有关。

对其他目标来说，由于贯穿辐射的穿透能力很强，可以引起照相材料（如底片或相纸）感光，使光学仪器中光学玻璃的光学性能变坏。但对大多数武器装备，物资器材，基本上没有什么破坏作用。只是在中子流的照射下，可以使含有金属元素钾、铝、锰等目标物质产生感应放射性，这对使用人员同样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同时，对含有钠盐的食品或药品也会出现感应放射性，使食用人员遭致危害。

其四，潜伏的敌人——放射性沾染核爆炸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它的瞬时杀伤破坏作用（冲击波、光辐射和贯穿辐射的作用）也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但是剩余的核辐射，我们称之为放射性沾染，仍然会对人员造成放射性伤害。虽然这种杀伤看不见，但它的作用时间，比起贯穿辐射来要长得多，可以长达几小时、几天，甚至一、二十天之久，好比潜伏的敌人。

放射性沾染对人员的伤害，一般是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也就是体外照射、体内照射和皮肤沾染。

体外照射，是指核爆炸后，沾染在地面、物体等表面的放射性物质。它们所放射的射线，直接照射到人体上。其中穿透能力强的 射线对人体的危害性最大，其次是 射线。

体内照射，是指沾染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水或者食物，通过人员的口、鼻进入体内；或者通过沾染了的伤口、烧伤的皮肤或者眼结膜等侵入体内时，射线照射人体内部组织引起的杀伤。

皮肤沾染，是指暴露人员的皮肤、服装沾染了放射性物质，或接触了严重沾染的武器装备或其他物体，而由射线引起皮肤表面的烧伤。

其五，一瞬间的特殊破坏——电磁脉冲电磁脉冲是指核爆炸所释放的 γ 、 x 射线与周围介质相互作用，而散射出非对称的高速康普顿电子流，由这些不对称分布电荷运动所激励出的随时间变化的电磁场。电磁脉冲类似于夏季雷雨来临时，极其强大的闪电所发射的电磁信号。电磁脉冲可以使雷达正常的工作受到干扰，能够使通讯暂时中断，并能扰乱指挥系统中的计算机工作而产生错误的输出数据。

核电磁脉冲的破坏作用，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功能损坏；另一类是工作干扰。功能损坏是指电子系统或者其中的元器件，受到电磁脉冲的作用以后不能继续工作。例如，当电磁脉冲在晶体管中引起的感应电压或电流超过允许值的大小时，晶体管会被烧坏。再如电缆，受到电磁脉冲作用后，它的绝缘材料外皮被击穿造成短路，整个系统就无法继续工作。

工作干扰是指电磁脉冲虽然没有使电子、电器系统或者其中的元器件受到破坏，但接收进去的附加信号却使得某些元器件的工作状态改变了，因而引起工作紊乱，控制失灵。在导弹、航天飞行器的控制系统，以及各类电子计算机里，大量地采用数字逻辑电路，这些电路的参数也都有一定的允许值。假如电磁脉冲附加到电路上的电压或电流大小超过了电路的允许值，就会引起控制系统和计算机中的电路状态改变，结果发生错误动作。

四、核武器的分类

随着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核武器种类日益增多，从不同角度出发，核武器有不同的分类：

（一）从核装置原理结构分类

从核装置原理结构划分，可分为原子弹、氢弹和特殊性能核弹。后者包括中子弹、冲击波弹等。通常称原子弹为第一代核武器；氢弹和中子弹、冲击波弹为第二代核武器；目前尚在研制中的电磁脉冲弹、核激励 X 射线激光器属于第三代核武器。

——第一代核武器：原子弹 (atomic bomb) 利用铀或钚等易裂变重原子核裂变反应瞬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更确切地应称为裂变武器或裂变弹，有时也仅指裂变武器中的核爆炸装置部分。原子弹的威力通常为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有很大的杀伤破坏力，核爆炸装置可单位装配在不同的投射工具中而成为核导弹、核航空炸弹、核地雷和核炮弹等。

——第二代核武器：

氢弹 (hydrogen bomb) 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其威力可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为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的威力则可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此外，通过设计还能增强或减弱氢弹的某些杀伤破坏因素，因而它的战术技术性能比原子弹更好，用途也更广泛。

中子弹 (neutron bomb) 以高能中子为主要杀伤因素相对减弱冲击波和光辐射效应的一种特殊设计的小型氢弹，其较为确切的名称是增强辐射弹 (enhanced radiation weapon)。普通核弹爆炸时不仅杀伤人员，而且对周围建筑物、工厂设备等的破坏范围也很大。使用这种武器将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额外破坏 (叫做牵连破坏)。同时，由于核爆炸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使部队不能迅速进入被炸地区，因而从军事价值来衡量，现有的战术核武器并不理想。中子弹爆炸放射出的大量高能中子，可以穿透 1 英尺厚的钢板，因此它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坦克装甲、掩体和砖墙等物，杀伤其中的人员，而坦克、建筑物、武器装备等却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例如美国当前研制的中子弹，据说可以使 200 米范围内的任何生命死亡；而在 800 米内的人员，如不遮蔽就会在 5 分钟内失去活动能力，在一两天内死亡；但它对周围物体的破坏半径仅有 200 米。而一枚梯恩梯当量为 5 万吨的普通核弹头，它对周围物体的破坏半径却达 2200 米。此外，中子弹爆炸时放射性污染很轻，经过较短时间，部队即可进入爆炸地区，这在军事上有很大意义。

冲击波弹 (shock weapon) 一种以冲击波效应为主要杀伤破坏因素的特殊性能氢弹。与普通氢弹相比，其显著特点是降低了剩余放射性的生成量，因此它的确切名称应为减少剩余放射性弹，也被称作“干净”的核武器。美国于 1956 年便进行了旨在降低放射性沉降的氢弹试验，1980 年，宣布研制成功冲击波弹。冲击波弹的杀伤破坏作用与常规武器相近，能以地面或接近地面的核爆炸摧毁敌方坚固的军事目标，而且产生的放射性沉降较少，爆后不久，己方部队即可进入爆区，因此比较适合于战场上使用。

增强 X 射线弹 (enhanced X-ray weapon) 一种以增强 X 射线破坏效应为主要特征的特殊氢弹。从原理上看，增强 X 射线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

是增大 X 射线在核爆炸释放能量中的份额 ;二是使释放的 X 射线的能谱变硬。这种硬的 X 射线可以穿透来袭导弹壳体,对内部电子器件、电路等产生辐照效应;由于硬 X 射线在空气中穿透能力较强,增强 X 射线弹即使在 6 - 7 万米高度上爆炸, X 射线仍然是重要的破坏因素。美国曾经部署的“卫兵”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斯巴坦”(spartan)导弹弹头,就可能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增强 X 射线弹。

——正在发展中的第三代核武器:

核电磁脉冲弹(nuclear electromagnetic pulse weapon)一种利用在大气层以上的核爆炸,使之产生大量定向或不定向的强电磁脉冲,以毁坏敌方的通信系统等的核武器。简称 EMP 弹。电磁脉冲弹是美国正在研究发展的第三代核武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尚处于探索、预研阶段。

核激励 X 射线激光器(X-ray laser pumped by a nuclear explosion)此种激光器以核爆炸作为激光源。核爆炸时产生的能量使其周围的材料受激发而发射出 X 射线激光。X 射线激光的特点是波长短、辐亮度高、脉冲窄和方向性强。X 射线激光器属于美国正在研究发展的新一代核武器。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DI)曾设想作为拦截来袭弹道导弹的天基部署武器。由于它采用的是微型核反应堆,武器体积不大,具有天基部署的有利条件。但当采用天基部署时,由于 X 射线会明显被大气层所吸收,它很难摧毁位于 1000 公里以下近地层范围内飞行的导弹。为此,美曾设想将此类武器部署在潜艇上,一旦接到预警信号,便立即把 X 射线激光器自潜艇射入空间以拦截对方的导弹。为了能在对方的导弹助推系统关机之前进行拦截,要求 X 射线激光器必须以极大的速度射至足够的高度,所以,尽管此类激光器的体积不大,却需要用极大的发射推力。由于激光器采用核爆炸作为激光源,核爆炸时也能摧毁装置本身,故激光器只能一次作用。为了研制此类激光器,美国近年来曾多次进行了有关的地下核试验。

(二)从作战使用上分类

战略核武器(strategic nuclear weapon)用于攻击敌方战略目标或保卫己方战略要地的核武器的总称。战略核武器一般是由威力较高的核弹头和射程较远的投射工具组成的武器系统。战略核武器有:陆基洲际弹道核导弹,潜地弹道核导弹,携带核航空炸弹、近程攻击导弹、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以及反弹道导弹核导弹等。战略核武器的作用距离可远至上万公里,核弹头的爆炸威力大多数为几十万吨梯恩梯当量,也有高达几百万吨、甚至上千万吨梯恩梯当量的。具有战略核攻击能力的导弹、潜艇、飞机等均可成为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就是指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地弹道核导弹、以及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三者所组织的核力量的整体。

战术核武器(tactical nuclear weapon)用于支援陆、海、空战场作战,打击对敌方军事行动有直接影响的目标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一般是由威力较低的核弹头和射程较短的投射工具组成的武器系统,包括:近程地地核导弹、核航空炸弹、舰舰和航空核导弹、反潜核导弹、核深水炸弹、核炮弹、核地雷等。美国官方还使用过“战区核武器”的概念,并把中远程和中程核导弹划进这一类核武器。一般说来,具有战役战术核攻击能力的导弹飞机、大炮、舰艇等均可成为战术核力量的组织部分。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相比,机动性能好,射程较短,一般为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核弹头的威

力较低，多数为几千吨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个别的也有高达近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核航空炸弹和低至仅 10 吨梯恩梯当量的特种核地雷。

此外，从威力大小划分，可分为高威力核武器（100 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中等威力核武器（10 - 100 万吨梯恩梯当量之间）和低威力核武器（小于 10 万吨梯恩梯当量）。

从投射系统系分，可分为核导弹、核航弹、核炮弹、核深水炸弹、核鱼雷、核地雷等。

第二章 从曼哈顿工程到星球大战计划

美国的核力量，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也是其军事战略的主要支柱。从美国政府执行曼哈顿工程计划研制成功第一枚原子弹开始，在 40 多年的冷战期间，美国与其战后的主要对手苏联进行了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美国的核武库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系列化的发展过程。本章试图从曼哈顿工程计划开始，按垄断与反垄断、大规模生产确保优势、在相对均势中重点提高质量和建立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体系几个时期来描述至 90 年代以前美国核军备发展的轨迹。

一、曼哈顿工程的前前后后

当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正如本书第一章中阐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为原子弹这种新式武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此时，一种战略需要就成为这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武器问世的加速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火中，轴心国的元凶纳粹德国和同盟国的主力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更为激烈然而却是秘密的角逐。

（一）德国人在核技术上曾一度领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在核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施特拉斯曼成功地分裂了铀原子，并发表了关于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论文。然而，幸运的是，第一颗原子弹并没有产生于当时纳粹分子统治的德国，否则将出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或许第二次世界大地的结局将要部分地改写。

德国哈特克博士最早建议研制核炸弹 1939 年 4 月 24 日，正当法西斯德国酝酿闪击波兰从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德国汉堡大学的哈特克博士写信给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信中写道：“我冒昧地请您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上述可能性可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之内——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越性。”这可能是在核物理学家中最早明确提出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目的的建议。还有一些资料表明，早在 1942 年就有人把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报告给了希特勒。然而，德国在这方面的研制工作却进展迟缓。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领导的小组曾于 1942 年在莱比锡研制成功一座效果良好的铀反应堆，为生产高浓铀，德国一度着手高离心机的研制，由于空袭和电力、物资缺乏等原因，进展缓慢，转而采用重水反应堆生产钚—239，直到 1945 年初，才建成一座不大的次临界装置。而在那时，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已是成功在即。在这场核武器研制的悄悄竞赛中，纳粹德国终以失败告终。

德国人研制核武器进展迟缓的原因首先，是决策上的失误。最初哈特克博士提出研制核武器的建议时，德国决策者们就未给予充分的注意，战争初期德国闪击作战行动的成功，使法西斯头目们特别是希特勒错误地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无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经费去研制尚无必成把握的原子弹，因而最初几年一直未给予足够的支持。后来战局变化，想加强核技术的研究，但因战争的破坏已是困难重重，为时已晚了。其次，是缺乏统一计划和全面指导。德国从事核技术开发和研制的各种力量，始终未统一地组织在一个计划之中，各个研究小组和实验室的力量不能相互协作，而是矛盾较多，相互制约。第三，是希特勒的反犹、排犹政策，使许多犹太籍科学家与同情犹太人的非犹太籍科学家遭受迫害，包括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逃离德国，还有一些科学家即使留在德国，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V-1 飞航式导弹和 V-2 弹道式导弹在谈及二战期间德国人研制原子弹未果的同时，还应该提到的是德国积极从事火箭技术的研究，制造出了 V 型飞弹，并在战争后期，将这种武器运用

于战场，而 V 型飞弹对后来美苏发展弹道导弹有着重大的影响。V - 1 飞弹是一种飞航式导弹，有翅膀，内装一台冲压式空气喷气发动机和自动驾驶仪器，飞行速度是 160 米/秒，射程约 250 公里，精度较差。V - 2 飞弹是世界上第一个弹道式导弹，它装有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剂是液氧和酒精，可穿越大气层飞行，飞行弹道最高为 190 公里，最大速度达 1600 - 1700 米/秒，射程为 300 公里，弹头重 1000 公斤，采用惯性制导，因测量装置误差较大，所以落点偏差为 8 公里左右。德国人曾使用 V 型武器袭击英国，但这种武器生产出来为时太晚，并未取得德国人预期的战场效果。

（二）美国人后来居上

在原子弹的研制上，与德国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积极行动。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被称之为曼哈顿工程，这个庞大的工程计划于 1942 年 8 月开始正式启动，直接动用人力 60 余万人，参加单位数百个，耗资 22 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制成了 3 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爱国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二战前夕，从欧洲移居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首先指出，一旦法西斯德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其后果不堪设想。经他和另几位从欧洲迁来的科学家的推动，已定居美国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中写道：“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只要一枚这种炸弹就足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尽管这些话对于罗斯福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然而这位睿智的总统却没有重蹈当年拿破仑排斥富尔顿关于制造蒸汽舰船建议的覆辙，他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建议，并当即决定成立“铀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裂变弹”的研究工作。该委员会由标准局、陆军和海军的代表组成，定期与有关科学家开会讨论原子武器的发展问题。1940 年 6 月，“铀顾问委员会”被纳入新成立的、以万尼瓦尔·布什博士为主席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布什不仅是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还是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最高决策小组的成员。这样，军事利用原子能的问题就被列入了美国最高决策层议事日程，不仅各项核研究计划可得到及时讨论、批准，而且研究经费也有了可靠的保证。1942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1941 年 12 月 16 日，最高决策小组接受了布什的建议，决定由美陆军工程兵修建原子弹研制工程设施。1942 年 6 月 17 日，布什向罗斯福报告了研制原子弹的详细计划，罗斯福予以批准。最高决策小组对核计划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向美国提供一种能结束战争的武器；二是在德国制造出这类武器之前作到这一点。

曼哈顿工程启动从 1942 年 8 月 13 日起，美国在纽约以东的哈曼顿地区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作为制造原子弹的领导机关，并把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命名为“曼哈顿工程”，列为国家“绝密”项目。在此之前，陆军部已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指令，以美军工程兵团组建“曼哈顿工程区”，来执行原子弹的研制工程计划。工程兵团建筑筑部副主任格罗夫斯将军被任命为工区的总负责人，著名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被指定为原子弹研制计划的负责人。曼哈顿工程的启动标志着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由纯理论的实验室工作转入实现研制生产的新阶段。

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1942 年 12 月

2 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的看台下面，美国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座铀——石墨反应堆。这个装置宽 9 米，长 10 米，高 5.6 米，内装铀 52 吨（含 6 吨金属铀，其余为铀的氧化物）。这个装置总重量达 1400 吨。由于这个装置象堆一样，又为了保密，故把它叫“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当天下午 3 时 36 分，裂变反应开始，链式反应持续 28 分钟。当时，从过个实验堆中制造出了 0.5 克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工控制的核反应，从而在实验上证明了链式反应理论的正确性，并为 30 个月后研究制成原子弹提供了可靠基础。

铀 - 235 工厂和钚 - 239 工厂 1943 年 2 月和 6 月，美国分别在汉福莱特和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建立了生产钚—239 和铀—235 的工厂。1944 年 10 月底，首批铀—235 出厂，到 1945 年 6 月底，工厂采用气体扩散和电磁分离两种方法生产了 20 千克铀—235，足够装填一颗原子弹。同年 7 月生产出 60 千克钚 - 239，又足够装填另外两颗原子弹。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经过多方努力，1945 年 7 月初，美国终于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两颗原子弹。其中一颗的装料是钚—239。将用于试爆，试验场地是曼哈顿工程总负责人格罗斯夫将军和后来被美国报界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亲自选定的，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奥本海默取基督教圣父、圣子与圣灵台为一神的“三一圣体”之意，给这个试验场命名为“三一试验场”。7 月 15 日，世界上第一颗钚弹被置放在“三一试验场”30 米高的钢架上。翌日清晨 5 时 29 分 45 秒，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当量为 1.9 万吨。爆炸的巨响在 160 公里外都可听到，290 公里外的建筑有玻璃窗被震坏，高大的蘑菇云上升到 1 万多米的高空。面对着这个空前强大的爆炸，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三）积极准备把原子弹投放战场

战争的驱动，使核技术首先运用于军事斗争的领域。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工作，几乎是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同时进行的。

确定运载工具由于原子弹体积大，重量重，贮存基地又远离袭击目标，因此，需要一种远航程重型轰炸机，才能承担这一任务。1943 年 9 月，美国最后决定用当时称为超级空中堡垒的 B—29 型轰炸机携带投掷。1944 年春天，格罗夫斯找陆军航空司令阿诺耳法研究如何改装 B—29 轰炸机，以便载运原子弹。携载原子弹的飞机必须有足够的载重能力，足够的弹舱容量，足够大的炸弹舱门，以及必要的航程。而且，待到原子弹装配时，必须组织装备和训练一支有高度作战能力的战术部队。为此，空军于 1944 年 8 月决定改装飞机。在 1944 年 9 月 30 日以前，提供 3 架改装 B—29 型飞机，并在 1945 年 1 月 1 日前，再陆续提供 13 架。

组建“火箭”大队 1944 年 12 月，美国在温多佛空军基地组建了第 509 空军混合大队，代号为“火箭”。该大队由第 504 轰炸机大队抽调训练有素的第 393 重型轰炸机中队组成。“火箭”大队大队长兼机长就是后来直接执行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任务的保尔·蒂贝茨上校。“火箭”大队编制军官 225 名，士兵 1542 名。1945 年 5 月，“火箭”大队从原驻地前移至关岛附近的提尼安岛空军基地，编入美国空军第 20 航空队。同年 6 月末开始了近似实战的模拟战斗训练。训练按未来原子弹突袭时三机编队，多次飞抵日本上空，使机组人员熟悉日本空域的气候、地形、地物及日军防空火力，熟练掌握投弹程序。从 7 月份开始的对日本进行一连串的实战空袭中，“火箭”大队所

袭击的目标均在预投原子弹的目标附近。为使这些试验性轰炸和将来真的原子弹轰炸相近似，在领航程序、高空单机接近、目视投弹以及投弹后迅速脱离等方面，均严格按预想方案实施。据称，他们先后进行过四次实战演练，投掷模拟弹 38 枚，主要使用目视投弹，雷达投弹只试用过 8 枚。到 7 月末，“飞箭”大队已做好执行投掷原子弹的准备工作。

选定袭击目标的战略考虑 美国研制原子弹之初，袭击目标预想是德国。1945 年 5 月 8 日纳粹德国宣布投降，而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尚未制成，从而失去了在欧洲战场的机会。当时日本尚在作最后抵抗，但败局已定，且苏联已承诺对日作战。但美国决策者们不甘心错过在实战中检验原子弹空前巨大威力的机会，为加速日本投降，减少美军伤亡，特别是试图以此对未来潜在对手苏联以至全世界起震撼和威慑作用，从而确定战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实力地位，美国加快步伐抢在大战结束前将原子弹投放战。1945 年 3 月，美国就成立了目标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原子弹袭击目标的分析与选择。最后选定日本的三个中等城市为袭击目标，这三个中等城市按选择的顺序是广岛、小仓、长崎。随后加紧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and 战前训练。8 月 6 日和 9 日，从提尼安岛空军基地先后起飞的两批美国 B - 29 重型轰炸机编队用美国仅有的一枚铀弹（代号“男孩”）和一枚钚弹（代号“胖子”）轰炸了广岛和长崎，从而演出了本书开篇所描述的那数十万平民死亡的悲剧。

二、核武器的垄断与反垄断之争

(1945 - 1955)

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和苏联就对核武器在战后大国角逐中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心照不宣，暗中的竞赛也早已开始。战争结束后，这种斗争日趋明朗和激烈，在长达 40 余年的核军备竞赛中，美国和苏联都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调动了全国的科学技术与生产能力，发展了从地面到海洋，从空中到空间，从进攻到防御的庞大的核武器系统。其总威力已经达到可以相互摧毁若干次的程度。在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中，美国的核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垄断到具有绝对优势再到相对均势的发展过程。垄断与反垄断，是核军备竞赛的第一个时期。

从 1945 年 8 月美国拥有运用于实践的原子弹开始，到 1955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政策检查中正式承认美苏两国相互威慑的局面可能出现为止，美国的核垄断大体维持了 10 年左右。在这 10 年中，美国依仗手中拥有核武器这张王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一步巩固了战后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霸权地位，成为西方阵营的盟主，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美国战略对苏联的无情压力”。在这期间，苏联不甘人后，奋起直追，最终以几乎与美国同时掌握可用于实战的氢弹为标志，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一) 从原子弹到氢弹

美国在原子弹的垄断被打破后，加速发展属于第二代核武器的热核聚变弹——氢弹。核弹头的品种也从单一到多样。40 年代和 50 年代，美国的核弹头用“MK”后面加数字表示，60 年代后“MK”表示再入飞行器。核武器系统的弹头用“W”表示，所有航弹用“B”表示，其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弹的型号，如 W - 80、B - 61 等。

少量生产核武器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 4 年里，美国的原子弹制造技术处于初始阶段，再加上裂变材料产量不大，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增加比较缓慢。1945 年，美国只生产了 2 颗原子弹，并于 8 月 6 日和 9 日分别投放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其后 3 年，核弹头的数量虽有增加，但为数不多。1946 年库存弹头 9 枚，1947 年库存 13 枚，1948 年库存 57 枚。这些核弹头都是由飞机运载的航弹，而且重量和体积都很大。1949 年 8 月，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核垄断的地位开始被打破，这促使美国政府作出了加速发展热核武器的决定。

氢弹之争与氢弹试爆成功早在 1942 年夏天，奥本海默领导的理论物理学家小组就专门讨论了超级炸弹即聚变热核炸弹问题，来自匈牙利的物理学家泰勒博士提出了制造聚变式炸弹的可能性。在二战尚未结束时，泰勒领导的一个小组就开始了代号为“我的宝贝”的超级炸弹的研究工作。然而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空前惊人的破坏与杀伤，使大多数科学家反对制造这种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的超级炸弹——氢弹，其中包括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和主持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奥本海默。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1951 年 1 月 31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发布关于实施制造

氢弹紧急计划的命令。当日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我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继续研究各种类型的原子武器，其中包括氢弹或超级炸弹。”随后，美国研制氢弹的工作抓紧进行。1952年11月2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恩尼威托克珊瑚岛上成功地进行了代号为“麦克”的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这枚氢弹当量相当于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爆炸的能量。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岛试爆成功一颗三级效应的氢弹。从此，美国拥有了可供实战应用的氢弹。

核弹头品种从单一到多样从1946年到1955年的10年间，美国部署了MK-1、MK-2、MK-3、MK-4大型裂变弹，MK-5、MK-7和MK-12等战术核弹，MK-6、MK-13和MK-18等大当量战略核弹，MK-8和MK-11军用深水炸弹，以及由280毫米加农炮发射的MK-9核炮弹。但在此期间，退役的核弹头有MK-10、MK-14、MK-15、MK-16和MK-17，美国的核武库新发展的核弹品种也不够齐全，只由核航弹和战术核武器组成，其中绝大多数又是远程和中程轰炸机携带的核航弹。

（二）运载工具的相应发展

这一时期随着多种新型核航弹的研制和部署，美国运载手段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6年3月战略空军司令部刚刚组建时，只有148架B-29战略轰炸机。两年后，又增加了B-36和B-50两个新机种，使轰炸机总数增加到500余架。1951年，B-57中程轰炸机开始服役。1947年9月，波音公司承包了B-52重型轰炸机的初步设计合同；1951年11月，生产出第一架样机；1955年6月，第一架B-52A轰炸机交付战略空军司令部使用，开始形成作战能力。到1955年，战略空军司令部已拥有轰炸机1500多架。从1953年到1955年，美国生产了两种可发射核弹头的战术火箭，即“下士”导弹和“诚实约翰”火箭。

（三）激烈的垄断与反垄断之争

现已公开的资料表明，苏联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间与美国相差无几。早在1939年8月，当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抢在德国人之前研制出原子弹时，在莫斯科就召开了关于核物理问题的科学讨论会。同年，苏联科学家发表了关于铀同位素分裂的文章。1940年4月，苏联科学院宣布建立铀问题专门委员会。后由于德国的大规模入侵，苏联的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苏联立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重新恢复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并于1947年研制成功第一枚P-1型火箭，紧接着于次年8月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事实超出了美国官方和许多科学家的预料。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方面十分认真而又严守秘密的巨大努力在美国引起了极大震动，美苏双方围绕核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日趋公开和激化。双方在均已拥有原子弹的基础上，进而转入到对热核武器的优先占有权的斗争之中。美国于1952年11月1日试爆了第一颗氢弹，1954年3月1日试爆成功一颗三级效应的氢弹，苏联也随即赶上，于1953年8月12日试爆成功第一颗氢弹，并于1955年制成供飞机运载、可用于实战的氢弹。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苏联则起步更早，并已经取得领先的优势，美国则急起直追，加紧了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步伐。美苏两国围绕核武器的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以美国垄断原子弹开始，4年后被苏联打破。随后，在氢弹技术上，苏联曾有所领先；在氢弹实战化方面，美国和苏联又几乎是齐头并进。在这10年中，美苏双方竞争得十分激烈，双方这种千方百计调动国家力量去谋取核优势的斗争势头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三、大规模生产确保优势

(1956—1967)

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间,是美国大规模生产和大量储存核武器的时期。美国的核武库急剧膨胀,在核弹头生产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1957年,库存核弹头只有5000枚。至1960年,猛增了约11000枚,使库存核弹头总数达16000枚左右。1967年达到最高值,库存核弹头总数超过了32000枚。在运载工具的发展上,这一时期美国在继续不断改进B—52战略轰炸机的同时,加快陆基弹道导弹和海基核力量的发展,随着1958年美国第一枚“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和1962年第一艘“海神”级核潜艇的下水,美国“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开始形成。

(一) 核弹头向多品种系列化方向发展

从核武器发展史上讲,这一时期已进入核武器发展的中级阶段。在原子弹、氢弹的基础上,美国又研制了加强辐射型的中子弹。核弹头的品种也从航弹、导弹发展到核炮弹、核地雷、核鱼雷、核水雷等;在威力档次上,一方面当量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小当量的核弹药。

在这10多年间,共有51种新型核弹头和改进型核弹头进入现役和库存。其中,包括12种新设计的核航弹的深水核炸弹,25种战术核武器弹头和11种战略导弹弹头。

新型核航弹和深水炸弹共有12种陆续进入现役的新型核航弹和深水核炸弹是: B22、B24、B26、B27、B28、B29、B36、B39、B41、B43、B53和B57。

战术核武器弹头出现25种新型号其中,有8种是陆军近程导弹弹头——“红石”导弹的W29和W39、“诚实约翰”火箭和“奈基”导弹的W31、“曲棍球”导弹的W40、“小约翰”导弹的W45、“潘兴1”导弹的W50、“中士”导弹的W52及“大卫·克罗克特”导弹的W54;有5种海军防空或反潜导弹核弹头——“黄铜骑士”导弹的W30、“阿斯托”导弹的W34、“阿斯罗克”火箭的W44、“小猎犬”导弹的W45和“萨布罗克”火箭的W55;有5种核地雷——T4、W30、w31、W45和W54;有4种核炮弹—W19、W23、W33和w18;以及3种空射导弹弹头——“吉尼”火箭的w25、“小斗大”导弹的W45和“猎鹰”导弹的W54。

战略导弹逐渐装备了11种核弹头随着美国陆基洲际导弹和海射弹道导弹的研制成功和进入现役,有11种核弹头逐渐装备了各型战略导弹:“天狮星”导弹的W27、“大猎犬”和“马斯”导弹的W28,“宇宙神”和“大力神”导弹的W38,“鲨蛇”导弹的W39“波马克”导弹的W40,“北极星”导弹的W47和W58,“雷神”、“丘比特”、“宇宙神”和“大力神”导弹的W49,“大力神”导弹的W53,以及“民兵”导弹的W56和W59。

(二) “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导弹取得长足的发展。从50年代末到60年后期,先后有三代陆基弹道导弹研制成功并进入装备,发射方式从地面发射转入地下井发射和潜艇水下发射。60年代初,美国第一艘战略核潜开始服役;战略轰炸机进一步改进了性能并研制发展了新的型号,基本形成“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洲际弹道导弹 1955年9月,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优先发展战略弹道导弹之时,苏联已经在弹道导弹的研制上走到了前面。1957年8月29日,苏联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全程发射试验成功,同年10月,苏联的多级火箭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这令美国人大吃一惊,出现了美国与苏联存在“导弹差距”之说。为此,美国投入多方面力量加快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步伐。1958年4月,美国开始部署液体燃料推进的“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1958—1959年,“雷神”和“丘比特”两种中程导弹也进入现役。1960年,又部署了“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1966年,美国第一枚多弹头洲际导弹开始服役。“宇宙神”和“大力神”型属于美国第一代陆基洲际导弹,基本特点是单弹头,地面发射,采用低温液体推进剂,命中精度低,圆公幕偏差最大可达8公里,且无突防装置。到60年代中期,美国陆续出现第二代陆基洲际导弹,主要型号是“大力神”、“民兵”和“民兵”型导弹。第二代导弹的特点是地下井发射,提高了生存能力;采用可贮液体推进剂或固体推进剂,缩短了反应时间;弹头增加了突防装置并且有变更打击目标的能力;命中精度为1公里左右,威力和可靠性也较第一代导弹有较大提高。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期,美国又开始发展以“民兵”型陆基洲际导弹为主要代表的第三代导弹。

海基核力量 1956年3月,美国批准了弹道导弹潜艇舰队的作战研制计划,同年12月,批准海军着手研制固体推进剂的北极星导弹。在此期间,潜艇与潜射导弹的研制几乎是同步进行。1958年1月,北极星导弹开始试射,这是美国第一代潜射导弹,射程为2500公里,命中精度较差。与此同时第一批3艘北极星潜艇开始建造。1959年4月,北极星导弹飞行试验首次圆满成功;同年12月,第一艘北极星潜艇华盛顿号交付使用。1960年9月开始研制北极星A—3导弹,同年11月“华盛顿号”首次携带A—1导弹开始海上巡逻。1962年5月,第一艘“海神”核潜艇下水;1964年9月,北极星A—3导弹进入装备;1967年7月,最后一艘“海神”潜艇交付使用。

战略轰炸机 B—52A 轰炸机在50年代中期部署后不久,美国即开始研制新型轰炸机。首先研制了B—58“盗贼”式轰炸机,因其性能不令人满意,只采购了100架。继B—58之后,又开始研制B—70、RS—70和FB—111轰炸机。由于种种原因,前两种飞机在研制阶段即被取消,只保留了FB—111中型轰炸机,到1969年这种飞机才装备部队。从1956年至1961年,美国对B—52A轰炸机进行了多次改进,生产出了B—52D、B—52G和B—52H三种型号的飞机。

(三) 美国核武库急剧膨胀的原因

这一时期,美国的核武库急剧膨胀有着战略上和技术上的双重原因。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先后执政,他们先后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而这两种战略都需要核优势来支撑。无论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准备的核大战,还是“灵活反应”战备所需的强大的核盾牌和实施逐步升级的有限核战争,都要求美国不仅在核武器的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保持对苏联较大的优势。特别是美国在1961年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与苏联直接较量时,充分体会到扩充核武库、拥有核优势的巨大政治效应。在技术方面,使核武库得以迅速扩充的原因是:“萨凡那河”、“汉福特”等反应堆满功率运行后,生产出了大量的裂变材料,为核武器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基础;1953年热核武器研制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美国得以生产大当量核弹；各种运载系统研制成功后，使多种核弹头的实践使用具备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核弹头的生产，从而使这个时期美国核弹头的生产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势头。

四、在相对均势中重点提高质量

(60年代末—80年代初)

经过20多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进入60年代末期，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开始呈现相对均势的状态。在相对均势中寻求突破，减少核武器数量，着重提高质量，力争夺取优势，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核军备发展的主要特征。在这一时期，核武器的发展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核弹药更加多样化，原子弹和氢弹进一步得到改进，在中子弹的基础上又研制出加强冲击波弹。在运载工具上，陆基导弹从固定式地下井发射，发展到机动发射；分导技术进一步发展，分导弹头数量达到8—10个；命中精度进一步提高，从数百米提高到几十米，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导弹打击硬目标和点目标的能力；低空巡航导弹开始出现，采用地形区配制导，飞行高度可在100米以下，射程可达2500公里，命中精度几十米，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

(一) 库存核弹头的数量有所减少

1967年，美国库存核弹头的数量达到最高峰之后，便开始逐年有所减少。例如，1967年最高值为32000枚，1971年为27000枚，1982年又减少到25000枚。核弹头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进入库存的新弹头数少于退役的弹头数。在美国，一种型号的核弹头从研制、生产、库存和退役大约需要30年左右。研究与工程阶段一般需要9年的时间，生产与库存阶段为8—25年，平均约16年。到70年代末期，也就是库存量达到最高峰后的13年，库存弹头时间最长的已达23年，平均为12年，因此，很多弹头已经或即将达到退役时限。此外，携带大量老式核航弹的战略轰炸机，开始部分地被带固定数量弹头的战略导弹所取代。新部署的高性能常规武器，也取代了部分战术核弹头。

在这一时期，退役的弹头多达18个型号，而进入库存的只有12个型号。在弹头退役的同时，其运载工具也随之退役。进入库的核弹头有：核航弹B61，“民兵”战略导弹的W62，“斯普林特”战略导弹的W67，“海神”导弹的W68，空军近程攻击导弹的W69，陆军“长矛”导弹的W70，“斯帕坦”导弹的W71，“白星眼”导弹的W72，“三叉戟”导弹的W76，“民兵”导弹的W78，203毫米榴弹炮的W79，和空巡射航导弹的W80。

在核弹头库存数量有所减少的同时，美国十分重视在弹头的小型化、高精度和高可靠性方面加强研究与发展。在这一时期，新研制的多种当量的通用弹头代替了部分固定当量的弹头，由于可调当量的弹头所能攻击的目标数量要多于单一固定当量的弹头，也由于命中精度、可靠率、突防率、生存率均有明显提高，因此，核弹头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它们对软目标和硬目标的毁伤力仍然超过前一个时期。

(二) 运载工具继续更新换代

这一时期美国核武器质量的提高、突出表现在运载工具的更新换代上。

陆基洲际导弹从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发展了第三代陆基洲际导弹，主要型号是“民兵”型导弹。第三代导弹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分导式多弹头，突防能力大大增强；为地下井发射，加固后抗压强度提高到140公斤/厘米，命中精度在1公里以内。“民兵”导弹的命中精度已200米左右，比“民兵”导弹提高近一倍。新型的MX导弹的研制工作始于70年代初期，1979

年，卡特总统批准全面研制以多掩体基地方案部署的 MX 洲际导弹。

海基核力量从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美国的海基核力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1969 年 2 月，美国开始把属于第一代的 31 艘“北极星”导弹核潜艇改装为“海神”导弹核潜艇。到 1978 年 2 月，共用 9 年时间，改装工作全部完成。“海神”属于美国第二代导弹核潜艇。第二代“海神”（C—3）导弹为二级火箭分导式多弹头潜射导弹，采用 W68/MK—3 分导式弹头，每枚 10 个弹头左右，每个弹头 4—5 万吨当量，射程为 4633 公里，命精度为 0.46 公里。1979 年 4 月，第一艘“三叉戟”核潜艇“俄亥俄”号下水。1982 年 1 月，“俄亥俄”号潜艇首次试射“三叉戟（C—4）”导弹。“三叉戟”潜艇属于美国第三代导弹核潜艇，也是目前美军正在服役的最新型的导弹核潜艇，每艘可携带 24 枚“三叉戟”型导弹。该导弹采用三级火箭，携带的分导式弹头为 W—76/MK—4 型，每枚 8 个弹头，每个弹头当量为 10 万吨。“三叉戟（C—4）”导弹的射程为“海神（C—3）”导弹的一倍，达 7800 公里，命中精度相同，也为 0.46 公里。

战略轰炸机这一时期，美国对 B—52 重型轰炸机的机体结构、轰炸机导航设备都进行了全面翻新，使其实防与生存能力大大提高，并着手进行改装 120 架 B—52G 和 B—52H 型机的工作，使之能运载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1970 年，空军开始发展 B—1B 新型战略轰炸机，1976 年开始生产，1977 年曾被卡特政府取消，但 1981 年又很快重新恢复生产。此外，为了使战略核力量更加机动灵活和多样化，还积极发展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

（三）质量的竞赛仍未打破相对均势的僵局

从 60 年代末期开始，美苏核军备形成相对均势，经十余年的激烈竞争，到 80 年代初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首先表现在双方战略核力量的数量上基本相当：“三位一体”运载工具的总数，美国为 2048 件（洲际弹道导弹 1054 件、潜射导弹 656 件、战略轰炸机 338 架）；苏联为 2557 件（洲际弹道导弹 1398 件、潜射导弹 1003 件，战略轰炸机 156 架），数量之比为 1：1.25；核弹头数量，美国为 10889 个，苏联为 9027 个，数量之比为 1：0.83。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分导技术上领先，采用分导式弹头的导弹比例较高，单枚分导率也较高。其次是在战略核力量的质量上，由于苏联的大力追赶，差距也在缩小：在戒备率、可靠率、突防率与生存率等一系列动态指标上，双方已十分接近，美国稍占优势；在命中精度上，美国仍拥用较大优势。再次是美苏双方不但都拥有第一次打击力量，而且也都拥有了承受对方实施第一次打击，尔后组织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从而使双方处于一种“恐怖均衡”之中。自 70 年代以来，美国推行“抵销战略”和“打击军事目标”的核打击政策，奉行提高质量的核军备发展政策，对核武器不断地改型和更新换代，而苏联则不甘心已取得的相对均势地位，倾其全力推进其核武器的现代化计划，推出以 SS—25 陆基洲际导弹、SS—N—23 潜地导弹和“台风”级核潜艇、“海盜旗”新型战略轰炸机为代表的新一代战略武器。为在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发展竞争僵局中寻求突破，美国的核军备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五、全面建设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的尝试

(80年代)

在80年代初期之前，美国十分强调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建设，对战略防御力量的建设重视不够。60年代初，美国曾在本土广泛部署过“奈基”地空导弹，但不久即被撤消。后来于1974年至1976年间，也只是短暂地部署过一个有限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所以，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没有反导系统来保卫自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1983年以来，美国政府在注重进攻性战略力量建设的同时，开始强调战略防御力量的建设。

(一) 星球大战计划(SDI)的提出和发展

星球大战计划，是在美国企图建立攻防兼备的战略防御系统，有效地拦截来袭的战略导弹，从而打破与苏联的核均势僵局，重新获取优势地位的政策驱动下和80年代以来美国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处理技术、航天技术与激光及红外技术取得一系列重大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里根轰动世界的电视讲话1983年3月23日晚，美国总统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SDI)，也被称作星球大战计划。他首先向人们展示了苏联导弹力量已大大超过了美国的4张卫星拍摄的照片和一些图表，强调为了对付苏联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威胁，美国的进攻力量必须现代化。接着便宣布美国要加强研究空间时代的超级武器，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以便敌人的导弹到达美国之前就被拦截和彻底摧毁。为此他要求美国公众支持他今后5年中花1万8千亿美元来实现其“战略防御计划”。里根这次演说立即轰动了美国 and 全世界。国际舆论认为，星球大战的提出揭开了美国太空战略的帷幕，标志着美苏核军备竞赛又登上一级新的台阶。

多层次战略防御体系的构想就在里根总统电视讲话后的一两个月间，美国先后成立了“防御技术研究组”、“未来安全战略研究组”和“高级部际小组”。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论证，他们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的最初构想是：“在未来与苏联的全面核战略中，拦截并摧毁99%以上的来袭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以保卫美国及其盟国”。为此，必须建立全弹道多层拦截网：

第一层，设想在起飞段(500公里以下)拦截起飞的导弹，即在该弹头开始分离、发动机终止工作之前予以阻截摧毁。由于战略导弹的体积大，它与防护精良的弹头相比较更容易被摧毁。特别是在导弹起飞的主动段，战略导弹上发动机发出的强烈热辐射不易隐蔽，最易受到攻击。用于这一飞行段的拦截武器主要是装有动能武器和定向能武器的战斗空间站(或称战斗空间平台)。据报道，利用战斗空间站，可在洲际弹道导弹起飞后2—5分钟之内将其中90%以上的导弹予以摧毁。

第二层，位于导弹飞行弹道中段(500—1000公里)。在这一段中主要利用非核拦截弹、电磁轨道炮和化学火箭战斗站，摧毁那些在第一层中尚未被摧毁的核弹头。

第三层，从未段的800—1000公里高度起直至最终的9—15公里高度。在这一段中使用的拦截武器主要是中程陆基反弹道导弹。

按照方案设计者的推断，第二和第三层防御系统总计可拦截约90%的洲际弹道导弹，连同第一层一起拦截总数可达99%。对于那些通过了三层防御

系统突防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最终将由地面反导防御武器对付。

这一战略防御计划设想采取以天基为主，广泛采用陆、海、空天基部署方式，研制和建立侦察、监视和跟踪系统，分阶段发展定向能武器和动能武器系统。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或称射束武器）。定向能系指光、电子或其它核粒子的强射束所产生的能量。定向能武器就是以光速或接近光速的速度将上述强射束产生的巨大能量定向地射击目标，从而达到摧毁目标的目的。由于射向单一，故作用距离远，能量集中且摧毁力强；由于射速快，故无需考虑提前量，因而射击精度高。美国当前研究的定向能武器主要包括：化学激光器、自由电子激光器、X 射线激光器和粒子束武器。动能武器是借高速运动的物体以直接碰撞传递能量的方式来摧毁目标。由于现代红外寻的和毫米波制导技术的进展使得这一途径较易实现。美国将主要研制三种动能武器。一是天基电磁轨道炮。二是非核拦截弹。三是天基化学火箭战斗站。

星球大战计划的发展调整与“智能卵石”方案星球大战计划提出后，在技术上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在动能武器方面，不仅成功地进行了用一颗非核弹头击中另一颗弹头的试验，还演示验证了用雷达制导拦截弹在大气层拦截来袭弹头。在定向能武器方面，进行了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的可行性研究，并于 1989 年 3 月用高级红外化学激光武器成功地拦击了一枚超音速飞行的 AGM—129A 巡航导弹。在监视、识别、跟踪和捕捉目标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发展。1989 年初，用“消防水他”激光雷达成功地分辨出了真假目标；用“三角星”卫星进行的空间试验，搜集了各种目标的数据，评价了探测和跟踪目标的能力。

另一方面，星球大战计划的推行也困难重重，其内容不断调整。1987 年，美国战略防御局提出分阶段部署战略防御系统的设想。布什执政后，虽然仍维持“分阶段部署”的基本框架，但研究的重点已从初期计划的定向能武器技术，转向采用火箭推进的动能拦截弹技术。1990 年 2 月，布什政府决定修改第一阶段战略防御系统的基本设计，把近期计划的重点从天基拦截弹转向由天基拦截弹派生的“智能卵石”。“智能卵石”系统，是一种以动能武器为主的天基防御系统，设想由部署在太空轨道上的 4000 余枚小型拦截导弹组成。每枚导弹重 4.5 公斤，采用精确星光惯性制导和激光成像雷达制导，内装重约 100 克的计算机，高度智能化、能监视、捕捉、摧毁来袭导弹。1990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又提出将战略防御由主要对付来自苏联的大规模导弹袭击，转变为同时也对付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可能的导弹袭击。1991 年 1 月，布什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调整为“对付有限打击全球防御系统”。1993 年 5 月，美国政府决定彻底放弃天基系统，集中力量发展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标志着星球大战计划的最初构想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国家防御系统”转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二）积极推进核力量现代化计划

美国在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仍然加紧执行进攻性战略武器现代化计划。

新型战略轰炸机陆续装备部队美国空军一方面积极改进 B—52 型战略轰炸机的机上装备，截止 80 年代末期已有 194 架 B—52 型轰炸机换装巡航导弹；另一方面加紧研制和装备新型战略轰炸机，到 80 年代末已有 100 架 B—1B 型轰炸机完成部署计划，B—2 型隐形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中，1989 年第

一架该型机出厂并试飞成功。

提高陆基洲际导弹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和生存能力 80 年代美国核武库中打击硬目标的主要武器是“民兵”型导弹，其弹头当量和命中精度都不高。1983 年美国完成了 300 枚“民兵”导弹换装 MK—12A 弹头的工作，其命中精度达 185 米，毁伤力提高了一倍，具备了打击一般导弹地下井的能力，但仍无法摧毁苏联加固的 SS—18 导弹地下井和坚固的地下指挥所。为此，美国还加紧研制能穿入地下 600 英尺，然后爆炸的高强度弹头。同时，为提高陆基洲际导弹的生存能力，加快进行机动部署，1989 年决定将部署在导弹井内的 50 枚 MX 导弹移到铁路机动轨道上，并加紧研制部署在公路机动发射车上的“株儒”小型洲际导弹。

海基核力量也进一步加强 1983 年 3 月，美国完成了在改装的 12 艘“海神”级潜艇上部署“三叉戟”型导弹的工作。1990 年初，第一批 2 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开始服役，每艘装备精度高、具有打击硬目标能力的“三叉戟”型（D—5）导弹 24 枚。

由于进入 80 年代以后，里根政府开始采取较强硬的对苏政策，提出“重整军备”的方针，美国核力量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 1989 年底，美国拥有陆基洲际导弹 1000 枚（民兵型导弹 450 枚、民兵型导弹 500 枚、MX 导弹 50 枚）、潜射导弹 640 枚（海神 c—3 导弹 208 枚、三叉戟型导弹 384 枚、三叉戟型导弹 48 枚）、战略轰炸机 311 架（B—52G/HI73 架、B—1B90 架、FB—111A48 架）。“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运载工具共计 195/件，虽然从总件数上略少于 80 年代初的 2048 件，但收于分导技术广泛运用于战略导弹，核弹头总数已超过 26000 个（其中战略核弹头约 10000 余个），总当量达 40 余亿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交，世界战略形势剧变。随着德国统一和苏联的解体，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两极冷战格局最终瓦解。1987 年 12 月，美苏签署了中导条约，1991 年 7 月和 1993 年 1 月，美苏（俄）又先后签署了第一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此期间，美国开始了对其核战略的重大调整，核军备发展的步伐有所放慢，核武库的规模有所缩小。但是，必须注意到，美国仍然在执行其核力量现代化计划，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而且，随着美俄间不对等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付诸实施，美国的核优势地位将更加突出，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上第一号核超级大国。

第三章 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又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关于其核力量的构成，美国1985财年国防报告中明确指出，它“包括战略进攻力量、非战略核力量、战略防御力量和支援这些力量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四大部分。

一、进攻性战略核力量

以 1958 年 4 月美国首次部署液体燃料“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和 1960 年 6 月第一艘“北极星”潜艇携带“北极星 A—1”导弹开始执行海上巡逻任务为标志，美国以战略轰炸机部队、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和潜射导弹部队所构成的“三位一体”进攻性战略力量开始形成，并到 80 年代末期发展到高峰。进入 90 年代后，美国开始对其核力量的结构和规模进行调整和削减。当前，在美国“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中，尚在部署的运载器为 1447 件（其中战略轰炸机 244 架，洲际弹道导弹 787 枚，潜射弹道导弹 416 枚），共拥有核弹头约 9885 个。1984 年，美国海上发射巡航导弹成功，这被称之为第 4 种战略力量。这四种力量各有长短，可以互为补充。

（一）战略轰炸机部队

战略轰炸机部队是美国最早组建用于投掷核武器的一支力量。早在 1944 年初，为准备投掷尚在研制中的原子弹，美国军方就着手改装当时被称作“空中堡垒”的远程轰炸机——B—29 轰炸机。第二年，B—29 战略轰炸机完成了对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使命。美军认为，战略轰炸机虽然突防能力差，但反应灵活，机动性强，可靠性好。因此，几十年来，美国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成为其“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力量中重要的一支部队。自 1992 年开始，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逐步由以核战为主转为在保留核战能力的情况下，重点执行常规任务。

目前，美国正在服役的战略轰炸机有 B—52G、B—52H、B—1B 和 FB—111A 等 4 个型号，共 244 架。编为 12 个战略轰炸机联队，其中有 3 个 B—52G 轰炸联队（辖 3 个中队），5 个 B—52H 轰炸联队（辖 6 个中队），4 个 B—1B 轰炸联队（辖 5 个中队）。另有 FB—111A 中程轰炸机 24 架（另有 8 架库存），编为 1 个联队，3 个中队。B—2 新一代隐形轰炸机的研制工作已基本完成，于 1993 年底开始装备部队。战略轰炸机部队 30% 的飞机处于 15 分钟戒备状态，有些飞机则在 3 分钟内即可起飞。

B—52G 和 B—52H 轰炸机 B52 重型轰炸机于 1947 年开始设计，1951 年完成第一架样机，1955 年进入现役，开始形成初始作战能力。1974 年起改进航空电子、武器投掷和防御设备系统。1982 年底在机翼下装有 12 枚空射巡航导弹的 B—52G 轰炸机中队编入战斗序列，1986 年装有空射巡航导弹的 B—52H 轰炸机具备初始作战能力。B—52G 轰炸机航程为 8340 公里（装核弹，空中不加油）。B—52H 轰炸机航程为 10934 公里（装核弹，空中不加油）。B—52G/H 携带的武器为空射巡航导弹、近程攻击导弹，以及 B43、B53、B57、B61、B83 核航弹；最大载荷为 24 颗核弹，通常载荷是内装 4 颗核航弹，外挂 6—8 枚近程攻击导弹，最多也可外挂 20 枚近程攻击导弹或 20 枚空射巡航导弹。

当前，美军在编 B—52 战略轰炸机 118 架，编为 8 个轰炸联队，辖 9 个轰炸中队。具体番号和部署如下：

——第 42 轰炸联队：辖第 69 中队，编 B—52G 轰炸机 15 架，驻缅因州；

——第 93 轰炸联队：辖第 328 中队，编 B—52G 轰炸机 15 架，驻加利福尼亚州；

——第 366 作战大队：辖 1 个轰炸机中队，编 B—52G 轰炸机 7 架，驻爱达荷州；

——第 2 轰炸联队：辖第 62、第 96 中队，编 B—52H 轰炸机 23 架，驻巴克斯代尔；

——第 5 轰炸联队：辖第 23 中队，编 B—52H 轰炸机 17 架，驻北达科他州；

——第 410 轰炸联队：辖第 644 中队，编 B—52H 轰炸机 16 架，驻密歇根州；

——第 416 轰炸联队：辖第 668 中队，编 B—52H 轰炸机 10 架，驻纽约州；

——第 92 轰炸联队，辖第 328 中队，编 B—52H 轰炸机 15 架，驻华盛顿州。

B—1B 轰炸机该型机是在 B—1 基本型上改进而成的，是一种超音速低空突防轰炸机。70 年代初即开始研制，1971 年卡待政府曾撤消该型机的生产计划，1981 年里根政府宣布恢复研制，1986 年底开始进入现役。这种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247 吨，航程 9800 公里，降低在高空飞行时的超音速最大值为 1.6 马赫。该型机身内有 3 个武器舱，翼下有武器投掷支架；内舱可携带 8 枚巡航导弹，25 枚近程攻击导弹，12 颗 B28 核航弹或 24 颗 B61/B83 核航弹；外支架可携带 14 枚巡航导弹或近程攻击导弹，8 颗 B28 或 14 颗 B43/B83 核航弹。由于 B—1B 轰炸机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装备了先进的雷达和导航系统；航程远，无需空中加油就能完成洲际任务；低空飞行时速大，雷达反射面小，因此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既可作为核航弹轰炸机和空射导弹的发射平台，又可执行常规轰炸任务。

美军在编 B—1B 战略轰炸机 75 架，编为 4 个轰炸联队，辖 5 个轰炸中队。具体番号和部署如下：

——第 7 轰炸联队：辖第 9 中队，编 B—1B 轰炸机 17 架，驻得克萨斯州；

——第 28 轰炸联队：辖第 37、77 中队，编 B—1B 轰炸机 26 架，驻南达科达州；

——第 384 轰炸联队：辖第 28 中队，编 B—1B 轰炸机 16 架，驻堪萨斯州；

——第 319 大队：辖第 46 中队，编 B—1B 轰炸机 16 架，驻北达科他州；

FB—111A 轰炸机该型机是从战术战斗机 F—111 改进而成的一种低空高速的中程轰炸机。1969 年 10 月开始服役，90 年代改装成 FB—111A 后，将编入战术空军。该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50 吨，航程 5370 公里（装核弹，空中不加油），最大航速为 2.5 马赫，最大截荷为 6 颗核航弹（B43、B61、B83）或 6 枚近程攻击导弹。

美军在编 FB—111A 轰炸机 24 架，编为 1 个联队；辖 2 个中队，分别驻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皮斯空军基地和纽约州的普拉茨堡空军基地。

B—2 隐形轰炸机新一代 B—2 隐形轰炸机研制工作已完成，第一架作战型飞机已于 1993 年底正式进入现役，编入驻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的第 509 轰炸联队。

美国战略轰炸机装备的核航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从初始阶段的几个型号发展到现在的 12 种型号系列。当前美国战略空军主要装备的核航弹型号是 B43、B53、B57、B61 和 B83。

B43 核航弹 1956 年开始研制，60 年代初开始部署。有 5 种当量，最小为 2 万吨，最大为 100 万吨。弹长 4.2 米，直径 46 厘米，重约 1 吨。这是一

种既可由远程轰炸机运载，也可由 A 型或 F 型攻击机携带的战略和战区兼用的核航弹。

B53 核航弹 1962 年开始部署，是一种特大当量的核航弹，当量 可达 900 万吨。主要由 B—52 远程轰炸机运载，已处于退役阶段。

B57 核航弹 1963 年开始部署，是一种由飞机投掷的深水核炸弹，主要用于反潜作战。该型弹当量较小，在 0.5 至 2 万吨之间。弹长 3 米，直径 37.5 厘米，弹重 347 公斤。该型弹可由战略轰炸机、战术攻击机、反潜海上巡逻机和舰基反潜直升机及垂直起降攻击机携带使用。

B61 核航弹 1969 年开始部署，是美军当前主要装备的一种多型号通用系列核航弹。该型弹有 7 种型号，其中 B61I 型为战略核航弹，当量 90 万吨，弹重 322.7 公斤，由战略轰炸机运载使用。其余 6 种型号都是战区核航弹，可以由多种 A 型和 F 型攻击机携带投掷。

B83 核航弹 1981 年进入研制阶段，1984 年开始部署，是一种为摧毁硬目标而专门设计的百万吨级核航弹。该型弹可由战略和战术飞机在低空作超音速规避机动飞行时投掷，投放高度可达 46 米，准确度高且当量又大，可用于摧毁加固的洲际导弹发射井和设在地下坚固掩蔽工事里的通讯、控制与指挥中枢。

（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军战略核力量中的一支主力。陆基弹道导弹命中精度高，戒备程度高，但生存能较差，从 50 年代底第一枚液体燃料的“宇宙神”导弹试射起共发展了四代陆基洲际导弹。目前，美军共装备 3 个型号的洲际导弹：民兵 号、民兵 号和 MX 导弹，总计 787 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均编入航天司令部所辖的第 20 航空队。辖 6 个战略导弹联队：第 44 导弹联队（民兵 导弹 25 枚）、第 351 导弹联队（民兵 导弹 91 枚）、第 341 导弹联队（民兵 导弹 121 枚、民兵 导弹 50 枚）、第 91 导弹联队（民兵 导弹 150 枚）、第 321 导弹联队（民兵 导弹 150 枚）、第 90 导弹联队（民兵 导弹 150 枚、MX 导弹 50 枚）。6 个战略导弹联队共辖 17 个中队，每个中队有 5 个发射中心。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分别部署在美国本土的 6 个基地里。

民兵 型洲际弹道导弹 1966 年进入现役，属于美国第二代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地下井发射。发射重量 31 吨，射程 12038 公里，命中精度 370—630 米，携带当量 1.2—1.5 百万吨的热核弹头 W56，主要用于打击中等硬目标，或者大面积军事和工业软目标，也可打击孤立目标。目前美军装备民兵 导弹 237 枚，载核弹头 237 个。编为 3 个导弹联队，辖 6 个中队，分别部署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密苏里州和蒙大拿州的基地里。

民兵 型洲际弹道导弹 1970 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属于美国第三代导弹。采用分导式多弹头，突防能力强，固体燃料推进，加固地下进发射，发射重量 35.3 吨，射程 14816 公里，命中精度 182—304 米，可携带 3 颗每颗当量为 33.5 万吨的 W78 核弹头。美军在编民兵 导弹 500 枚，共载核弹头 1500 个。编为 3 个导弹联队，辖 10 个中队。3 个民兵 导弹联队分别部署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的基地里。

MX 导弹 1986 年底开始装备部队，是美国第四代导弹。该导弹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弹道导弹，它能携带 12 个子弹头，但一般只装 10 个。使用当量可变（33.5—47.5 万吨）弹头 W87，发射重量 87.5 吨，射程 13000 公里以上，命中精度 90 米。美军当前装备 MX 导弹 50 枚，共携带核弹头 500

个。编为1个中队，驻在怀俄明州的沃伦空军基地。

（三）海基潜射导弹

海基潜射导弹也是美国战略核力量中的一支主力。从整个导弹武器系统来看，它由潜射导弹和核潜艇两部分组成。由于核潜艇能够长期在水下潜航，因此就导弹武器系统的整体而言，潜射导弹具有隐蔽性好、机动性高和突袭性强的优点，但它戒备程度差，命中精度低。美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潜射导弹，先后发展了“北极星”（A—1、A—2、A—3），“海神”（G—3）和“三叉戟”（1型C—4、2型D—5）三代潜射导弹和这三种型号的核潜艇。目前，美军装备战略核潜艇19艘，其中8艘编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设在夏威夷），11艘编入大西洋舰队（总部设在诺福克）；共装备潜射弹道导弹416枚，其中“三叉戟”型导弹（C—4）272枚，“三叉戟”型导弹（D—5）144枚，拥有核弹头3628个。美国战略导弹核潜艇昼夜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等海域巡逻执勤，在航率约为60%。其余导弹核潜艇分布在华盛顿州的班戈、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佐治亚州的金斯湾、关岛的普拉港、夏威夷的珍珠港、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等6个海军基地。

“海神”级潜艇1962年第一艘“海神”级核潜艇下水，1967年最后一艘交付使用。该核潜艇艇长129.5米，艇宽10米，排水量8250吨（水下），速度30节（水下），有16个导弹发射管，携载导弹16枚，载核弹头144—160个。每个弹头5万吨当量，美军正在服役的5艘“海神”级核潜艇均编在大西洋舰队。已陆续换装“三叉戟”型（C—4）导弹。

“三叉戟”级核潜艇1979年第一艘“三叉戟”级又称“俄亥俄”级核潜艇下水。是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导弹核潜艇，艇长170.7米，艇宽12.8米，水下航速为20节，水下排水量为18750吨，续航力为90天。每艘潜艇有24个导弹发射管，携载导弹24枚，载核弹头240个。美军正在服役的“三叉戟”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共14艘，其中8艘为“三叉戟”型（C—4）导弹潜艇，均编在美海军太平洋舰队；6艘为“三叉戟”型（D—5）导弹潜艇，在美海军大西洋舰队服役，大西洋舰队另外5艘“海神”导弹潜艇已陆续换装“三叉戟”型（C—4）导弹。

美国导弹核潜艇装备3个型号的潜射导弹：“海神”（C—3）导弹、“三叉戟”型（C—4）导弹和“三叉戟”型（D—5）导弹。目前，“海神”（C—3）导弹已陆续退役。

“海神”（C—3）潜射导弹1971年开始服役，属于美国第二代潜射导弹。发射重量29吨，载核弹头（W68，重100磅），射程4633公里。该型潜射导弹为二级火箭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采用W68/MK—3分导式弹头，平均每枚10个弹头，每个弹头4万吨当量。弹头装有突防装置，命中精度460米，可以打击大部分软目标，军用机场、基地、指挥和通讯设施。

“三叉戟”型（C—4）潜射导弹1979年底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是美国第三代潜射导弹。发射重量大于29.5吨，载核弹头（W76/MK—4），射程7400—7834公里。该型导弹采用三级火箭，配备W76/MK—4分导式多弹头，每枚导弹携载8个弹头，每个弹头当量为10万吨。命中精度460米，主要打击中等硬目标。

“三叉戟”型（D—5）潜射导弹1982年开始研制，1987年作飞行试验，1989年底进入现役。它是一种全新的导弹，发射重量57吨。该型导弹也采用三级火箭，配备MK—5分导式弹头，每枚导弹可携载核弹头15个，射

程 7413 公里。导弹为星光惯性数字计算机制导，命中精度 122 米。该型导弹打击硬目标的能力比“三叉戟”型（C—4）导弹高 3—4 倍，是美国第一种具有洲际射程的打击硬目标能力的潜射战略导弹。

（四）战略巡航导弹

战略巡航导弹是美国 70 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又一种战略力量，是美国“三位一体”进攻性战略力量的重要补充。战略巡航导弹指射程较远，携带核弹头，依靠喷气发动机提供动力，按预定程序沿非弹道式航迹攻击战略目标的巡航导弹，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的无人驾驶飞机。海射和空射巡航导弹具有命中精度高（命中精度为 30 米）、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能够超低空飞行（15—100 米低空飞行）等特点，生存能力、突防能力、打击硬目标的能力都很强，是比较理想的第二次打击武器。其弱点是飞行速度较低，只有 0.7 个马赫。

“战斧”海射巡航导弹 1972 年开始研制，1984 年开始部署，装备在水面舰艇和潜艇上。该型导弹可装 W—80 核弹头（也可装常规弹头），当量为 20—50 万吨。攻击型核潜艇采用垂直发射系统时，可装载 20 枚“战斧”海射巡航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等水面舰艇可装载 16—32 枚此类导弹。

AGM—86B 空射巡航导弹 1973 年美国空军开始发展空射巡航导弹。由于携载巡航导弹，能够大大提高战略轰炸机远距离攻击对方纵深硬目标的能力，因此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展被放到了更为优先的位置。AGM—86B 空射巡航导弹于 1981 年开始部署，由 B—52 和 B—1B 战略轰炸机运载。有翼、亚音速，飞行高度距地面 30.5 米，由地形匹配修正的惯性导航系统制导，射程为 2500—2965 公里，命中精度 10—30 米。它装有一个 W80—1 核弹头，重 1362 公斤，当量可调，约 20 万吨。

陆基巡航导弹是一种战区核武器，1984 年美国开始在西欧部署 BGM—109G 陆射巡航导弹，是海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发射重量为 1.2 吨，射程 2500 公里，携载当量为 0.2—150 万吨的可变核弹头，曾装备陆军和空军，共部署了 443 枚，根据《中导条约》，这类导弹已于 1991 年 6 月 1 日之前全部销毁。

二、非战略核力量

非战略核力量是美国整个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推行威慑战略和进行报复性反应的重要手段。它包括中程核力量、近程核力量及其发射平台，分别由陆、海、空军掌握。

（一）陆军的非战略核力量

美国陆军作用的核武器主要有三类，即导弹、核火饱和核爆破装置。

美陆军现装备“长矛”导弹。正在研制的导弹有两种：一种是“长矛”导弹的后继型，它射程远，突防和生存能力强，操作灵活；另一种是远距离发射的新式短程攻击战术导弹。1983年，美国曾一度在西德部署“潘兴”中程导弹，发射重量7.2吨，射程1300公里，装当量为5000吨——5万吨的核弹头（W85）。根据中导条约，美军已全部销毁“潘兴”导弹。

“长矛”近程导弹于1973年开始服役，可装核弹头和常规弹头，射程128公里；装W70—1或W70—2核弹头，当量为1—100万吨。现有各类弹头2000颗，其中905颗是核弹头。美陆军现有7个“长矛”地地导弹营，今后将减少到4个，每营12部发射架。

美陆军可发射核与非核两种弹头的火炮有，M—198—155毫米牵引火炮585门、M—109A1/A2—155毫米自行榴炮2437门和M—110A1/A2—203毫米自行榴炮1029门。M—198火炮于1979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最大射程30公里，发射核炮弹W48，当量为100吨。M—109A1/A2榴炮于1959年开始服役，最大射程30公里，也发射W48核弹头。M110A1/A2自行榴炮于1961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重24吨，最大射程29公里，发射W33核弹头，当量小于1.2万吨。

从60年代起，美陆军就有两种核爆破装置，即中型核爆破装置和特种核爆破装置。中型核爆破装置是一种重约181公斤的核地雷，当量为0.1—1.5万吨，由工兵分队埋设，用吉普车或直升机运送；特种核爆破装置也是一种核地雷，重约68公斤，当量不足1千吨，由特种部队潜入敌后埋设。

（二）海军的非战略核力量

美国海军的非战略核力量包括：核武器发射平台和核导弹、核航弹、核深水炸弹等核武器两大部分。海军非战略核力量建设，1990年增加了8个海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对3艘“洛杉矶”级潜艇进行了现代化改装，有2艘装有“宙斯盾”系统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航下水。

核武器发射平台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舰艇，一类是飞机。海军的大部分舰艇，都可作为核武器发射平台使用。绝大部分的潜艇、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都装备核武器。目前，美军共有核动力攻击潜艇87艘，其中34艘编入太平洋舰队，53艘在大西洋舰队服役。其中有13艘“洛杉矶”级潜艇是“专门的非弹道导弹”潜艇。这些潜艇都装有携带W55核弹头的“萨布罗克”导弹，W55核弹头重约300公斤，当量1—5000吨，1965年开始部署。“洛杉矶”级和“鲟鱼”级潜艇还装有携带核弹头的“战斧”海射巡航导弹。

美海军现有13艘航母（其中核动力多用途航母7艘）。太平洋舰队拥有6艘（其中核动力3艘），大西洋舰队装备7艘（其中核动力4艘）。这些航母上的A—7攻击机、F—18/A—18战斗机；SH—3和SH—60直升机等都有核作战能力。上述固定翼飞机可携带B43、B57、B61核航弹，当量100

吨到 5000 吨。 B57 也是一种深水核炸弹，由 SH—3 和 SH—60 直升机携带投放。

美军现有巡洋舰 53 艘、驱逐舰 38 艘、护卫舰 35 艘。这些舰只都具有核作战能力，它们的核弹头运载系统为“阿斯罗克”导弹、“鱼叉”导弹、“标准—2”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和直升机。存 19 艘巡洋舰和 31 艘驱逐舰装备“战斧”海射巡航导弹。上述所有战舰都装有“阿斯罗克”导弹。该导弹使用核弹头 W44，当量 1000 吨。“标准—2”导弹携带的弹头为 W80，当量 20 万吨。SH—60B 和 SH—2F 等直升机都有投放反潜核深水炸弹的能力。

（三）空军的非战略核力量

美国空军的大部分战术作战飞机都有核作战能力，它们是 F—4 战斗机、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F—111 战斗轰炸机和 A—7 攻击机。

F—4 战斗机作战半径为 1060 公里，机身中间和两翼下的 3 个挂架能携带核武器，载荷 980 公斤，携带的核航弹为 B28RE、 B43、 B57、 B61 和 B83。美军曾在欧洲部署过 F—4 战斗机中队。1992 年，该型飞机开始退出现役。

F—15 战斗机美军目前装备 F—15 战斗机 454 架，其中 F—15A/C/E3 个型号具有核作战能力。该机 1975 年装备部队，航程 2705 公里，它搭载的空地导弹可装核弹头 W25。

F—16 战斗机美军目前装备 F—16 战斗机 503 架，分为数个型号。其中 F—16A/B/C/D 具有核能力， 1978 年开始装备部队，可在其 9 个悬挂架中的 5 个上挂 5 颗核航弹(B43 和 B61)。有 F—111 飞机 237 架，其中 F—111A/D/E/F 有核作战能力， 1968 年开始装备部队，航程 2300 公里，可携带 3 颗核航弹，型号为 B43、 B57、 B61 或 B83。

A—7“海盗”攻击机该型攻击机是一种海、空两用飞机， 60 年代未形成作战能力，航程 1807 公里，有 8 个核武器挂架，可携带 4 种核航弹——B28、 B43、 B57 和 B61。

三、战略防御系统

美军认为、战略防御系统是其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防御系统的功能不仅仅在于防御，而且能极大地增强进攻性战略力量和战略威慑效应。50年代末，当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具有实战能力后，美国第一次感到了本土面临着核攻击的威胁，从而开始重视本土的防御，并着手建立战略防御系统。

60年代初，美国曾执行弹道导弹助推段拦截计划，并一度部署“奈基”地空导弹，用以攻击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这种导弹的射程为120—160公里，携带W31核弹头，当量约1千吨，但因性能欠佳而被撤消，仅作为战术防空导弹使用，并已于1984年退役。1974—1976年，美国为保护北达科塔州大福克斯的洲际导弹基地，曾部署过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即“卫兵”终端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是一个与苏联“橡皮手套”反导系统类似的分层防御系统，耗资79亿美元。该系统使用“斯帕坦”和“斯普林特”两种导弹，都装核弹头，射程分别为640公里和36公里。但由于该系统生存能力低，拦截代价了过高，不久便被放弃了。

由于没有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拦截攻击北美大陆武器的飞机便成了美国的唯一战略防御力量。北美的防空，由美国和加拿大的战斗截击机共同承担。这些飞机分别部署在美国本土的23个基地，加拿大的3个基地，阿拉斯加的4个基地，夏威夷和冰岛的各1个基地，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接到警报，便升空截击敌人的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专门用于战略防空的飞机有4种：F—106、F—4、F—15和加拿大的CF—10。情况需要时，也向空军，海军的其他飞机赋予战略防御任务。

1983年，美国里根政府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准备耗资数万亿美元建立一个以天基为主，集陆、海、空、天基为一体的多层次化的战略导弹防御体系。1986年，美国继组建“战略防御计划局”之后，又成立了航天司令部，负责研究和制定外空战场的天战理论、原则和方法；并设想在战略防御武器实际部署之后，统一指挥美国的战略防御武器系统。“战略防御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虽然在技术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困难重重。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不断作出调整。布什执政后，于1991年1月将“战略防御计划”（SDI）调整为“对付有限打击全球防御系统”（GPALS）优先发展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重点研制战场高空、区域拦截弹和陆基雷达；改进“爱国者”导弹系统，使其拦截高度增加一倍，地面防空区域扩大16倍；将“智能卵石”系统列入战略防御计划今后发展的重点，并继续进行天基动能武器拦截试验，准备采用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拦截助推段导弹。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后再次调整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重点。1993年5月，美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将国防部所属的“战略防御计划局”改为“弹道导弹防御局”，并决定放弃天基防御系统，集中力量发展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标志美战略防御的发展重点已由“国家防御系统”转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新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由陆军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爱国者”导弹攻进型和陆基增程拦截弹，海军的“双层”导弹防御系统及海军陆战队的防空导弹等组成。

四、战略指挥与控制系统

美国的核作战指挥与控制系统，是美国核力量的中枢神经，主要包括：战略指挥机构、战略预警系统和战略通信网三大部分。

（一）战略指挥机构

在美国，使用战略核力量的决定权集中控制在总统手中，投射第一枚核弹的命令由总统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参联会下设“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其职责是选定战略核攻击目标，排列打击目标的顺序，确定攻击各目标的兵力，拟定战略核袭击部队的统一作战计划。为了对三种核攻击力量统一使用和集中指挥，美国于1992年撤消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成立了战略司令部。作战命令下达的程序是：由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下达给战略司令部，再由战略司令部下达给核攻击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则由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直接向战略空军核攻击部队和有关战区总部所辖的战略导弹潜艇部队下达，美国实施核战的三级指挥机构是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战略司令部和其他有关联合司令部指挥所和部队指挥所。

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国家预备军事指挥中心和国家紧急空中指挥所。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是总统和国防部长指挥全球核作战的基本指挥所，建于1962年，设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内，指挥中心内设有数台大屏显示器，用以显示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及所需情报；设有多台大型计算机，用于处理各种数据；设有先进的通信联络设备，与各联合（特种）司令部及政府各部门传达命令和沟通联系。平时，指挥中心有13—16名军官和士兵昼夜轮流值班，每班由一名上将领班，随时将处理后的情报送交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预备军事指挥中心，设在马里兰州里奇堡地下设施内，装有同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类似的设备。一旦国家军事指挥中心遭到破坏，它可立即开始工作。国家紧急空中指挥所设在华盛顿郊区安德鲁斯机场的2架E—4A和2架E—4B飞机上。它一次可在空中续航12—16小时，空中加油后可达72小时以上。机上可容纳总统、机组人员及39名军事参谋人员。这些飞机平时在地面待命，进入一级战略时升空待命，下达首次核攻击命令后遂行指挥职能。

战略司令部和其他有关联合司令部指挥所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力量指挥系统进行了重大调整，1992年6月1日撤消了原负责指挥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部队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成了战略司令部，统一负责战时指挥空、海、军战略力量。战略司令部没有地下指挥所、空中指挥所和预备指挥所。地下指挥所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的半地下加固设施内，该设施是一座三层建筑物：第一层是环球气象中心，第二层是通信中心，第三层是控制中心，内装先进的数据处理、显示和通信终端等自动化指挥系统。空中指挥所建于1961年，有5—6架EC—135飞机值勤，其职责是，地下指挥所在核交战时被毁后，指挥战略导弹和轰炸机部队，并以重复线路与海军弹道导弹潜艇进行联系。战略司令部还有两个半加固预备指挥所：一个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代尔空军基地，另一个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奇空军基地。战略导弹核潜艇部队的4个中队则分别由欧洲总部、大西洋总部和太平洋总部指挥。

部队指挥机构洲际导弹部队有联队指挥所、中队指挥所和地下发射控制中心。战略轰炸机联队和中队、战略导弹核潜艇中队，也有自己相应的作战指挥和控制中心。

（二）战略预警系统

战略顶警系统主要是针对来袭的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尽早发现对方准备和正在来袭的各种武器目标并查明有关参数，综合处理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迅速向国家最高决策当局和军事指挥中心提供敌方战略袭击情报。60年代以前，美国战略预警系统的重点是对付亚音速战略轰炸机。60年代重点转向对弹道导弹的预警，包括对潜地弹道导弹的预警。70年代后，进一步扩大了预警系统的探测范围，增强对付多目标的能力和系统本身的生存能力。80年代以来，预警系统重点发展卫星预警技术、大型相控阵雷达和以大型计算机为基础的综合攻击判定系统。当前，美国的战略预警系统由远程轰炸机预警线、洲际弹道导弹预警系统、潜地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组成。

远程轰炸机预警线 该预警系统始建于1954年，50年末投入使用。远程轰炸机预警线大致沿距美国北部边境1600公里的北纬70度线配置，西起阿留申群岛，东至冰岛，全长约9600公里，共有31个雷达站，对时速960公里，从北方入侵的远程轰炸机可提供3小时的预警时间，在30秒钟内可将预警信息送到北美防空司令部作战指挥中心。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加拿大在同一地带修建由54个雷达站组成的“北方预警系统”以取代此前使用的31个雷达站。

洲际弹道导弹预警系统 该系统始建于1958年，1962年投入使用，由3个大型雷达站构成，分别设在阿拉斯加的克利尔、格陵兰的图勒和英国的菲尔代斯，主要用于监视和预报从苏联本土发射的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它由多种雷达组成，雷达最大作用距离为4800公里，可提供15分钟的预警时间，在10秒钟内可通过两条独立的通信线路，将信息传到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的导弹顶警中心，进行数据处理。

潜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 该系统1964年始建，1971年开始使用，1980年改建完毕。由分别设在马萨活塞州奥蒂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加利福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和得克萨斯州古德洛空军基地的4个大型相控阵雷达站组成，雷达最大探测距离达5500公里。该系统主要用于预警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袭击美国的潜射导弹，可提供15分钟的预警时间。此外，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还设有一个相控阵雷达站，该雷达站于1969年1月投入使用，负责监视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潜艇发射阵位，对潜射导弹袭击可提供6分钟的预警时间。

（三）战略通信网

战略通信网由若干通用和专用系统构成，它们将各指挥中心、作战部队、预警系统和情报部门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整个系统成为一个运转自如的整体。战略通信系统主要包括国防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国家军事指挥机构通信网和战略司令部通信网。

国防通信系统 它由国防通信局管理，由自动电话网、自动数字网和自动保密通信网组成，主要用于保障总统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部队、国防部长与各联合和特种司令部的通信联络。此外，它还还为固定基地、陆、海、空机动部队提供中枢网络。整个通信系统使用视距无线电、对流层散射、高频无线电、卫星和电缆等多种通信设施。

卫星通信系统 该系统主要用于传递战略指挥信息、情报数据、战略预警信息，是美军远程战略通信的支柱。目前使用的第二代系统，于1979年部署

完毕，共 5 颗卫星，除 1 颗备用外，其余均供全时通信。现在研制的第三代卫星通信系统抗干扰、抗核辐射能力均有很大提高。

国家军事指挥机构通信网 该通信网路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警报网、紧急电报自动传输系统，全球保密电话会议系统、全球情报通信系统、国家紧急空中指挥所通信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最低限度紧急通信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最低限度紧急通信系统由 3 部分组成：一是在核战争条件下仍可正常工作的抗毁低频通信系统；二是用于对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指挥通信的海军长波/超长波通信系统；二是在核战条件下，作为国家指挥当局核作战部队下达紧急行动指令的抗毁应急通信手段的紧急火箭通信系统。

战略司令部通信网这一通信网路主要由 6 个系统组成，包括向部署在全世界的轰炸机和导弹部队下达戒备、作战和演练命令的紧急警报系统；战略司令部用于指挥与控制下属部队的自动指挥与控制系统；连接美国本土及海外各下属指挥所和有关军事单位的、担任日常通信任务的战略司令部电话网；上连国家级军事指挥机构、下连国内外各战略空军基地的战略司令部电传网；在核战中能为国家指挥当局、战略司令部及其下属导弹、轰炸机、加油机部队指挥所之间提供抗毁保密通信的总体自动信息网。

B 篇 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与核战略

核威慑曾一直是美国核战略的核心。

——莱斯·阿斯平

第四章 美国核战略中的威慑

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述，美国的核战略是一个由多种具体政策组成的综合性概念。一般认为它主要由核威慑政策（又被称之为“声明政策”）、核力量使用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以及核军控政策构成。几十年来，在有关美国核战略的文件和著述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象“威慑”使用得如此频繁和广泛。威慑已成为美国核战略的核心和基本目标。如何增强威慑的可信度，如何运用威慑效应，如何达成有效威慑，是美国战略界和历届政府研究、辩论和不遗余力寻求解决的问题。本章就从“威慑”谈起。

一、核时代的威慑概念与威慑理论

（一）关于威慑的定义

在核时代，威慑已成为美国核战略思想的主体，其核心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

美国军界、政界和学术界对威慑的概念有多种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

——美国《国防部军事及其有关术语词典》1984年英文版的解释是：“威慑是使对方因惧怕不堪设想的后果而不敢采取行动。威慑是由于使对方受到确实存在的难以承受的报复行动威胁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美国前总统里根认为，威慑就是“使考虑袭击美国或者我们盟国或者我们切身利益的任何敌人确信，他们冒的风险远远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认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要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敢采取某种行动。”

这三种对威慑概念的解释大同小异，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使对方确信它的某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将使它无法承受，或者它采取这种行动所冒的风险将远远超过它所得到的好处；二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对方不敢采取这种行动。

威慑要素是指构成有效威慑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它通常是由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威慑信息传递三部分构成，三者缺一不可。

——威慑力量：或者叫实力，是威慑的物质基础，它必须具备可信性。核威慑力量要具备可信性，就必须具有有效的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

——使用力量的决心：就是在遇到威胁时把威慑之剑高悬在对手的头上，从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在核战略中，使用力量的决心必须要通过能够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具体方案来表达，而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语言上。

——威慑信息的传递：威慑首先是将国家实力及使用实力的决心作为信息传递给对方。当对方逐步接受这种信息，心理上的压力达到一定量时，就能获得威慑效果。如果只有威慑一方的实力和决心，而被威慑一方没有获得上述信息或获得的信息不准，同样不能构成有效威慑。

（二）现代威慑概念进入五角大楼

1945年8月，当美国把世界上最初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时，美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核战略”，只是为了尽早结束那场“常规大战”而使用了一种威力空前的新式武器而已。

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世界战略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东西方两大对立的阵营。美国利用它在战争中大大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仅充当了西方世界的霸主，而且企图攫取世界霸权。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在军事上凭借其独占原子武器的优势地位，以核讹诈为工具，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战略”。从战略思想来说，“遏制”与战前美国长期奉行的战略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该理论要求“持续地依靠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制止苏联扩张主义的一种工具，但不是在使用这支

军事力量、而是希望不求助于战斗就能支持美国的政策目标”。这标志着现代威慑理论进入了五角大楼，它在美国军事政策中的地位由 1945 年前的次要地位上升为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学术界围绕着核时代的特点和威慑战略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耶鲁大学伯纳德·布罗迪教授在其主编的《绝对武器》一书中提出，核威慑是核时代的必然产物；它只有在敌对双方能够互相遏制时才会有效；核武器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必须保持“充足”而“恰当”的威慑力量；今后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目的应当立足于避免战争，等等。这些观点是美国现代威慑思想中关于“核威慑”、“相互威慑”、“充分摧毁对方”等战略概念的最初表述。布罗迪等人的观点，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威慑战略的理论基础。

1949 年后苏联也开始拥有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政府于 1950 年 4 月制订了 NSC—68 号文件。该文件特别强调军事实力的遏制作用，认为没有压倒优势并随时准备使用的强大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政策。为此，该文件提出了大力扩充美国核力量的建议，主张要拥有威慑性的核报复能力，就必须增加核武器的储备、强化核报复力量的战争状态并扩大核报复力量的规模，以便有效地抵销苏联核技术的发展以及常规力量的优势，造成一种军事均势，借用军事实力去慑止战斗，从而使美国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NSC - 68 号文件确立了核威慑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使其成为美国核战略的基础。

1953 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但美国此时仍然占有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 年 1 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外交协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宣称“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要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企图是：依仗核优势，挥舞核大棒，玩弄“战争边缘”政策，妄图以核战争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一战略的作战设想是，要么不打，要打就是全面核大战，从核袭击开始，随之实施登陆和地面进攻。“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确立，产生了美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威慑战略。

（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的转变

透过美国关于核威慑战略的纷杂的文件和著述，不难看出其威慑思想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纯威慑”论到“实战威慑”论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发展演变是美国威慑战略发展演变的先导和体现，也是随着美苏战略核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所谓“纯威慑”论，即认为只要保持能给潜在敌人造成无法忍受的损失的第二打击能力，并能使潜在的敌人明白无误地看到，美国既拥有这种能力，又具有在必要时敢于运用这一能力的决心，就能有效地遏制任何形式的侵略。它具有大规模核报复和打击城市、人口目标的双重特点。

所谓“实战威慑”论，是相对于“纯威慑”论而言的一种核威慑理论。它强调有效的威慑不仅需要拥有阻止全面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能力，更需要拥有能实际进行有限核战争的军事实力和灵活反应能力，使潜在的对手意识到，无论他们发动何种形式的侵略，都无法达到胜利的目标或将会付出比所获大得多的代价。它具有灵活反应和打击军事目标的特点。

美国 50 年代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从本质上讲具有“纯威慑”的

性质。在这一时期，美国虽然制定了多个核战争计划和打击目标政策，甚至准备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该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以单一的大规模核报复为手段。以摧毁对方的社会、大量杀伤人口相威胁，来阻止一切类型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对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来说，该战略的威慑的可信性相当低。50年代以来爆发的许多小型或局部的常规战争证明，该战略虽有助于避免大战，却无法遏制“小战”。

从50年代后期起，苏联的核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美苏都开始大量装备和部署洲际导弹，从而都具备了对另一方国土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上互相威慑、互为人质的关系逐步形成。这标志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核武器的时代的结束，也使原来就存在许多内在矛盾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在这种形势下，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宣布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以使美国总统在危机或冲突情况下，能在从使用战术核武器到全面核大战等多种核作战方案中灵活选择，而不仅仅依靠大规模核报复。

与“灵活反应”战略相适应，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2年6月在“安阿伯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在核战争中，主要的攻击目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这一观点被称之为“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它标志着“实战威慑”思想的诞生。“限制损失”战略思想就反映了侧重打击军事目标和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由于“限制损失”不仅强调打击敌人战略进攻力量的重要性，而且首次提出了对导弹实施防御的主张，使“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更为实际。

然而，由于军事、政治和核技术上诸方面的原因，麦克纳马拉又不得不从“打击军事力量”的立场后退。“确保摧毁”成为60年代中后期美国核战略的基本内容。就战略思想而言，“确保摧毁”是从“大规模报复”思想演变而来的，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某些不同之处。例如，“确保摧毁”主要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大规模报复”则具有“第一次打击”的特点。但是，两者的基础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美国的核优势。此外，它们都主张打击城市、人口目标，都是以大规模的毁灭性核报复作为威慑手段，具有“纯威慑”的性质。

尼克松执政后，继“充足论”后又推出“施莱辛格主义”。“施莱辛格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危机控制升级”和“有限核选择”。它认为，如果使敌人感到难以实现其目标，或者虽然能实现目标但付出的代价过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样，从理论上讲就能制止敌人的侵略企图。因此，最可靠的威慑不是宣称要对敌进行报复，而是阻止敌人实现其目标的实战能力。这种能力越确实、越明显，威慑就越可靠。

卡特执政后期，于1980年7月签署了《总统指令第59号》，宣布执行“抵销战略”。其实，“抵销战略”并非一个全新的战略，从本质上讲，它是“打击军事力量”和“施莱辛格主义”的自然延伸。“抵销战略”强调必须使核力量的发展与运用政策相结合，并为核力量运用政策提出了四项具体指导原则，即：灵活性、控制升级、提高生存能力、重点打击军事力量和军政领导目标。这样，核力量运用政策就不仅仅是一项战时核武器如何运用的政策，而且也成为威慑本身的一个要素。

里根上台后，坚持了60年代以来美国核威慑战略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方

向，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实战威慑”思想。首先，确立了“打赢核战争”的思想，不但认为核战争是可能爆发的，而且在某种合理的意义上也是可以打赢的，为此，美国必须建立核优势。第二，进一步协调了核战略内部三个政策的关系，使核力量的发展、运用与核威慑政策更趋一致。第三，提出“战略防御计划”，特别强调战略防御的作用，认为有效的威慑不应仅仅依靠进攻和报复，有效而可靠的威慑应该是“多层次威慑”，它由三个层次构成，即直接防御、升级的威胁和报复的威胁。

综上所述，美国的核威慑思想不再是一个仅仅与大规模报复相联系的简单概念，在兼收并蓄传统理论和不断创新中，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僵硬到灵活的发展过程，逐步成为较为成熟、并力求与现实环境基本适应的一门理论。实战的因素或“实战能力”，不再被认为是与威慑无关的因素，恰恰相反，现代美国核威慑理论强调可靠的实战能力是有效威慑的基础和手段。

二、核威慑战略思想中的几个概念与内在矛盾

（一）“确保摧毁”及其他几个概念

如前所述，几十年间，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思想随着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和数量的增多，以及美苏核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在美国战略研究界和最高当局的分析、辩论和决策中不断发展、完善。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确保摧毁”是美国核威慑战略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在这期间，美国还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稳定性”和“战略防御”等概念。

确保摧毁：至 60 年代初，苏联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直接核打击的能力。这使美苏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首次提出了“确保摧毁”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即使在遭到第一次打击的情况下，美国战略力量仍应能够有把握地毁灭任何敌人。按麦克纳马拉最初所下的定义，“确保摧毁”的实质在于，保持高度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以便在核冲突的任何阶段，甚至在遭受第一次打击之后，都能给对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麦克纳马拉确定的苏联所无法承受的损失指的是：消灭苏联人口的 20—25% 和摧毁其工业生产能力的 50%。他认为，在遭受到这种损失后，苏联社会就不再具有按 20 世纪标准的生存能力。

自麦克纳马拉时代以来，为达成既定威慑目标而对确保摧毁能力提出的要求，发生过多次变化。70 年代中期，施莱辛格把“确保摧毁”定义为“摧毁对苏联战后恢复大国地位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 70%”。到了卡特政府时期，布朗又把这一标准修改为“毁灭苏联 200 个主要城市”的能力。不过，这些变化基本上是以麦克纳马拉最初的标准为基础的。

在从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末的几十年中，“确保摧毁”一直被视作核威慑的必要因素和慑止全面核战争的唯一手段而保留在“单一的统一作战计划”之中，成为美国“多层次威慑”战略的“最后一招”和“终极威慑”。

灵活反应：“灵活反应”是当代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核心。它的基本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纵向的灵活性，即强调对于包括常规战争、有限核战争直至全面核大战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冲突，美国都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和拥有在必要时将冲突逐步升级的能力；二是横向的灵活性，即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级别的冲突，美国必须掌握多种反应手段，制定各种反应方案，以便在各种复杂的形势下，都具有充分选择的余地并能够对冲突做出有力的、切合实际的反应。

“灵活反应”思想是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美苏互相威慑、互为人质关系的产物，目的在于摆脱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带来的僵硬性，重新获取战略主动权。70 年代以后，核均势的现实使“灵活反应”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在美苏双方都具有毁灭对方能力的情况下，要想既实现有效的核威慑，又不致于引起全面核大战，只能求助于“灵活反应”而别无选择。

从核战略的角度来看，实施“灵活反应”的决定性因素，是战略核武器打击硬目标的能力以及保障这一能力实现的战略 CI（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硬目标是指苏联战略核力量的主力——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 CI 系统，它们藏在坚固的地下井中，位置固定，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打击对象。有效的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可以保证美国对有限核进攻做出切台实际

的反应，并拥有在必要时发动有限核打击的手段。

战略稳定性：“战略稳定性”的含义是，敌对双方的核战略力量只要保持实质上的均衡，那么任何一方无论是率先发起第一次打击还是被迫进行报复，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在危机时期，双方就会克制自己而不会铤而走险。

60年代之前，美国拥有明显的核优势，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因此在此期间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并不关注战略稳定性问题。60年代之后，美苏的核武器逐渐形成了“恐怖均衡”的态势，美国把其核战略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战略稳定性问题日益重视。美苏1972年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通过加强防御来削弱对方的核报复能力，从而破坏在“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苏联掌握了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和打击硬目标能力的迅速提高，美国更加担心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它企图通过两种方法来增强战略稳定性，一是提高其战略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如研制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二是通过核军控谈判。美国认为，核军控谈判能提高一方估量和预测对方现在和未来军事力量的能力，从而增加双方关系的稳定性，减少一方作出加速扩张军备、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等过度反应的可能性。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发展打击加固硬目标能力强的新型核导弹也使苏联担心这有可能破坏战略稳定性。

一般认为，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下，适用于第一次打击的武器，如命中精确度高、威力大、打击加固硬目标能力强的分导多弹头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最可能破坏战略稳定性、导致局势动荡和增加核战争风险的武器，战略防御武器也被认为是不利于战略稳定性的；而适用于第二次打击的武器，如潜射弹道导弹等，则被认为是不威胁战略稳定性的武器。

战略防御：美国核威慑战略中的“战略防御”指对核武器所进行的防御。它包括“积极防御”（主要是反导力量、反潜力量以及战略防空力量等）和“消极防御”（民防设施等）。美国认为，可靠的战略防御能力对于增强威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敌人无法达到发动侵略的既定目标，或者使敌人的侵略得不偿失。

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1956年10月在一篇题为《一项国家军事计划》的论文中最早系统地阐述了战略防御的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既有积极措施又有消极措施的大陆防御体系，并将其作为“灵活反应”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于1967年首次部署了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该系统采取两层设防以保卫美国的一些重要城市。首先以“斯帕坦”导弹在650公里高空拦截来袭弹头，然后以“斯普林特”导弹在30公里上空拦截漏网的敌弹头。由于这种反弹道导弹系统技术上不过关和美国当时将其核战略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基础上，因此美苏于1972年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对双方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进行限制。尼克松政府开始将原来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减少为1个，其作用改为保护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后因该系统难以拦截分导多弹头导弹的进攻和可能造成放射性污染，于1975年将其关闭。

1983年3月，里根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设想从陆地到太空建立一个由于基定向能和动能武器、预警卫星、地基定向能武器和非核拦截弹组成的多层次、多手段防护网、拦截并摧毁99%以上袭击美国的战略导弹，从而

使苏联的核武器“成为没有威力的、过时的东西”。这是美国企图用增加战略防御能力来提高威慑能力和用“确保生存”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的一个重要尝试。1989年布什政府上台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其它各种因素，对“战略防御计划”进行了多次调整，先后提出了“智能卵石”计划和“对付有限打击的全球防护计划”。由于美苏冷战的结束、天基武器和定向能武器的一些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以及战略防御武器的研制耗资巨大，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不久放弃了原有的“战略防御计划”，而将重点转向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部署在美本土的陆基反导弹系统。总的来说，今后美国将不会放弃“战略防御”的概念，但其在美国核战略中的地位、重要性及其内涵将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不断调整。

（二）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内在矛盾

美国核威慑战略自问世以来，就存在着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伴随着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演变也在不断发展，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与核战略都产生了重大的制约作用。这些内在矛盾主要有：

1、战略企图与核威慑效应的矛盾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过分夸大、过分相信或过分依赖其核武器的作用。50年代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期间，美国曾企图依靠其核优势，以大规模核报复相威胁，来慑止各种类型的战争。但事实证明，美国的核武器虽然有助于避免世界大战，但却无法遏制各种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60年代至80年代末实行“灵活反应”战略时期，美国制定了多个核战争计划，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库，并大大提高了核武器的质量，但这种过度依赖核武器的做法，也使美国的军事战略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越来越趋于僵硬和缺少回旋机动的余地。这表现在，美国既要随时对苏联威胁使用核武器，又要力图避免使用核武器，因为核武器一旦使用，它的大规模毁伤能力将毫无疑问地使美苏双方同归于尽。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保持相当大的核武库，其目的是企图将核武器作为维持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领导者”地位的重要工具。随着政治上对使用核武器牵制的增大和核武器在美国军事力量中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希望核武器在其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与它实际所能起的作用之间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

2、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矛盾美国的核武器与非核武器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军事战略决策者企图处理好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武器作为“剑”，而把常规军事力量作为防御对方进攻的“盾”，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改变动辄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转而采用“灵活反应”战略，将常规军事力量作为“剑”，而将核武器作为“盾”。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相比，其地位有所下降。在冷战时期，核武器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因为它要用核武器来威慑苏联的常规优势和庞大核武库。现在核力量虽然仍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不是基石。

3、打击城市目标与打击军事目标的矛盾美国核战略的核战争计划和打击目标政策曾在重点打击城市目标还是重点打击军事目标问题上多次调整。“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美国计划在核战争爆发时立即动用全部核武器，达到一举毁灭敌人，取得战争胜利的目的。麦克纳马拉60年代初曾提出把军事力量作为核战争中的主要打击目标的政策主张，但不久又修改自己的立场，更多地强调打击城市目标的“确保摧毁”概念。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时期又放

弃了前一时期准备重点打击苏联城市的核战略指导思想，转而强调用数量有限的战略核武器“有选择”地首先打击军事目标。1977年上台的卡特政府开始一段时间主张采取以打击城市为主的核战略方针，但1980年又宣布实施侧重打击军事目标的“抵销战略”。这些调整一方面表明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越来越接近于成为一种可以在实践中使用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国既想在核战争中取胜，又担心在核战争中与对手同归于尽的矛盾心理。

此外，在“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结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

美国战略核力量是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个部分组成的，称为“三位一体”的结构。但长期以来，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由空军管理和指挥，战略核潜艇由海军管理和指挥，陆军则管理和指挥着陆基战术核武器，这三大军种之间经常为了争取核武器的项目和经费而产生矛盾和争吵，致使国防部不得不在各军种之间采取平衡的办法，让各军种都能得到新的核武器项目。这种做法往往大大增加了用于核武器的经费开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冷战结束后，美国于1992年6月1日成立了负责战时统一指挥空、海军战略核力量的战略司令部，使上述矛盾有所缓和。

三、延伸威慑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延伸威慑”是美国二战结束后奉行的军事战略和核战略指导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向美国的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强调运用核武器威慑苏联，不论苏联对美本土或盟国发动核或常规进攻，美国都准备以核武器进行回击。

“延伸威慑”是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格局下，美国力图凭借其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核武器就是当时高技术的结晶），充当世界领导，维护它在世界范围既得利益的产物。在 40 多年的冷战时期，这一战略思想虽然不断有所调整，但是它的实质基本上没有变化，表现出下列鲜明的特点：

- 把苏联看作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和在世界范围争夺影响的主要对手；
- 高度依赖核武器，核武器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
- 通过对盟国提供核保护伞，把美自身的防务与盟国的防务联系起来，实际上达到控制盟国，以及在尽可能远离美本土的地方保卫美自身安全的目的；
- 以欧洲为中心，第一位目标是确保西欧不落入苏联控制。美在战后不久（1949 年），即推动成立了北约军事集团，以核武器为后盾，与随后形成的华约军事集团在欧洲重兵对峙，这成为美苏和东西方军事对抗的中心。在亚大地区，美国也向其亚太盟国特别是日本提供军事保护和核保护伞。

战后 40 余年来，“延伸威慑”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还是相反，这无论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官方以及在学术界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延伸威慑”的成就是明显的，它挫败了苏联的扩张政策，保障了西欧和日本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防止了两个超级大国迎头相撞而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特别是“延伸威慑”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有力的军事手段，为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但是，持批评观点的人们则认为，战后 40 余年形势的发展表明，世界的总体和平得以维持，以及冷战的结束，是有着许多重要而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的，首先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进行不懈努力的结果。而以威胁使用核武器为特征的“延伸威慑”从一开始即表现出许多固有的矛盾以及道义上的非理性，从而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的稳定与安宁。

对美国自身来说，延伸威慑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后果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过度的依靠核武器，使美国冷战时期的军事战略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越来越趋向僵硬和缺少回旋机动的余地。50 年代末期苏联开始掌握能够对美国本土实行摧毁性打击的战略核力量之后，“延伸威慑”包含的这一内在弱点便暴露得越加明显。它首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联盟关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西欧国家就越来越怀疑“延伸威慑”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正如西欧在 60 年代初期经常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问题所表达的那样：在苏联对西欧入侵时，美国会冒纽约或芝加哥被摧毁的危险而去拯救巴黎或者伦敦吗？同时西欧也惧怕美国如果真的孤注一掷对苏联的军事行动进行核报复，西欧则难免在这种核交锋中首先遭殃。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在美国国内也普遍存在，即认为“延伸威慑”留给美国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与对手同时毁灭，另一个是投降，当然这两种选择都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核武器事实上的难以使用，还使得美国在冷战时期一直不能有效地对付第三世界地区性冲突。冷战时期发生的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古巴危机、中东冲突以及越南战争中，据报道美国都曾经认真地考虑过使用核武器，但每次都不得不放弃了。古巴危机中美国最接近于准备使用核武器，但也因此几乎引起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核对抗的风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威胁使用核武器，实际上反而只能加剧地区的紧张和危机形势。

第三，在政治上，“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反映了一个超级大国力图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充当世界警察的心态。这就经常使美国与其它国家（包括美的盟国）产生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当美国企图在世界各地积极建立一个由它主导的安全安排时，往往与许多中小国家处于对立的局面，促使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甚至反美情绪的高涨。

第四，在道义上，“延伸威慑”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往往使美国在世界上陷于孤立。例如，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威胁使用可能使人类遭受毁灭的核武器之上，实际上是把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作为一种人质，这是不人道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国为此积累了如此庞大的核武库，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其它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这也是其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这种道义上的缺陷而带来的政治上的被动，集中表现在美国自身战略的需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强烈要求尽快制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的重要障碍。而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又力图制止核武器扩散，使人不得不怀疑，美国执行的是双重标准政策：一方面声称自己的核武器将继续成为军事力量的“不可代替的支柱”，并且力图使世界相信美国的核武器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核武器绝不能扩散到其它国家，甚至对无核国家发展正当的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能力也心惊肉跳。这在道义上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

第五，在经济上，“延伸威慑”战略还对美国国力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延伸威慑”实际上无节制地扩大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在冷战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的紧张和冲突，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看成是美苏争夺影响的反映，因而都被纳入美国的安全计划考虑之中。美国的防务摊子越铺越大，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多，这即使对一个超级大国，也有力不从心之感。以里根政府为例，为了加强对苏的威慑态势，8年中共花费约2万多亿美元用于防务，军事力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这种过度依赖军事力量确保美国安全的做法，则导致了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地位的相对跌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和债务国家；被忽视的国内大量社会问题，更在严重腐蚀着这个超级大国的社会基础。

第六，“延伸威慑”战略也促使美苏两个军事超级强国之间、乃至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止一次地将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从理论上说，“延伸威慑”是着眼于防止战争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一旦威慑失败时，具有对付对手的能力，使其感到发动战争得不偿失。在这一意义上，“延伸威慑”的立足点又是放在准备打的基础上的。就对前苏联的核威慑而言，它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向苏联表明美国确有使用足够的核能力来保卫自己及盟国的决心，以慑止苏联不致发动进攻；其二，如果威慑失败，则美国必须有能力在任何一级水平上作出核反应，使对手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第三，在冲突中，美还必须能够迫使对手以对美有利的条件，尽早接受谈判结束战争。按照这一要求，即使在美国丧失核垄断、美苏处于

相互威慑的情况下，美国也必须在核力量方面实际上保持一定的优势，才能确保，“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这反过来又使苏联感受到核威胁，全力采取相应措施，以不落在美国的后面。战后40余年来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就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水涨船高地发展的，而且愈演愈烈。基本的格局是，美国在核武器技术及品种方面总要领先数年，苏联则亦步亦趋，在后紧跟，其结果是双方无论在核武器的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都有了空前规模的提高，摧毁能力按总爆炸当量计算，80年代未曾达到160亿吨这样荒唐的程度，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准备了3.2吨TNT炸药。

美苏全面规模的军备竞赛实际上还成为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全球范围扩散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它迫使其它国家出于不同目的和在不同程度上跟上美苏竞赛的步伐。当前，南亚、中东地区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没有公开的核武器国家，而且核扩散还有继续发展的危险。在生化武器方面，按照美国自己的统计，约有30个国家正在发展化学武器，有10个国家正发展生物武器。这首先使美国自己感受到新的巨大威胁。

为制止军备竞赛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后果，美国在冷战时期一方面加强与苏联对抗的态势，一方面又积极寻求与苏联在军备控制领域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和妥协，使双方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处于可控制的和可预测的状态，在一旦出现危机时，避免两国卷入冲突。同时，美国还一直拉苏联共同巩固双方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核优势，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以避免对两个核超级大国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核平衡造成冲击。但是，它们本身在军备控制领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延伸威慑”战略思想使美成为世界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的领头羊，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这一事实看来是难以否定的。

以上可以看出，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要大大超过其积极的方面。它在两个实质性问题未处理好。一是核武器在军事战略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二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究竟应是什么？事实表明，只要美国仍然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威胁使用核武器基础之上，它带来的问题就要比它企图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另一方面，在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声称它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但是其真正的战略目标似乎是要保持其对世界的领导地位，这常常使它难于对自己真正的战略利益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把自己的手伸得大长，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延伸威慑”战略思想。从现在来看，美国为了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在这个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还不想完全放弃“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它仍将把核威慑作为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将向西欧、日本等盟国提供一定程度的核保护伞。但是，它也对“延伸威慑”进行了重要调整。例如，将由主要对前苏联进行核威慑转变为既对原苏联地区进行核威慑，也对拥有或可能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核威慑。又如，美国现在向西欧、日本继续提供核保护伞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防止德国、日本拥有核武器。

第五章 美国核战略的发展与演变

美国的核战略经历了一个形成、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主要是用于对付苏联的，而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美苏核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需要，五角大楼也多次调整其核战略。本章将沿着历史的轨迹，对美国核战略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分析和考察。

一、核战略的萌芽时期

(1945 年至 1952 年)

从二战结束至 1949 年，美国垄断着原子武器。虽然 1949 年后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但远不能与美国相比。在这一阶段，美国拥有的核武器的数量还不算多，但增加的速度很快。1946 年，美国只拥有 9 枚原子弹，到 1951 年已增加到 65 枚。由于这些核弹中大部分是战术核武器，战略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只有远程轰炸机，对苏联进行直接核打击的能力有限，因此美国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战略是以常规军事力量为主、以核武器为补充手段，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

在这一阶段，美国的核战略尚处于初始状态，还远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正如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文中所说的，美国当时只是“把原子武器作为摧毁敌人工业中心的一种更有效的爆炸物”来看待，并且主要是从用数量不多的原子弹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的角度来制订核作战计划和部署核武器的。这种核讹诈战略实际上是萌芽阶段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由于此时美国本土还不存在受苏联核武器威胁的问题和二战末期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因此当时的美国高级将领普遍认为核武器是一种“绝对武器”，相信用威胁使用核武器就可以维持“世界秩序”，并竭力主张一旦苏联集团胆敢走出西方的“包围圈”，美国将以原子弹这一“大威力武器”，连同美国强大的常规力量予以毁灭性打击。

在此阶段，美国在国外建立了许多战略空军基地，其中包括能运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基地。这些基地从西欧、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四个方面构成一个战略弧形地带，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战略包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与以后的发展大不相同之处，是各个战略空军基地较为靠前。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可携带核弹的远程轰炸机航程有限，要打击苏联腹地的重要战略目标，飞机从美国本土起飞难以到达。

二、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3年至1960年)

50年代初，世界军事形势中出现了一些新因素，这些新因素促使美国采纳“大规模报复”战略。

首先，朝鲜战争的进程大大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美国不但未能在战争中取胜，相反却遭到一次次失利。数十万美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抗击下，被打回到“三八线”。在朝战期间，美国曾准备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但“由于种种军事上的或政治上的原因，终于决定不使用这种特殊武器（即原子弹）”。朝鲜战争的失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对打长期消耗性常规战争的失望感，许多军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在朝鲜战争中无节制的发展，使美国经济难以承受，要求改变以常规军事力量为主、以原子武器为补充手段的战略。

其次，美国核武器数量迅速增加、质量迅速提高。1952年，美国核弹头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5%，达到1000个。当年11月1日，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氢弹，并于1953年开始部署第一枚氢弹MK—18，与此同时，美国还首次部署战术导弹用的核弹头和开始为280毫米加农炮配备核炮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政府自认为具有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

第三，苏联的核力量开始进入较快发展的时期，但其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只有数量有限的中程螺旋桨轰炸机，因此还难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的核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1953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前任的防务政策进行详细的评估后，决定采用主要依赖核力量的“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年1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首次全面阐述了这个战略。他说，实践证明，“没有哪一种局部防御能力能够独立遏制共产主义世界的强大的地面力量。必须用具有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威慑力量来加强局部防御。”他宣称：“美国政府今后将以核升级相威胁来威慑或阻止共产党发动的局部战争；俄国人的冒险主义必将以自己的生存为代价，因为美国将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迅速进行报复”。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企图是：依靠核优势，挥舞核大棒，玩弄“战争边缘政策”，来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该战略强调核武器“剑”的作用，而把常规力量只作为防御对方进攻的“盾牌”。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绝对的核优势，因此必须利用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就以战略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力求迅速置敌于被动之中；要注重“第一次打击”的效果，首次突击就能摧毁对方的主要工业中心、核基地和战略轰炸机基地，使对方丧失核还击能力，在短期内取得战争的胜利。总之，要么不打，要么打一场全面核大战，尽量避免卷入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

根据“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把发展核武器放在军队建设的突出位置。朝鲜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和裁减三军员额的同时，把核武器的发展排在军备发展之首，军费开支大幅度向核武器的研究与发展倾斜。在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期间，美国国防预算占联邦

预算的比例，从 1953 年的 64% 下降到 1960 年的 47%；美军现役总兵力从 355 万人减少到 247 万人，削减幅度达 30%。其中，陆军从 20 个作战师减到 14 个，削减员额达 43%；海军减少了 300 艘舰艇（包括 6 艘航空母舰），削减 24.4%；空军裁减了 15 个联队，削减幅度为 18%。相反，用于核武器生产与研制的费用则大幅度增加，仅 1956 财年至 1957 财年就从 9.95 亿美元增加到 20.95 亿美元。在军种发展中，以空军、特别是战略空军为主，1955 年开始部署的 B—52 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到 50 年代末增加到 500 架。

为了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通过区域性联盟和双边条约扩充或增建前沿核基地，企图对苏联、中国形成“核包围”。在欧洲，美国在西德、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建立战术或中程导弹基地。在亚洲，美国在日本、冲绳和关岛增建了战略轰炸机基地，在韩国、台湾也部署了核武器，从 1954 年至 1960 年，美国在海外的战略空军基地由 14 个增加到 20 个，在本土的基地由 37 个增加到 46 个。

但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核战略的“幼年时期”。该战略在实践中遇到了种种难以解决的难题。首先，苏联的核武器与运载工具迅速发展，具有了能直接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美苏之间出现了核僵局。1957 年 8 月 29 日，苏联的 SS—6 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全程发射试验成功，同年 10 月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的战略火箭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于 1960 年 1 月宣布成立。此外，苏联还开始部署可供战略轰炸机运载的战略核航弹。这种情况使美苏进入了相互核威慑的时期，从而使得美国进行核打击的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美国以大规模核报复进行威慑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

其次，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而在这一时期美国虽然制定了多个核战争计划和打击目标政策，甚至准备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以单一的大规模报复为手段，以摧毁对立的社会、大量杀伤人口相威胁，来阻止一切类型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对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来说，该战略的威慑的可信性相当低。50 年代以来爆发的许多小型或局部的战争证明，美国的核武器根本无法对这些战争产生遏制作用，“大规模报复”战略虽有助于避免大战，却无法遏制“小战”。

第三，美国核武器发展与常规武器发展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海军新的造舰计划的费用被削减 1/3，战略空军被迫裁减了一些执行非核任务的部队，陆军和海军也砍掉了原计划增强机动力和火力的项目。这种将发展核武器建立在部分牺牲常规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做法，致使美军的部队结构严重不合理。到 1960 年，美国核弹头的数量从 1952 年的 1000 枚猛增到 18500 枚，但三军总兵力却降至朝战以来的最低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政界和学术界自 50 年代中期以后围绕军事战略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以陆军原参谋长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和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代表的一批人物，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泰勒在其 1959 年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说：“我认为，作为战略指导概念的大规模报复已经到了末路，目前迫切需要对我们的战略上的需求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其全盛的时期也只能使我国的领导人有两种选择：发动全面核战争或是妥协和退却。自从这种战略最初出现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世界性事件，这些事件证明了它的效力值得怀疑，并且揭露了它的

荒谬性。朝鲜战争，即美国在其原子垄断时期所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就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无能的明显反证。1945年以后发生的其他许多场有限战争——让我们只举几个例子：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以及越南、台湾、匈牙利、中东、老挝事件——也都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已经防止了大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却没有维持住小和平；也就是说，没有消除那些只比全面战争浩劫较小的动乱，维护住和平。”他还指出：“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要求对我们的军事战略进行重新评估。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原子垄断地位，我们很可能在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落后于苏联。我们还没有反弹道导弹作为抵销这种进攻优势的防御手段。我们还没有作出切实的努力，以对抗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我们的很多军事盟国都患着贫血症。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比赛，因而必须改变这种局势。”

约翰·肯尼迪也指出：“过去10年的教训告诉我们，单靠战略力量还不能保卫自由”，而美国政府的现行军事战略使美国“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只能在“要么毁灭世界，要么投降”之间作出选择。1958年8月，肯尼迪在美参议院的发言中，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战略不仅使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更严重的是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导弹差距”，美国“正在迅速地走向导弹落后于苏联的危险时期”，再这样下去，“自由世界将会慢慢地被吞食掉”。

三、灵活反应战略

(1961年至80年代末)

“灵活反应”战略的概念最早是马克斯威尔·泰勒在1956年10月发表的论文《一项国家军事计划》中提出来的。他说：“国家军事计划必须与所有其他的国家计划合为一个整体，并保持一种军事实力作为其基本目标，这种军事实力既能对付全面战争，又能对付不够全面战争条件的侵略。……一项健全的国家军事计划的要素，必须包括对下列各项要求的适当规定：遏制全面战争，遏制局部侵略，击败局部侵略，以及在全面战争中赢得能够导致持久和平的胜利”。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泰勒更明确地指出，上述那篇论文的基本点，是为了“强调我们武装部队组织的灵活性以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军事挑战，终于使‘国家军事计划’中所包含的理论得到一个称号：灵活反应战略。……这个计划将十分灵活，能够随时适应目前还预料不到和无法预料的形势。它将避免依赖一种单一的武器系统和单一的战略概念——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根本错误所在”。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大选中也提出，美国需要建立以“灵活反应”为基础的军事战略，采取一种更有力、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法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只要美国在不升级到核战争的前提下保持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就将取得胜利。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于1962年10月任命泰勒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正式采纳“灵活反应”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五角大楼把战争分为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三种，并主张“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在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和特种部队的建设，“以便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以适合于情况的武器和部队作出反应”。“灵活反应”战略的目的是，使美国在危机或冲突的情况下，能在从特种战争到常规战争、从使用战术核武器到全面核大战等多种作战方案中灵活选择，而并不仅仅依靠大规模核报复。

“灵活反应”战略还改变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以核武器为“剑”，以常规军事力量为“盾”的做法，而将常规军事力量作为“剑”，核力量作为“盾”。该战略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同的方式应付不同的威胁，准备打各种战争，特别是“有限战争”或“特种战争”，以达到扑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遏制苏联和中国的目的。

1965年五角大楼还采纳了军事理论家康恩提出的“逐步升级”的战略理论，从而将灵活反应战略进一步具体化，即把战争从危机到全面核大战之间分为7个阶段、44个阶梯和6道门槛；其规模由小至大，由特种战争到局部常规战争，再到使用核武器，直至全面核战争。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逐步增加给对手的压力，逐步扩大战争，以迫使对手让步，从而以较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或不战而胜。

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技术和弹道导弹命中精度的提高，为“灵活反应”战略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迅速掌握敌军事力量部署的准确情报才有可能进行灵活反应，而弹道导弹命中精度的提高又为准确打击军事力量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

肯尼迪政府在要求美军具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同

时，还对美国核战略和核力量建设方针进行了修改。此后，直到里根政府，历届美国政府在“灵活反应”战略的大框架下对核战略某些方面进行过多次具体调整。这些调整虽然在是重点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还是重点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工业目标，以及在核力量的规模、种类和优先次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未脱离“灵活反应”战略根本指导思想。这些具体的战略调整主要有：

（一）限制损失战略（1962年至1964年）

至60年代初，苏联不仅拥有了战略轰炸机，而且还拥有了洲际弹道导弹，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直接核打击的能力。尽管这一能力还不大，但美国已不能袭击苏联而不受苏联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提出“限制损失”（Damage Limiting）的核战略，主张在危机时以进攻性核武器先发制人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摧毁苏联战略核武器基地，以减少对方还击时美国所受到的损失。但是，当时美国的核武器命中精度还较差，难以准确地打击点状硬目标。为此，美国从60年代中期起由过去侧重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转变为侧重提高核武器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同时“限制损失”战略还主张实施“积极防御”（建立反导弹系统）和“消极防御”（民防）来减少己方的损失。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最早提出了侧重打击对方军事目标的思想。1962年5月5日，麦克纳马拉在雅典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理事会上说，由于弹道导弹精确度的改进和核武器爆炸威力的提高，美苏都有了能摧毁对方目标的更大把握；因此，如果只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而让平民所受的危险主要来自放射性污染，就有可能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同年6月16日，麦克纳马拉在位于安阿伯的密执安大学发表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观点。他说：“应当以一种和我们过去对待常规战争相同的态度对待（一场核战争的）基本军事战略。这就是说，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此后，麦克纳马拉还在美法津基金会指出：“我们的核力量可有多种使用方式。我们也许会实施一次性的大规模打击，或者，可使用报复力量在敌第二个攻击波到来之前便消灭其基地，以此来限制我们及盟国的损失。我们可将我们的力量作为谈判的筹码——通过威胁发动进一步攻击——在有利于我们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强大的后备力量都可让敌人意识到应避免攻击我国城市并停止战争。我们的新政策使我们具有灵活性，可在数个作战计划中进行选择”。

麦克纳马拉宣布的新战略主张有两层含义：第一、主要打击苏军事目标，摧毁或削弱苏对美国的核打击能力；第二、向苏示意，我不打你的城市，你也不要打我的城市。无论是压制苏联的核打击能力，还是影响苏联的核打击意图，目的都在于限制其对美城市目标的毁伤，所以这个战略被称为“限制损伤战略”。

“限制损伤”战略的特点是否定了两个极端，试图取一种较为中间的立场。

首先，该战略否定了“最低限度威慑”。最低限度威慑是指“在遭受苏核攻击后，美仍保留有报复能力，并有很大的把握摧毁苏绝大多数城市。但与此同时，美不具备打击苏军事目标的能力。”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9月提交的致总统备忘录（DMP61）中阐述了否定最低限度威慑的两条主要理由：“威慑可能失败，或者由于偶发或非蓄意的原因导致战争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打击苏重要军事目标的能力可对限制损伤及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停止战争起到主要的作用；另外，从美可能对苏发动（核）攻击来回击其对盟国进攻的角

度看，最低限度威慑态势将削弱我们威慑苏进攻的能力”。

同时该战略也否定了“全面第一次打击能力”态势。“第一次打击”在核战略领域中的特定涵义是：“实质性地消灭被攻击一方的用于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美空军强烈要求拥有这种能力以攻击苏报复力量，将其削弱至无法对美人口和工业造成严重损伤。麦克纳马拉在同一文件中强调了美不应追求这种能力的三条理由：1、花费极大；2、会触发大规模军备竞赛；3、几乎可以肯定无法实现。因为苏可部署不易被摧毁的导弹潜艇和加固洲际导弹发射井。以后，他又补充了一条重要理由，即如果美拥有了这种能力，危机稳定性将受到破坏，因为苏可能会因为害怕美会发动第一次打击从而被解除核武器，因而在危机出现时先行进攻。麦克纳马拉在1963年12月致总统备忘录中写到：苏在美打击军事目标进攻面前易受损性的降低“从建立一种更加稳定的态势角度看也许是件好事，……这可减少其对我们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诱发动机”。

限制损伤战略的提出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准备打有限核战争的主张，但在当时就完全推行这一战略存在着一系列障碍。首先，美国在60年代初重新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从50年代末期开始，受所谓“导弹差距”(Missile Gap)之争的影响，美国加速了核力量的建设步伐，权力量在短短几年内急剧增长。到了60年代初，又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这一点很快被刚刚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所证实。同时，由于潜基核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就为“确保摧毁”战略的提出创造了基础和前提。

第二，国内外舆论界的反对。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在美国拥有明显核优势的情况下，主张打击苏联军事目标，这无异于追求“第一次打击”。苏联的反应也很强烈。苏军领导人断言：“以消灭敌人军事有生力量来制胜的战略不可能是从‘报复’的思想出发的，它首先是从预防性军事行动(Preventive Action即“第一次打击”，作者注)和达成突然性出发的”。不利的国内外舆论是新战略执行的巨大困难所在。

第三，西欧盟国的反对。在美国的西欧盟国看来，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与他们的战略利益是相佐的。西欧历来认为，把苏联的城市作为核打击的抵押品，是遏止苏联对西欧发动进攻的最有效威慑。因而他们担心，美国放弃了打击苏联城市的威胁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苏联入侵西欧的威慑。它们更为担心的是，美国执行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将导致美国战略核力量与北约防务的“脱钩”。

第四，军事上缺少可行性。麦克纳马拉提出“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基本目的是要减少美国在核战争中的损失。而实行这一战略的军事前提是苏联接受并按同一原则进行战争，然而，苏联不仅批评而且公开否定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苏联军事战略要求，“在核战争爆发初期的几小时或几分钟就立即对美国前方和后方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目标同时发起‘密集的核突击’，在短时间内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苏联的这一立场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核武器数量上，美国拥有压倒的优势。如果苏联拿它极为有限的战略导弹同美国导弹“对着干”，这无疑于自杀。既然无法使苏联实行同一战略，美国单方面实施“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五，平息预算之争的需要。美国各军种之间为了争夺更多的军费，历来存在着预算之争。由于肯尼迪政府采用“灵活反应”战略，这种竞争更加激烈。空军利用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提出了大量采购新式

导弹、战略轰炸机的计划；而陆军则借口执行“二个半战争”战略，也要求得到更多的拨款。为了平息预算之争，麦克纳马拉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基调。

（二）“确保摧毁”战略（1964年至70年代初）

尽管“限制损失”和“打击军事力量”的政策主张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准备打有限核战争的基本思想，但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困难和障碍，迫使麦克纳马拉不得不从其原来的立场后退。就在他安阿伯讲话以后仅仅半年，也就是1962年底前后，麦克纳马拉就明显地改变了观点。他声称，美国并不想寻求一个广泛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态势。同时，在公开场合里，开始较多地提及“确保摧毁”的概念。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参联会主席泰勒将军首次比较明确的提出了“第二次打击”的观点。他认为，苏联人“一定会充分利用隐蔽、分散和机动等方法来保卫他们的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先发制人的攻击，美国的轰炸机和导弹也不可能消灭苏联的导弹威胁。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以攻击苏联导弹力量为基础的目标系统并没有什么用处。防止全面原子战争以确保我国的安全，只能依靠没有纯军事的办法可以消除这种危险。”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灵活反应”战略的军事计划中，“应首先进行的就是双管齐下地扩展两种‘快速修补’：把原子威慑力量现代化并保护这种力量；建立我们有限战争的反消耗战力量，以抵消目前占优势的苏联地面力量。然后，我主张为大陆空防，为全面动员的各种需要和为预防威慑失效而采取的各种保证生存的措施，进行经过仔细选择的准备。”“实行这种战略概念所需的各种力量应包括：1，原子威慑力量，包括其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这两个组成部分；2、美国国内的大陆空防力量；3、我们的海外驻军；4、美国国内的战略后备力量；5、为美国国内的后备力量提供战略机动性和维持海空航路所需的海空力量。”泰勒特别强调：“原子威慑力量的现代化和对这种力量的保护应该占最优先的地位。……我们必须建立一支显然既经受得住突然袭击，又能使苏联受到它经不起的损失打击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纳马拉接受并发展了泰勒“第二次打击”的思想，并对他自己原有战略思想进行了一些修订，于1964年提出了“确保摧毁”的理论。但他也并未放弃“限制损失”的思想。他强调，美国不仅需要具有“确保摧毁”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拥有实质上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思想相一致的“限制损失”的能力，并把这两项能力同时列为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目标。

“确保摧毁”战略思想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即在第二次打击时，把对方的大多数城市加以摧毁，以此威慑对方，迫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突袭。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从“大规模报复”战略演变而来的。这两种战略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主张优先打击城市、人口目标，都是以大规模毁灭性核报复作为威慑的手段；不同之处是，“确保摧毁”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大规模报复”则具有“第一次打击”的特点。

1966年前后，美国政府开始突出强调“确保摧毁”的作用，“限制损失”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五角大楼1967年度的国防报告宣称：“我们的一切手段必须优先用于确保摧毁的能力方面。……限制损失的计划不论花多少钱，都永远不能代替确保摧毁的能力在威慑方面的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是我们摧毁进攻者的能力，而不是部分地限制我们自己遭到损失的能力。

为了实现“确保摧毁”的战略设想，五角大楼要求建立一支能对城市目

标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力量，以保证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能通过还击一举摧毁苏联 20—25%的人口和 50%的工业。这实际上是将苏联的大城市作为抵押品和核人质，以遏制苏联的战略核攻击。

60 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成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MAD）。它的基本含义是，只要美苏双方都拥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认了的现实，一种由于美苏力量对比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威慑”的现实。恰如主持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打过的比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大国比作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能杀死对方，但是必须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三）有限核选择战略（1974 年至 70 年代末）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苏的核力量对比形成大体均势。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核进攻，苏联也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同时，战略核导弹的命中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打击军事目标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修改了前一时期准备重点打击苏联城市的核战略指导思想，转而强调用数量有限的战略核武器“有选择”、“有限制”地打击数量有限的军事目标，首先是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基地。这种核战略被称为“有限核选择”战略。该战略与 60 年代初期的“限制损失”战略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之处是，它们都强调进行“有限战略核战争”，都想对战略核战争加以限制，都强调先打击军事目标。其不同之处是，“限制损失”战略的目的主要是削弱对方的核还击能力，“有限核选择”战略的目的主要是动摇对方发动核战争或进行核升级的决心，而不是降低对方的核还击能力。不过，“有限核选择”战略并没有完全放弃打击城市和工业目标的思想，当时美国政府批准的一项核战争计划中就曾设想，用 8 枚核弹摧毁莫斯科商业区内 40 平方英里以内的一切东西。

“有限核选择”战略又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它体现在 1974 年国家安全决策第 242 号备忘录中。其基本内容是：

1、控制升级。它要求在威慑一旦失败、核冲突爆发时，美国应有选择地、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以便“在尽可能低的冲突级别上谋求战争的早日结束”。

2、建立可靠的战略预备力量，它要求建立一支由多种核力量组成的，具有生存能力的战略预备力量，目的在于实施“战争间威慑”和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迫使苏联接受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冲突。

3、阻止苏联的战后恢复。在控制升级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剩余战略核力量的目标是“摧毁对敌人……在战后恢复大国地位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 70%，使美国在一场核大战后先于苏联恢复强国的地位”。

从军事技术上来说，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对“有限核选择”战略的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技术对美国战略核力量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增加了美国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和灵活反应的能力；第二，使核弹头数量大量增加，从而能确保较多的核弹头在苏联第

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保持可靠的报复能力。尼克松政府还提出了“战略上充足”的新原则，以作为战略核力量建设的新标准。这就是：1、保持战略力量实现有效还击的能力，以便遏制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发动的突然袭击；2、通过降低美国战略力量易受打击的程度来确保稳定性，并“使苏联在危机局势中首先实施突击的动机缩小到最低限度”；3、“不容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苏联给美国的居民和工业造成的损失会大大超过美国力量能给苏联造成的损失”；4、确保美国免遭小规模核突击或意外的突击。这种“足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在高军备水平上争取核均势的理论，它促使了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这种“充足论”也标志着尼克松政府摒弃了美国长期以来在核力量建设上的“优势”标准。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到70年代初，美国由于长期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和扩大侵越战争，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了重大危机，国力争剧衰落。而苏联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

第二，美国已不再享有战后近1/4世纪的核优势，第一次面临美苏核力量接近均衡的局面。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充足论”只不过是这种现实的承认与不想在今后的核军备竞赛中落后的企图的反映。

第三，当时美国正企图与苏联暂时缓和一下它们之间的争夺，并在核军备控制谈判上取得一定的进展。

第四，美国国会要求大幅度削减军费的压力。

但另一方面，“有限核选择”战略又促使美国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MX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计划是从1971年正式开始，1974年进入预研阶段；三叉戟潜地弹道导弹是在1971年开始预研计划，1973年进入工程设计阶段，1975年11月三叉戟C4导弹首次飞行试验，1977年开始投入生产；新型战略轰炸机B-1B是1970年开始发展，1974年该机的基本型首次飞行，1976年12月生产；空基战略巡航导弹是1976年开始发展，1979年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把战争样式区分为4种，即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五角大楼要求在侧重准备打常规战争的同时，重视准备打战区核战争，并且认为常规战争有可能导致战区核战争。美国在1976年版的《作战纲要》中指出：“随着更多的国家掌握核力量以及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变得切实可行，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好处减少了。由于这一变化并为了适应较小规模冲突和灵活反应的需要，美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战区核武器。……随着战区核武器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过去从常规战争转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核战争，现在又转到常规战争和战区核战争”。

（四）抵销战略（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1977年上台的卡特政府开始时认为，只要美国拥有足够的打击苏联城市的核力量，就能慑止苏联发动核战争，而不必耗费巨额军费发展打击军事目标的核能力。因此，卡特政府上台不久就否定了有选择、有限制地打击军事目标的战略，采取了以打击城市为主的核战略方针，并取消了一些新型核武器的发展和生产计划。

但卡特政府执政后期，苏联扩张的势头增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趋于紧张。同时，苏联关于核战争的一些观点使美国感到担心。这些观点有：1、至

少在某些情况下，苏联领导层似乎认为苏有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2、苏联将军事力量而不是将经济能力作为核交战中最先攻击的目标；3、苏联企图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延长核交火的时间；4、苏联领导层企图在爆发核战争的情况下保存其政权及其统治工具的有效性。

在这种情况下，在经过 18 个月左右对美国核战略的重新评估后，卡特总统于 1980 年 7 月签署了总统第 59 号指令，宣布美国正式开始实施“抵销战略”。美国防部长布朗在 1981 年国防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该战略，“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威慑充分有效，美国必须能够按照苏联发起进攻的类型和规模作出反应。我们的目的是，在最可能广泛的方案的范围内，使苏联无法达到胜利的目的（苏联人也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遏止苏联发动的低于全面核攻击以外的各种突击。为此，我们要使苏联领导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在他们发动了这样一种（有限）核进攻后，我们决不会仅仅僵硬地在要么毫无反应、要么彻底毁灭苏联两者之中作出选择。”

布朗认为，“抵销战略”的目的是要美国努力保持军事（包括核）力量、应急计划及指挥控制能力，并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以核武器进行任何一种规模的突击或在战争的任何阶段使用核武器，都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不管苏联人会给胜利下什么样的定义。”

从实施的角度来看，“抵销战略”要求核力量和核战争计划，既能对大规模攻击实施全面核报复，又能对小规模攻击有选择地使用核力量。也就是说，既能打全面核战争，也能进行有限核战争。

“抵销战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战略，也不是美国战略理论的根本改变。它起源于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经由“有限核选择”战略发展而来，本质上是“有限核选择”战略的自然延伸。然而，在新的条件下，它又有重要的发展：

1、“有限核选择”战略与“抵销战略”都主张核冲突一旦爆发，要有限地使用核武器，并控制升级。不同的是前者强调控制核武器使用的规模，以便在尽可能低的程度上结束冲突；后者则强调在冲突的整个范围内，都要能按对方攻击的类型、水平作出适当的反应。

2. 侧重打击军事目标是两者的共同点，但“有限核选择”战略要求侧重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而“抵销战略”既强调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也强调打击其常规军事力量，还把苏联军事、政治领导层也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在控制升级失败的情况下，“有限核选择”战略主张以“阻止苏联战后恢复”作为打击目标政策的指导方针，而“抵销战略”则要求侧重打击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和各种资源。

3、施莱辛格在宣布其“有限核选择”理论时，认为这一新理论不一定要求新的核武器。而“抵销战略”则明确指出，必须使核力量的发展与政策的要求相适应。为此，卡特政府后期要求发展、采购新的武器系统，如 MX 导弹和战略 C3I 系统，认为这对于新战略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4、“有限核选择”战略和“抵销战略”都主张制定既具有灵活性又切实可行的核战争计划。但前者强调其战时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其在战前的威慑作用，并认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并让苏联认识到美国有这样的计划，就会增强核威慑的可信程度。

“抵销战略”与“确保摧毁”战略有许多重要的区别。首先，前者是指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资源；后者则指摧毁城市、

人口、工厂等。因此，前者企图直接击败敌人，而后者则企图惩罚敌人促其崩溃。

其次，尽管“抵销战略”与“确保摧毁”的目标都是威慑，但在如何运用核武器和如何增强威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强调，核武器不仅用来遏止战争，一旦威慑失败，它可以用于传统意义上的作战。后者则侧重强调核武器遏制战争的作用。

第三，前者既强调战前威慑，又强调“战争期间威慑”，不仅要遏止全面核大战，而且要遏止任何一个级别的核战争，使威慑从有限核冲突到全面核大战的整个范围内部发生作用；后者则强调“战前威慑”，认为核冲突一旦爆发，威慑即告失败，下一步只能是使用核武器打全面核大战。

根据“抵销战略”，五角大楼要求大力加强核力量，使其不仅要有对苏联的工业目标进行摧毁的打击能力，而且还要具备对各种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攻击的能力；在打击军事目标时，既能袭击机场、兵工厂、坦克集结点、部队集结地等目标，又能袭击设在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指挥中心等硬目标。

卡特政府也很重视战区核力量的建议。布朗在 1978 年的《国防报告》中指出：“有了战区核力量就有了进行选择的余地，不必马上动用战略核力量，而且可增加威慑作用”。他认为，美国的战区核力量是联系常规力量和战略核力量的一个有形的纽带，并主张美国要侧重于强大的常规防御，但如果常规防御失败，则只能求助于审慎的核升级方针，直到以使用战略核力量对苏联本土实施大规模核攻击相威胁。美国学者罗杰·斯皮德认为，由于“把常规力量、战区核力量和战略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整体……美国便可准备应付苏联任何规模的挑战，不管是战区规模的，还是战略规模的，都可应付自如。美国不再搞那种苏联极易看出是讹诈的核升级威胁，而是要使苏联面对失败的前景。”

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后，继承了“抵销战略”，但也作出了若干调整，并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这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打赢核战争”的观点。这种观点是 8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首先，核战争是可能爆发的；其次，在某种合理的意义上，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第三，美国要打赢核战争，必须建立核优势。里根政府执政后，逐步采纳了上述理论，并公开宣布，在威慑失败时，决心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在 1985 年的国防报告中，里根政府将它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该报告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这句话下了如下的定义：“所谓‘有利’，就意味着，一旦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必须取胜——我们不允许侵略战争为侵略者带来任何好处”。至此，里根政府实际上宣布了核战争是有可能打赢的。

2、谋求战略优势。里根政府认为，战略优势是打赢核战争的基本前提。为达到获得战略优势的目的，里根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充分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在核武器质量上获取对苏联的优势。为了加强核力量的发展，里根政府于 1981 年开始推行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它的目标是要“获得一支比历届美国总统所计划的更力强大的现代化战略力量”，使之“成为易于对国家政策作出反应的协调一致的工具，此外还要消除核部队的能力与我们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某些严重矛盾”。该计划要求所有战略核力量，包括战略进攻力量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战略 C3I

系统，都要实现现代化，并把提高快速打击硬目标能力和持久生存能力作为重点。到 1987 财年末，美国已部署 27 枚 MX 导弹和 60 架 B—1B 战略轰炸机。到 1991 年，新一代战略导弹和轰炸机占美国战略进攻力量的 25%；战略核弹头的 45% 得到更新；“侏儒”型小型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隐形轰炸机和先进的机载巡航导弹等新型战略进攻武器的研制工作也得到加强。

二是力图以军备控制谈判限制和削减苏联核武器的数量。《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就是这种方针的产物。与此同时，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核武器的数量也有所发展。1981 至 1982 年度，美国战略核弹头总数约为 9,000 个，核弹头总数约为 25,000 个。到 1985 年，战略核弹头总数已接近 10889 个，核弹头总数据称已超过 26,000 个。从总体核力量来看，特别是从对硬目标的毁伤力能力方面看，美国仍稍占优势。

三是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试图“改变核威慑基础”。1983 年 3 月 23 日，里根宣布美国开始实施以建立太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目标的“战略防御计划”。这是里根政府在有关核战略问题上，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

以战略防御能力加强威慑的思想，并不是里根政府的创新。它源出自 60 年代麦克纳马拉提出的“限制损失”战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曾实际发展和部署过“卫兵”反导系统。只是由于当时反导技术尚不成熟，无法达到对导弹实施有效防御的目标，加上对苏“缓和”的政治需要，美国于 1972 年同苏联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停止了反导系统的部署。

但里根政府特别强调了“防御”因素的作用。它认为：有效的威慑不应象它传统的形式那样，仅仅靠核报复。有效而可靠的威慑应该是“多层次威慑”，即由三个层次构成：（1）直接防御；（2）升级的威胁；（3）报复的威胁。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安全可靠的威慑力量是防御，而“战略防御计划”的任何进展都会加强防御能力，因而也就增强了威慑。

里根政府还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点就在于，通过发展新型的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以战略进攻力量为主实施威慑的历史，把核威慑的立足点移到战略防御力量上来，即把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转变为“相互确保生存”的状态；以“战略防御计划”为代表的战略防御力量一旦付诸实施，必将为威慑提供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基础”。

里根政府宣称，建立可靠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的威慑，是“战略防御计划”的最终目标；在这种可靠的防御系统建立起来之前，美国还将继续奉行以战略进攻为主的核战略，但要把战略防御因素逐步注入到现行威慑理论中去。

1989 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在执政初期基本继承了里根政府的防务政策，强调仍然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奉行以优势的核实力为后盾，以“威慑”为核心，以灵活反应为基本手段的核战略。

在核力量发展上，布什政府企图充分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力争在战略武器质量上，保持并发展对苏联的优势。由于美苏当时正在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布什政府一方面企图在苏联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达成有利于美国的条约；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削减的前景，相应调整“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结构，加紧研制采购和装备新型武器以替代可能削减或计划淘汰的武器，以便在战略核武器数量较大幅度削减后，确保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基石的核威慑不被削弱，并保持优于苏联的有效的核实战能力。在 1990 财年，布什政府仍突出强调核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虽然削减了一些常规武器项目，但核力量现代化所需的开支仍然得到了保

第六章 当前美国核战略的调整与走向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已经彻底终结，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开始大幅度调整美国的核战略。

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1991年华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苏冷战的结束和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两极军事对抗格局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华约与北约在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独联体国家对美国的核威胁也大大减少；但另一方面，“美国面临着新型核威胁”。这种新型核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来自前苏联的核威胁。“前苏联仍保留着数万枚核武器，它正面临着政治上和安全上很大的不稳定”，存在着由于政治动乱所引起的意外的或未经授权而发射导弹的危险；俄罗斯仍是唯一拥有能够毁灭美国的巨大核武库的国家，它的发展前景很不确定，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即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完全民主和面向市场的国家，它也会有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利益”，何况还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即它“可能经过动乱之后成为同西方敌对的一个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从而“重新出现旧冷战的某种新翻版”。

第二，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美国国防部1993年10月发表的《防务全面审查报告》认为：“除5个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俄、法、英、中）外，世界上至少有20个国家已经拥有或试图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大多数美军可能卷入的地区，如北朝鲜、波斯湾地区，美军的潜在对手已经拥有了化学、生物武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如北朝鲜、伊拉克和伊朗）显然正在努力获取核武器。”根据以上判断，美国政府提出有必要对其核战略进行调整，在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确保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从而使美国能应付新的形势和威胁。

（二）美国仍企图把核武器作为其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

美国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世界上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具有全球性力量、作用和影响的唯一超级大国，在世界上起着领导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正在相对下降，而日本、德国的崛起有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的军事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核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将保持强大的核威慑，作为支撑其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工具。

（三）美俄的核裁军取得较大进展

1991年7月美国与前苏联，1993年1月美国与俄罗斯分别达成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美国和俄罗斯将分别把它们战略核弹头从1991年的12118枚和10909枚，减少到3500枚和3000枚。双方届时将不再保留包括重型洲际导弹在内的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并大幅度减少潜射核弹头。此外，1991年至1992年美国与俄罗斯领导人还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单边核裁军倡议，其内容包括拆除双方的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停止某些先进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与此同时，根据《中导条约》的规定，美俄已全部销毁了它们的中程和中短程核导弹。这些表明，美俄已开始了真正的核裁军，以往那种“水涨船高”的争夺核武器数量优势的军备竞赛已基本结束。美俄核裁军进程的重大进展促进

了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前苏联地区庞大核武库的裁减所需时间较长和该地区形势不稳定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仍不明朗，美国当前仍将促使拥有核武器的前苏联国家根据条约按时完成削减和销毁核武器作为其核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

二、冷战结束后美国朝野关于核战略的大辩论

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围绕未来应采取何种核战略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对冷战后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制定将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的各种观点可大致分为二派，即最大威慑力量派、最小威慑力量派和中等威慑力量派。最大威慑力量派主要由在冷战时期持核实战观点的人组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布热津斯基、利德、韦勒等；最小威慑力量派主要由在冷战时期持“确保摧毁”观点的人组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卡尔·凯森、乔治·拉思詹、麦克乔治·邦迪等；中等威慑力量派是近几年产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尼采、米切尔·梅泽等，这三派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存有较大分歧。

（一）核武器在冷战后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中的作用问题

最大威慑力量派认为，在冷战后时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要起独一无二的领导作用，而不只是保卫本国利益；核武器必须继续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安全结构中，美国应该继续成为“核威慑的主要来源”。该派主张，在新形势下，美国的核武器应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继续保持“延伸威慑”，向美国的盟国提供核保护，以对付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可能的核进攻，并抵销盟国内部要求拥有自己核武器的压力；第二，慑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第三，在必要时，在第三世界使用核武器，以“对付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装备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侵略者或可能打垮美国轻型的快速应急部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强大常规军事力量”。

最小威慑力量派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放弃它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占统治地位的作用，美国虽然不应该重新回到孤立状态，但它应该采取比过去稍低一些的姿态，并将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作用让一部分给德国和日本。该派主张，今后美国核武器的唯一作用是慑止对美国的直接核打击，因此应该将美国的核威慑转变成某种形式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或“有限核威慑”。

该派倾向于否定“延伸威慑”，认为在冷战后时期，由法国和英国核武器所组成的独立的欧洲核威慑力量已足以对付俄罗斯的核力量，美国的“延伸威慑”已失去其必要性。最小威慑力量派也不赞成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战争中起广泛作用的计划，因为这种计划可能对核不扩散的努力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导致巨大不稳定的多边核军备竞赛。

中等威慑力量派认为，在冷战后时期，美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平衡者和“诚实的掮客”的作用；现在对美国及其关键的国家利益的直接军事威胁很少，但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产生新威胁，如东欧的民族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和势力的发展、在俄罗斯重新出现独裁政权等。因此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应侧重于制止这些威胁上升，而不是对这些威胁的现状进行威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核武器的作用虽然应比它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大大缩小，但仍要比仅用于慑止对美国使用核武器这一作用复杂一些。该派主张，美国的核武器应该用于帮助防止俄罗斯对美国进行核攻击的条件重新出现，而不是仅用于慑止这种核攻击。也就是说，核武器应该发挥比作为核报复工具更大的作用。

中等威慑力量派不强调“延伸威慑”。它认为，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现在

都在大幅度削减核武器，英、法核力量与俄罗斯核力量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如果今后英、法的核武库能靠自己慑止俄罗斯的核讹诈和入侵，那么美国的“延伸威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过，这还将取决于英、法是否能向德国提供足够的核保护伞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能削减到多低的程度。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的核武器仍应起一种平衡的作用。该派还认为，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美国的核武器将不可避免地同地区战争有关；不过，如果美国公开宣布将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也纳入核武器的目标范围内，并按照此目的建设美国的核力量，就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这种扩散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感。

（二）核打击目标政策问题

最大威慑力量派主张，由于俄罗斯有可能重新成为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因此美国应继续实施与冷战时期基本相似的核打击目标政策。例如，利德和韦勒等人 1991 年在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研究报告中，仍建议将俄罗斯的军政领导指挥所、核设施、机动导弹以及支持战争的工业设施作为美国核打击的目标。该派还主张将某些拥有或将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美国核打击目标的清单。

最小威慑力量派强烈反对打击军事力量的目标政策。例如，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这种政策“加剧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了发生偶发性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达成有价值的军备控制协定的障碍，增加了美国军事力量在经济上的花费”，因此“对打击军事力量的做法进行限制应该成为最优先处理的问题”。

中等威慑力量派主张采用一种新的打击非核军事力量的目标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不会威胁到任何一方的核威慑能力，因此不像打击军事力量政策那样造成不稳定性；第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打击军队的战略，又可以避免打击城市政策在道德和可信程度上的某些缺陷；第三，它所需的核弹头数量很少，如将 200 至 300 个俄罗斯的常规军事目标列入核打击目标清单，就能覆盖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主要的海、空军基地、港口、武器装备储存基地和关键的军事工业。这种新的打击非核军事力量的目标政策还得到一部分最大威慑力量派和最小威慑力量派的支持。

（三）核武器数量问题

最大威慑力量派起初建议在今后几年内保持 4000 至 5000 枚战略核弹头，后来接受了将战略核弹头削减到 3000 枚左右的看法。但该派认为，不能再进一步削减了，除非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达到美国与法国或日本关系的水平，并且对国际秩序的混乱状态实现了某种控制。该派中的许多人认为这两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出现，因此他们都不认为美国应该将核弹头削减到 3000 枚以下。该派的观点得到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中许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现在美俄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已大大减少，美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在这种形势下已没有必要将战略核弹头削减到 3000 枚以下；如果进行进一步削减，所带来的风险也许要超过所带来的利益。

最小威慑力量派将战略核弹头削减到 3000 枚看作是进一步削减以实现最低限度核威慑，甚至实现彻底核裁军的一个中间步骤。该派认为，可以将战略核武器削减到美俄各 100 枚左右的水平。

中间威慑力量派主张，如果世界形势允许，美国和俄罗斯应将它们的战略核弹头进一步削减到各 1000 至 2000 枚的水平；与此同时，其他中等核国

家也应参加一个多边核军控条约，由该条约将这些国家的核武器规定在适宜的水平，并能够加以核查。美国国家科学院 1991 年的研究报告《美苏核关系的未来》，较典型地代表了该派的观点。该派认为，将美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各 1000 枚的理由是：第一，这个数量可以使美俄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与中等核国家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有明显的区别，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仍能够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第二，这是一个有限度的核威慑力量，在未来 10 至 20 年后，如果世界政治中积极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可以将战略核武器削减到最低限度核威慑所需要的水平；第三，它可以使美国的国防预算在 1990 年的水平上每年节约 174 亿美元。

（四）核力量结构问题

最大威慑力量派主张，为了能够具有打击硬目标的能力，美国应保持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新型和命中精度高的潜射弹道导弹和隐形轰炸机。但核战略专家斯考特·塞根认为，为了实施一种增加战略稳定性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可以主要保持速度较慢的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该派还主张，由于世界形势仍不稳定和俄罗斯还有数千枚战略核弹头等原因，美国应该建立战略防御系统。不过，该派也认为，战略防御系统的主要任务应由在冷战时期慑止苏联发动预先计划好的核进攻，转到现在侧重对付较小的但仍致命的威胁，如防御俄罗斯偶然的或未经授权的导弹发射以及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等。

最小威慑力量派认为，如实行打击城市的目标政策，美国的核力量对命中精度不必有很高要求。该派还认为，任何较大的战略防御系统，如布什政府计划建立的对付有限打击的全球保护系统，都有可能削弱战略稳定性；由于俄罗斯偶然或未经授权发射导弹和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不必建立战略防御系统。

中间威慑力量派则主张，美国应该获得比打击城市目标政策所需的更有灵活性和更高命中精度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但也不必达到像打击军事力量目标政策所需的程度。

不过，客观的分析认为，当前美国政府关于核力量结构的决定将主要取决于预算和政治原因。

三、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核威慑政策的调整

将主要对苏联进行核威慑转变为多方位核威慑。在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将苏联看作主要对手，将慑止苏联集团对西欧的大规模常规进攻和苏联对美国的核进攻作为美国核力量的主要任务。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战略核力量目前面临着多重任务：一方面，它要防止俄罗斯局势发生逆转并重新成为美国的核对手；另一方面，它要对拥有或可能拥有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核威慑。

由侧重准备打赢一场核战争转变为“遏制针对美国、美军及其盟国的核、生、化武器的使用”。5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将准备与苏联打一场核战争并取得胜利作为其核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转而强调：“保持多种强大的核和常规力量，通过可靠的致命性报复威胁，遏制敌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

（二）核力量使用政策的调整

由制定明确的核武器打击目标计划转变为制定灵活的适应性打击目标计划。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制定核作战计划时一直是采用预先确定好明确的核打击目标的方法，并将核导弹瞄准预定的目标。例如，在1980年制定的《单一联合作战计划第5D号》中，曾计划用2.5万个核弹头打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4万个目标。冷战结束后，一方面，美国认为今后对它的核威胁将是多方位的，它难以事先就确定核打击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已与俄罗斯、乌克兰达成协议，互相不再把核武器瞄准对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战略司令部提出了“适应性计划”的概念。其含义是，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其内容包括准备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对不同的目标进行不同程度的和不同范围的打击。该司令部认为，这样可以在发生危机或冲突时向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广泛的和适当的行动选择，以对付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的威胁。此外，美国的大部分核导弹平时将不瞄准任何具体的目标，其他一些导弹将对准无人居住的海洋。不过，在需要时，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调整，这些导弹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瞄准准备打击的目标。

将拥有或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美国核武器所可能打击的目标选择方案中。据美国报刊披露，由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李·巴特勒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两年来提出了多项核打击目标计划。其中一项计划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它将利比亚、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叙利亚、北朝鲜、中国等国的军事基地或核基地也列入美国核武器可能打击的目标选择方案之中。另一项计划是针对前苏联地区的，它有两种选择方案，一是对前苏联地区的1.1万个目标进行全面核打击的方案；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有限核打击的方案，针对远离莫斯科的目标，总共将使用不到100枚核武器。

（三）核力量发展政策的调整

调整“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结构，保持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但三者的比例将发生变化。根据1993年1月美俄签署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到 2003 年美国“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仍将拥有 3500 枚核弹头，其中包括：18 艘装备 C—4 和 D—5 导弹的“三叉戟”弹道导弹潜艇（共携带 1728 枚潜射核弹头）、500 枚经过改装的单弹头民兵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94 架装备空基巡航导弹的 B—52H 型轰炸机（共携带 1000 枚核弹头）和 20 架 B—2 型空炸机（共携带 272 枚核弹头）。这样，美国的潜射弹道导弹在美国战略核武库中的比重将上升到 50%，从而成为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核心。美国还将继续生产“海狼”型核攻击潜艇，该型潜艇主要用于搜索和攻击前苏联（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研究和发小型和微型核弹头。虽然美国正在裁减核武器的数量，但它仍在发展新型核武器。目前，美国把核武器研究的重点放在小型和微型核弹头上。据美国报刊披露，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仍在继续研究 4 种新型核弹头：第一种是爆炸当量为 10 吨、能打击敌方地下深处指挥所的核弹头；第二种是爆炸当量为 100 吨、能摧毁飞行中的导弹核弹头或化学、生物弹头的低能量反导核弹头；第三种是爆炸当量为 1000 吨、用于“阻止第三世界国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在极端情况下消灭连以下部队”的核弹头；第四种是能破坏电子设备和通讯联络的电磁脉冲核弹头。这些核弹头将可能被安装在“战斧”式巡航导弹或其他精确制导的导弹上。

继续调整战略防御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布什政府曾于 1991 年将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的重点调整到建立“对付有限打击的全球防护系统”。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又于 1993 年 5 月宣布，将把反导弹防御的重点由发展天基反导防御系统转为发展陆基反导防御系统。为此，还将国防部的“战略防御计划局”改为“弹道导弹防御局”。克林顿政府所计划的陆基反导防御系统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付短程弹道导弹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用于保护美国部署在海外的部队及美国的盟国；二是对付远程弹道导弹的国土反导防御系统，主要用于保卫美本土。美国正在研制的新型陆基反导防御武器有：改进型“爱国者”导弹、陆基增程拦截弹、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箭”式战术反导导弹等。它们实际开始部署的时间将在 1996 年至下世纪初。同时，克林顿政府还强调扩大国际合作，建立全球导弹防护系统。目前，应美国之邀或有意参加美全球导弹防护系统的国家有北约组织的成员国、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俄罗斯等。此外，克林顿政府虽然放弃部署天基武器，但美国仍在继续研究关键的空间军事技术。

作好形势逆转时重建额外的核力量的准备。美国目前将准备“重组额外的核力量，以对付局势逆转带来的威胁”，作为规划未来战略核力量的两条主要原则之一。《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为美国这样做留下了方便之门。首先，该条约未规定销毁裁减下来的核弹头，这样，美国就可以将近万枚卸下的核弹头保存起来，一旦需要仍可重新使用。其次，该条约允许美俄各将 100 架未装备远程核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用于非核任务，而不必计入限额总数，这些轰炸机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被允许转用于执行核任务。再次，该条约允许潜射弹道导弹通过减少载弹量而基本保存其原有的核运载能力。如美国可以把每枚三叉戟和型导弹的载弹量从 8 枚减为 4 枚。其结果是：虽然美国潜射弹道导弹弹头总数按条约规定减掉一半，但潜射导弹和战略核潜艇的数目大体保持不变。一旦需要，可以在潜射导弹上加核弹头。

保留必要的战术核武器。美国虽然拆除了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但它仍部署有 1400 枚（一说 2500 枚）空基战术核武器（其中部署在西欧 800 枚）。

而且，它将拆除下来的海基战术核武器仍保留在美国中部地区，一旦需要，就可用于重新部署和使用。

四、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战略调整的后果与影响

（一）核力量的作用趋向多元化

美国核力量由冷战时期侧重对苏联的核武器和大规模常规进攻进行核威慑这样比较单纯的作用，转变为多方面的作用。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核武器的主要作用是慑止苏联对美国发动核进攻和在欧洲发动大规模常规军事进攻。华约和苏联解体后，美国核武器的上述作用已基本消失。由于目前美国开始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的数量和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对使用核武器的牵制增大，核武器在美国军事力量中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具有基石和核心的作用。然而，核武器现在仍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战作用虽有所下降，但政治作用趋于上升。它的新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防止俄罗斯的局势发生对美国不利的逆转；二是慑止对美国使用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三是支撑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四是继续向日、德等国提供“核保护伞”，防止它们产生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欲望；五是在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二）促使高技术常规兵器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高技术军事应用的日益广泛及核武器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高技术常规兵器更加受到重视。当前，有些高技术常规武器已能够替代某种核武器的作用，有些甚至具有核武器所达不到的某些作用。美国在核战略调整中考虑到了这种趋势，一方面开始大幅度减少核武器的数量，另一方面，则加快发展非核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将其战略轰炸机的作战重点由核战争转向常规战争，并大力研制具有极强穿透能力的非核炸弹，以便在必要时摧毁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下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实验室。这些做法将进一步提高常规武器在美国战略武库中的地位，并促使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加速发展。

（三）微型核武器的出现可能降低“核门槛”

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在削减后仍是巨大的，仍然是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重大威胁。在今后若干年内，美国将按照双边条约和单方面声明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但即使按计划完成了这些削减任务，美国的核武库仍然相当庞大，仍足以毁灭人类。而且，美国正在重点发展小型和微型核武器。核武器研制领域和军方的一些人甚至主张，在未来的局部战争或地区冲突中使用这些小型或微型核武器。他们认为，这些小爆炸当量的核武器填补了常规武器与大爆炸当量核武器之间的空白，它们既可以用于摧毁常规武器无法摧毁的目标，又可以因其爆炸当量小而易于为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和舆论上所接受。这种做法和主张有可能增加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其后果将是危险的。

C 篇 英国核力量使用政策与核作战计划

“需要作出决定的不是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而是何时和应该怎样使用这类武器……。对这一问题应该给予解庆，但不能更多地拘泥于人道主义的原则，而应该更多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哈里·杜鲁门

第七章 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演变

核力量运用政策是美国核战略三个基本构成因素（核威慑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核力量运用政策）之一，是美国核战略中最核心、最隐秘的部分，它集中代表了美国最高决策当局对核战争的基本观点和企图，反映了美国对使用核力量的精心筹划和准备。

一、核力量运用政策与核作战计划的制定

按照美国的定义和理解，核战略是关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达成国家政策和军事战略目的的科学和艺术。其构成为：核威慑政策（目标）+核力量运用（方案）+核力量发展政策（实力）。

“威慑是核战略的基本目标”，它的任务在于通过使潜在的敌手认识到，若发动侵略，其失必远大于得，从而使其不敢发动侵略战争，由此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实力”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和后盾，威慑必须以可靠而优势的实力为基础和后盾，发展战略决定实现目标所需的实力，选择和确定研制与采购核武器的质量与数量。

“运用”是达成战略目标的手段，明智而有效地运用实力手段达成威慑目的，以及如果威慑失败，怎样使用实力手段在有利于美的条件下尽快重建威慑，便是运用战略的任务了。可以说，运用战略是联系威慑战略和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

综合美国有关文件的论述，可以看出，运用战略的核心部分是目标政策和作战计划。

目标政策由总统和国防部长制定，并通过正式文件形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指明为达成威慑的目的，需将哪些种类的敌方目标置于美核打击威胁之下，如何予以打击，如何控制核武器使用规模，如何控制核战争进程和范围等基本原则。

作战计划从美国拥有原子弹一直到1960年，美国的核战争计划一直由战略空军独家制定，如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的“铁钳”作战计划、“烤肉机”作战计划、“扣球”作战计划和“敲诈”作战计划等。从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核技术的发展与核武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美国各个军种、各联合总部陆续装备了核武器。这一时期美国除空军继续制定关于核大战的作战计划，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基本作战计划”外，其它军种和战区也纷纷制定各自的核打击方案，如1955年美国太平洋战区远东司令部颁布的美军在“远东地区进行核作战的标准作战程序”等。针对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决心在自己任内完成统一制定核大战作战计划的重要任务，并于1960年8月批准成立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负责制定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即SIOP）。同年12月，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拟制完毕，1961年7月批准生效。因这一天为1962财年开始之日，故该计划被称为“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2号”（SIOP-62）。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府的更迭，新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陆续被炮制出笼，它们依次是“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3号”（SIOP-63）、“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4号”（SIOP-4）、“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5号”（SIOP-5）、“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号”（SIOP-6）、“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7号”（SIOP-7）。布什政府于1989年底批准生效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7号”（SIOP-7），是迄今根据掌握材料所知的美国最新的核作战计划。

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该机构于1960年8月由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成立。通过参联会向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其主要职责，一是遵照国家最高决策下达的目标政策，确定“国家战略目标清单”（NsTL），即确定在核战争中需予以核打击的重要目标、目标分类及相关的的目标。例如，联合战略目标

计划参谋部于 1962 年 11 月 21 日拟制，计划截止于 1969 年 6 月 30 日的“苏联集团战略目标清单”，就按最优先和次优先打击顺序，列出了计划实施核打击的苏联软（面状）目标和硬（点状）目标 1860 年，计划使用核弹头 3253 枚。二是具体制定“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OP），即从“国家战略目标清单”中选择和确定打击目标，并将其分配给各核武器系统。为每一枚战略核弹头安排抵达目标的时间，并根据目标的具体情况确定使用弹头的种类、数量和爆炸方式、高度等。曾参与“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具体制定的沃克空军上校透露：“战略目标计划的实质就是制定一个如何安排武器攻击目标的计划，以实现总的战略目的。战略目标计划的最终成果是由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制定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该计划统筹协调所有已部署的战略核力量，按照各种预先计划的打击方案，攻击敌方目标系统中的各种具体目标，以支持和实施国家战略，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所依据的是现有部队的能力，所以它又是衡量美国核战略能力之首要尺度。”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设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在地奥马哈空军基地，主任由战略空军司令兼任，副主任为一名海军中将，成员包括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北约的代表。该机构下设国家战略目标清单处和统一作战计划处，并向参联会和各联合总部派出联络代表。在该机构工作的参谋人员分别来自各军种。

二、核力量运用政策与核作战计划的发展变化

自 40 年代中期美国拥有核武器后，随着核技术的发展和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变化，美国的核力量运用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从 40 年代中后期至 50 年代初，美国占据着核垄断的地位。在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和日本实施战略性轰炸经验的基础上，美国依据当时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推行“核讹诈”或“战略轰炸”核战略。其核力量运用政策的核心是使用其所垄断的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进行先发制人甚至是“预防性”的核突击，迫使对方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代号为“苏联战略性的脆弱”(JIC329/1)的美军第一个研究性核战争计划(1945 年 12 月)，拟使用当时美国尚未拥有的 20—30 枚原子弹轰炸苏联 20 余座城市。代号为“铁钳”的美军第一个核战争计划(1946 年 6 月)，准备使用 50 枚核弹攻击苏 20 个城市，代号为“烤肉机”的第三个核战争计划(1948 年 3 月)，拟用 34 枚原子弹轰炸苏联 24 座城市。“烤肉机”核战争计划的修订案(又称“烧的”计划、“飞木”计划，“半月”计划和“双星”计划，1948 年 12 月)拟用 133 枚原子弹在 30 天内攻击苏 70 个城市，其中对莫斯科使用 8 枚，对列宁格勒使用 7 枚。1949 年 10 月制定的代号为“敲诈”的核战计划，拟用 20 枚核弹轰炸苏联 104 座城市目标。也是在这一年制定的代号为“扣球”的核战争计划，设想大战在 1957 年爆发，美准备使用 300 枚核弹及 20000 吨常规高爆航弹轰炸苏联 200 个城市约 700 个目标。

在几乎整个 50 年代，虽然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美国仍然在核武器和战略空军方面拥有巨大优势。1953 年 10 月 30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2/2 号文件(NsC162/2)确定美国的军事战略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国务卿杜勒斯 1954 年 1 月 12 日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言中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公开宣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本定义：“目前的基本决定是，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力量，用我们选择的武器，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很明显，核战略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心。这一时期，核力量运用政策的主旨是准备打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核战争，迅速摧毁苏联的战争潜力并夺取全面胜利。在核打击目标选择上，它要求既打城市、人口目标，也打击军事目标，但侧重打击城市、人口目标。这一时期的核大战计划主要有 1954 年、1956 年和 1957 年制定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基本战争计划和 1960 年底制定的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2 号(SIOP-62)，解决了核大战中的统一计划问题。

到 60 年代初，美国的核战略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刚刚执政的肯尼迪政府看来，在苏联的洲际导弹威胁面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报复”，而是如何在一场实际的核战争中使美国的城市免遭苏联导弹的袭击，尽量减少损失。在美苏之间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核威慑是不够的，必须充分考虑到威慑一旦失效怎么办的问题。在这种战略考虑下，“灵活反应”战略应运而生，取代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自那以后至到冷战结束，尽管美国的核战略的名称随着政府的更迭也有过几次调整变化，但其核力量运用政策逐渐从全面打击改为重点打击军事目标，并始终沿着减少僵硬性，增加灵活性，准备进行并打赢一场逐步升级的有限核战争的实践路子，越来越精细地发展起来。

60 年代限制损伤战略和确保摧毁战略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核力量对比已

从 50 年代的绝对优势开始转变为相对的优势。这一时期美国的目标政策既否定了“最低限度威慑”，又否定了“第一次打击”，而以打击苏军事力量为作战重点，将攻击苏城市/工业目标作为保留手段。1963 年 8 月 1 日被批准生效的新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3 号”（SIOP—63），比过去的核战计划增加了灵活性，但仍以准备打核大战为主。

70 年代“施莱辛格主义”时期，美苏核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大体均势。这一时期，美国的目标政策将重点放到准备打逐步升级的有限核战争，而将全面打击苏军事力量和城市作为保留手段。1976 年开始执行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 号”（SIOP—5），增加了多种精心选择的小规模打击方案，以准备对付苏常规进攻（美先动用核武器）和有限规模的核进攻（苏先动用核武器）。从这时起，人口本身不再被列为目标，并将摧毁多少百分比的城市/工业改为打击苏联经济恢复能力，第一次为核作战提出了着眼于战后的政治目标，从而使构成核战略的三个基本政策趋向一致。

80 年代以来的“抵销战略”时期（里根政府虽不采用此名称，但延用了此战略的实质内容），美国加速推进其核武器现代化计划。这一时期，美国的目标政策是打击苏领导最为珍视的东西，以抵销苏认为可能在核战中取胜的想法。1983 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SIOP—6）在精心部署的基础上，基本排除了苏美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重点准备打“持久的”核战争，并将作战目标定在“按有利于美国的条件尽快结束战争，重建威慑”上。1989 年 12 月，布什政府批准生效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7 号”（SIOP—7），是在“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该计划根据美苏将要拆除中导和即将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实际，进一步调配了各类核武器打击任务，扩大了目标选择范围，提高了战略武器使用的灵活性，从而使核战略内部的威慑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和运用政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也大体一致起来。

三、影响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素

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不断调整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战的结果，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有4个。即：美苏核力量对比消长的变化、美国核威慑战略的调整、核技术的发展与美国核力量发展政策的变化、核武器与核战争固有的特性与规律。

（一）美苏核力量对比消长的变化

核力量是进行核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制定运用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战后40余年的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尽管双方的起点大不相同，然而最终却出现了大体均衡的情况。这期间，美国经历了从核垄断、拥有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直到与苏联形成大体均势几个阶段，随着美苏核力量对比消长的变化，其运用战略发生了与其相适应的调整。

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由于美国处于核垄断的地位，因此核战计划强调只要发现对方的侵略征兆或侵犯了美国的利益，无论处在什么水平上，美国都将使用唯其独有的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去进行“讹诈”或实施“原子轰炸”。50年代，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美国仍然对苏联拥有巨大的核优势，故其核力量运用政策仍强调实施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60年代，美国的核力量对苏已逐步开始只具有相对优势，其核力量运用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全面打击的大规模报复性质逐渐转向以打击对方军事力量为主。70年代，美苏核力量形成了大体上的均势，美国的核力量运用政策更加强调整进行有限规模的逐步升级的核战争。80年代，美国加速推进核武器现代化计划，谋求“重建优势”，其运用战略更加强调整在实践中取胜，核战计划更具灵活性。

（二）美国核战略的调整

美国核战略中的三个基本政策（核威慑政策、核力量运用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三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既各具特征，相对独立，又受制于其它政策的调整。从美国的威慑政策来研究美国的核战略，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国的核战略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即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而6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历届政府也陆续提出一些新的战略概念，冠之以不同的名称，但从本质上看仍属于“灵活反应”战略范畴，这些变化是渐进性的，属于阶段性的变化。

与之相应，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的调整变化似乎也是如此。60年代以前，美国的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实质是进行大规模先发制人的全面打击，而60年代以后则体现着“灵活反应”的战略思想，尽管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和冠以新名称的核战略的陆续提出，新的核力量运用政策和新的核战计划相继产生，但其战略目标并没改变，即要有能力和决心进行一场核战争，并在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结束核战争。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始终沿着重点打击军事目标，扩大目标选择范围，增加灵活性，打赢逐步升级的有限核战争的思想调整变化。

（三）核武器技术的发展

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是促使核力量运用政策变化的催化剂。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为准确打击苏联军事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与此同时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技术和高级侦察机能够准确地确定苏联军事目标的位置和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重点打击军事目标的

“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3 号”（s10p—63）。70 年代初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部署，融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大型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始运作，为打逐步升级有限核战争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 号”（s10p—5）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运用手段。80 年代开始进入现役的威力巨大而又精确度极高的 MX 导弹和“三叉戟”型导弹（D—5），以及具有打击硬目标能力的空射巡航导弹，都为“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s10p—6）和第 7 号（s10p—7）的制定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核技术的发展，没有这些能使其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新式核武器的出现，核力量运用政策的调整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苏联核技术的发展同样影响着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的调整变化。从总体上看，在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中，美国通过在各项核技术上处于稍微领先的地位，但时间不长就被不甘落后的苏联奋力赶上。这种核技术差距的出现与消失往往促使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变化。50 年代后期苏联陆基洲际导弹先于美国试验成功，使苏联具有了对美国本土心脏地区实施核打击的能力，这成为促使其后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70 年中后期随着分导技术的发展，苏联具有分导式多弹头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SS—18 进入装备，也曾对美国核力量的运用政策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对核战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

（四）核武器与核战争固有的特殊规律

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杀伤能力和其投掷工具，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的高度突防能力，使核战争中的攻防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武器本身而言，在常规武器中，一种新型进攻武器的出现很快促使与其相对应的新式防御武器或装备（工事）的运用于战场，形成大致均衡的武器对应效应。如盾被用来对付矛，盔甲被用于抵御箭，坦克又使机关枪相形见绌。然而核武器不同，它爆炸的巨大威力比化学元素强 100 万倍以上。而且，进攻性核技术和核武器与防御系统相比，技术相对简单而造价相对低廉，因此进攻性核力量发展迅速，在如此强大的战略核进攻力量面前，任何防御系统都显得十分脆弱。因此，在核战争中，如果一方垄断着核武器，那么无疑这一方就垄断着绝对的力量优势。但如果战争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情况就十分复杂而微妙，进攻的一方，无论拥有多么大的核优势，采取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打击，只要不能百分之百地摧毁对方的核武器，就不能避免遭到核报复的后果，不能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而防御一方，无论核力量多么弱小，只要能够保持一定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从而可以给进攻一方造成不能忍受的损失，就能比较有效地慑止对方的进攻企图，实现基本的战略平衡。这就是核战争不同于常规战争的特殊规律。由此可见，在核战争中，双方特别是弱方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生存能力和摧毁能力，对于维持战略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60 年代初期，苏联开始拥有一定数量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到 60 年代后期，苏联已具有了比较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这样就使常规意义上的传统攻防平衡关系被打破，而使核时代的攻防平衡关系得以建立。从威慑战略角度讲，60 年代美国限制损伤和确保摧毁战略的基本着眼点是要使苏联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苏联都不可能在大战中保存自己，从而不敢对美及其盟国发动进攻；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自身也认识到，美也不可能在大战中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美也不会发动全力以赴的核进攻。这反映在核力量运用政策上，表现为以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为主要打击目标；

在核战计划中，第一步只打击这些军事目标，目的在于避免全面毁灭结果的出现。然而，随着美苏严重的核对峙和核军备的激烈角逐，又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如果美国掌握了可以严重威胁苏联第二次打击能力生存的核力量，并制定了摧毁其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战计划，就可能致苏联于绝境而迫使其在遭受美国攻击之前抢前发射核武器，这种可能诱发苏联孤注一掷的失衡局面又一次把美国推入困境。为维持战略稳定，美苏两个核大国就必须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来获取实质性的优势，同时又不必因担心己方核武器会被对方摧毁而被迫抢先发射。这一战略考虑反映在核力量运用政策和核战计划上，突出表现为尽力保持核战过程中的战略稳定，即如果核战争爆发，就必须将其严格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和等级上，即不过份打击，也不过分反应，力争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战争并重建威慑。为此，这一时期的核战计划中包括了多种小型和灵活的作战方案。

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去研究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政策发展演变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局限性。当前，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正进行着重大的战略调整。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力量运用政策已成为历史，然而可以肯定，只要美国还拥有核武器，那么核力量运用政策就不会消失。未来是历史的延续，了解和研究冷战时期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发展演变，无疑会对我们认识今后美国这一政策的发展趋向有所裨益。

第八章 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

约半个世纪前，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震惊了当时的世界，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年间，人类社会曾几度被比那严酷数十倍的核战争威胁推向灾难的边缘却鲜为人知。

正如本书《引言》中已谈到的，80年代中期，美国的两位核物理学家利用过去几年间美国国防部解密的一批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绝密的文件，撰写了一本专门披露五角大楼秘密核战争计划的专著，使我们于核阴影之中窥视到策划这些秘密核战计划的背景、企图、经过以及最终未能执行的缘由。

从4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50年代末，美国先以其对核武器的垄断，继而以其拥有的压倒核优势实力基础，主张以大规模的核打击慑止各种形式的危机和战争以及侵犯美国利益的任何行动和企图。在打击目标选择上，以对方城市和人口目标为主；在实施打击的方式上，强调先发制人，甚至进行所谓的“预防性打击”。

本章和下一章所述的美国秘密核战计划的背景材料和军政要人的言论多取上述一书提供的素材，为避免累赘，便不一一标明出处。

— “战略性的脆弱”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研究性作战计划

他（指主持美国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作者注）说他手上有血？！真可恶，那点血还不及我手上血的一半！”

——哈里·杜鲁门

“战略性的脆弱”是美国第一个研究性的秘密核战计划，它于1945年底拟制完毕。

1945年7月，在柏林市西南波茨坦凯赛林霍夫宫里，神情欢畅、面带微笑的杜鲁门与斯大林和邱吉尔摇动着紧握在一起的手。被战争困扰的世界工焦急地期待着三大战胜国巩固他们对纳粹德国的胜利并作出建立永久和平的承诺。与美国和苏联的士兵在易北河畔拥抱的照片闪电般地传遍全球之时，无数美好的希望在升腾。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如此亲密，极有希望地预示着这两个伟大国家和谐与合作的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正当1945年夏季三大国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期间，美国试爆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开始举行一系列重要的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美参联会选定了在核战争中“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政策。

（一）“第一次打击”的军事政策

当广岛和长崎两城市被原子弹突击后的惨况公诸于世后，恐惧使美国人民畏缩了。为控制这种正在增长的惧怕情绪，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公开申明：“我们不打算实施第一次原子弹打击”。尽管多年来历史学家们都认定艾森豪威尔的话反映了美国官方的军事政策，然而，他们错了。

1945年7月19日，美参联会草拟了第1496号秘密文件。该文件向所有高级军官强调指示，采用以核武器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政策是从先前的美国军事政策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参联会认为，“过去，美国可能因循以往的惯例而不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今后，美国军队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即在敌人使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前就战胜它，摧毁其发动战争的企图和能力。”该文件强调，在危机事件中，美国应对可能达成的不同的外交上的协议施加压力，“一旦需要，必须为实施第一次打击作好准备。”1945年10月30日，参联会在1477—1号文件中写道：“原子弹和其它新式武器的出现使在战争开端发动突然袭击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倍受重视。”该文件还进一步指出：强调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以备紧急防卫，也是为在必要情况下，对威胁性攻击的根源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参联会还强调“这种突然打击的因素将是成功的唯一保证”。两年后，在参联会1691—7号文件中进而重申：“进攻，过去就被认为是防御的最好手段；而在原子战争时代，进攻则是防御唯一的总体手段”。该文件突出强调了“在敌方可能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之前，就以压倒优势的力量对其实施攻击的能力”。美国参联会1496号秘密文件中提出的关于在战争中以核武器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方针，被杜鲁门总统1949年9月的秘密指令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号文件》正式批准为美国的军事政策。

（二）第一个研究性核战计划

参联会不仅选定在核战争中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政策，而且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十分明确地确定苏联将是美国战后主要的敌手。在波茨

坦，美国陆军的亨利·阿诺德将军即表明他“确信我们的下一个敌人是俄国人”。凡个美国将军甚至私下里把苏联称作“Showdown”，即“危机”之意。“曼哈顿计划”的高级顾问莱斯里埃·格劳成斯也曾秘密地写道：“我们的军队将面临原子武器的影响”（1946年1月），因此，美国应该对任何可能发展自身核武器的“侵略性国家”实施核攻击。

从波茨坦返回不久，杜鲁门总统就命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草拟可能倾全力与苏联作战的绝密战争计划。这个被称作“全蚀”的战争计划分析了与苏联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结局。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布莱德雷所评论的那样，“全蚀”计划是先前的盟国针对另一个盟国的第一个常规秘密战争计划。

仅仅考虑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的“全蚀”计划，由于空军而向前跨出了一步。广岛事件后两个月，参联会指令所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开始拟订对苏联实施核攻击的秘密研究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作 JIC329/1 或是“苏联战略性的脆弱：实施有限的空中突击”。该研究计划认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又是易遭打击的目标。只要对苏联实施原子突击，就会使苏联民众认识到其政府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风险，而要求摆脱控制，最终导致政府的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是统治阶层的“阿基里斯的脚踵”。这一研究项目还具体分析了使用 20—30 枚原子炸弹对苏联实施首次核突击的效力，并将原子炸弹这种毁灭性的力量用数学简洁地表述在战争计划之中。

“战略性的脆弱”计划研究了使用原子弹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即在常规战争中对苏联实施报复性打击，另一种则是在“先发制人的战争”中不经宣战和警告即给予苏联以突然的袭击。

该计划认为苏联并未形成对美国直接和迫在眉睫的威胁，在近斯的将来，苏联亦不可能对美国本土实施攻击。苏联没有强大的海军，只有第二流的商业性的船队，因此要在海外遂行战役行动，是不可想像的。该计划进而评估了美、苏两国军事能力的不同点，指出经过二次大战，美国的战争机器实际并未因此而受损，而苏联则损伤惨重。战争使苏联损失了全部人口的 10%，绝大多数主要城市遭到摧毁，苏联仍在战后的废墟上蹒跚而行。

在“战略性的脆弱”计划中，标记着苏联 20 个城市将在首次核突击中被摧毁。这些城市是：莫斯科、高尔基、古比雪夫、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萨拉托夫、喀山、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切利宾斯克、下塔吉尔、马克尼托哥尔斯克、莫洛托夫、第比利斯、斯大林格勒、格罗兹尼、伊尔库茨克和雅罗斯拉夫尔。

（三）第一次与苏联“摊牌”

杜鲁门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权迫使苏联作出政治上的让步，最初一次的关键摊牌是在伊朗。二战期间，英国、美国和苏联同意共同占领伊朗并控制它，从而使伊朗的石油掌握在盟军手中，三方商定战争结束 6 个月后均从伊朗撤军。同时三方还商定从石油特许开采权中分配经济利益。但是战争一结束，美国就背高了曾达成的协议，并且反对苏联的任何经济要求。作为回报，苏联则拒绝撤出它的军队，要求与英国相等的石油特许开采权。为支持其这一主张，苏联开始在阿塞拜疆省支持由加法尔·波什威里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且将坦克部队开向苏伊边境。

杜鲁门为苏联的表现所激怒。1946年3月，杜鲁门单独约见了安德

烈·葛罗米柯大使并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如果苏联军队不在 48 小时内从伊朗北部撤走，美国将使用原子弹实施突击。据报道，杜鲁门对后来的这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说，“我们打算对你们投掷原子弹。”

当评论可能与苏联发生的冲突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宣称，“现在，我们可以送给苏联人大量的原子弹”。随后，杜鲁门则吹嘘说，由于分离主义倾向政府的垮台，苏联将同意在 24 小时而不是 48 小时内撤出军队。

就在第一次对苏联进行了核威胁的 8 个月之后，杜鲁门再一次对苏联采用了“原子弹外交”。那是 1946 年 11 月，当美国军用飞机被南斯拉夫击落后，杜鲁门将 6 架 B—29 型轰炸机部署在西德并飞越南斯拉夫的边界以炫耀原子武力。

杜鲁门曾经把原子弹这种毁灭性的威力称作“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美国已经垄断着这种“胜利的武器”，杜鲁门和国务卿威尔·亨利·斯廷森确信美国有足够的炸弹可以把原子的优势转化为政治的获益。

1946 年的一天，奥本海默，这个曾经主持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著名科学家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我感到自己双手染满了鲜血。”这时杜鲁门从他的上衣袋里取出一块洁净叠整的手帕递给奥本海默，说：“或许你愿意擦净它？”奥本海默离开后，杜鲁门转身指示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再不要带奥本海默来这里，并嚷道：“他说他手上有血？！真可恶，那点血还不及我手上血的一半！你不要到处无端地抱怨了。”

二 “铁钳”（Pincher）作战计划

有了原子弹，我们就得使用它。

——哈里·杜鲁门

“铁钳”作战计划的制定，完成于1946年6月。如果说“战略性的脆弱”计划还仅仅是美国对苏联实施核突击可行性尝试研究的设想，那么代号为“铁钳”的计划就是美参联会精心炮制的第一个对苏联进行原子打击的作战计划。

（一）拟把原子武器用于大规模空袭

与“战略性的脆弱”计划不同，“铁钳”作战计划详细计算和阐明了击败苏联所需的载核弹的飞机、陆军师和舰船的精确数量。它是第一个把原子武器运用与全面空袭完整结合的作战计划。

“铁钳”计划首先认为，由于遭到二次大战惨重的毁坏，苏联尚处在复建之中，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在10—15年间，苏联将小心翼翼地避开与西方发生任何冲突。但同时又含混地指出，这种分析“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估计”。

“铁钳”计划拒绝把与苏联的军事冲突局限化的意见。计划中冷酷地写道：“与苏联的战争即是一场全面的战争，需要动用美国和盟国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战争潜力。”该计划要求在战争中以50枚原子弹突击苏联，这些原子弹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就摧毁俄国20个城市。为进一步完成计划，“铁钳”还假定在1946年夏季至1947年夏季之间实施原子攻击。

“铁钳”计划要求在战争开端，就动用大批几乎不遇抵抗就能够楔入苏联纵深的B—29轰炸机实施核闪击，以摧毁苏联进行战争的能力。计划指出：

“不列颠群岛、非洲北部、意大利、埃及、印度西北部以及也许是中国西部地区，都很可能建立对苏联战争能力实施先机摧毁的基地。利用这些基础，苏联工业和关键性资源的主要地区就都置于盟国重型轰炸机的有效作战范围之内”。

“铁钳”计划规定了在全面战争中用马克3型原子弹摧毁的7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地区：列在最上边的是莫斯科周围地区、石油丰富的巴库和乌拉尔工业区。“铁钳”计划指出“占领或压制这些关键性地区将创造出击败苏联的有利条件”。

核突击的目的是在战争伊始就摧垮苏联的军事机器并毁坏它们的主要城市。尽管苏联大部分军事力量将在这先发制人的攻击中遭到摧毁，但苏联政府的最终垮台和情剿作战仍需地面和海上的进攻。对苏联的最后攻击将分3—4路实施，以占领苏联工业心脏地区为目标。“铁钳”计划已列出了三条进攻苏联的主要路线，它们分别是经过波兰、巴尔干国家和中东。

根据“铁钳”计划，核攻击的目的之一“是瓦解苏联极权主义的政府；摧毁其工业或彻底破坏其交通与通讯系统”。“铁钳”计划的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击败苏联，或至少迫使苏联在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投降”。在军事上击败苏联，最终将为盟国武装力量占领苏联铺设道路。

（二）近乎纸上谈兵的作战计划

尽管美国空军相信，在战争中的原子闪击能够给予苏联以严重毁坏。然

而使美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发愁的是，五角大楼的战争计划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困扰福雷斯特的是实施攻击主要依赖的空军 B—29 型轰炸机，该机有限的作战半径使计划中 20 多个目标任务不能完成。事实上，B—29 型轰炸机的作战半径比需要短 300—500 英里。该机 1500—1700 英里的作战半径根本不能胜任有效地攻击苏联的任务。而且，即使 B—29 型轰炸机能以某种方式达到预定目标，它仍然由于缺乏足够的载弹量而难以有效地执行“铁钳”计划。

美国原子武库中的“马克”3 型原子弹的准确数量是被精心保护的秘密。它是如此机密以至于从未见诸文字，只由专门军官口头传递。甚至直到 1947 年 2 月，福雷斯特和海军作战部长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还彼此认为对方知道美国核武库的规模，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

并且由于五角大楼里各军种之间无休止的争端如此严重，以至于参联会都不知道美国武库中究竟有多少枚原子弹。很明显，参联会在不知道这个关键性数字的情况下拟定了“铁钳”计划，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铁钳”计划中所要求的 50 枚原子弹，美国根本就没有！

尽管杜鲁门总统已经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了威胁，甚至他也不知道武库中原子弹的准确数量。杜鲁门最后查明的事实是，1945 年底美国仅有 2 枚原子弹，1946 年 7 月 9 枚，而直到 1947 年 7 月也刚刚达到 13 枚！美国生产原子弹的速率勉强达到一个月一枚。从实质上讲，“铁钳”计划只是一纸空谈。

“铁钳”计划以 50 枚原子弹对苏联实施原子突击，而实际美国仅有 9 枚。更糟糕的是，由于军方要求尽可能多的原子弹，位于华盛顿汉弗德的三家钚工厂正在严重地超负荷生产。面对几个反应堆将要缩减钚的产量，杜鲁门更是心神不定。事实是，在 1946 年初，美国最早的一个反应堆已由于过量生产而半闭。1947 年 1 月钚产量已实际下降到“仅是战时需求量的一小部分”。

“马克”3 型原子弹曾把广岛夷为平地，从 1945 年到 1948 年，这种标准的原子弹曾是“将军们的梦”。该弹重一万磅，它如此庞大和沉重，以至 B—29 型轰炸机的弹仓必须专门改装后才能携载。

这种原子弹从本质上仍属于实验室武器，它存“有效时间”仅仅两天；每枚炸弹需要 39 个人用两天时间才能准备就绪，因为每枚炸弹的蓄电池必须在它被投掷之前 48 小时充电，而金属钚中子的引发剂仅有 138 天的半衰期。又由于没有设备能够安全地存放这个可恶庞然大物的部件，因此多年来，这些原子弹一直被贮存在诺克斯堡的国家金库附近。

除此而外，更加令美国战争决策者苦恼和使“铁钳”计划难以执行的困难则是该作战计划可能带来他们所更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铁钳”计划中所阐述的原子攻击或许能并不困难地摧毁或瘫痪苏联领导集团。然而，苏联红军的奋勇反击可能横扫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美国占领军将不得不从欧洲和亚洲进行大规模的撤军。“铁钳”计划对此有冷静的分析，认为红军完全侵入丹麦、德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和法国并不困难，英同可能暂时地阻止住苏军，但是朝鲜将要丢失。战争高峰期之后，美国或许能在巴勒斯坦和西班牙阻挡住苏联，最终盟军将重新调整部署而以英国、印度、意大利和中国为基地建立防线。

“铁钳”计划提供了战后美国战略中令人吃惊的一幕。与其它一些秘密文件一起，“铁钳”计划显示了对苏联隐秘而充满敌意的姿态，即使在美苏

结盟处于峰巅之时也不例外。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这些文件所叙述的与对战后时期历史的传统认识截然不同，依照传统的看法，冷战的最初爆发是由于40年代末期苏联的冒险主义，尤其是朝鲜战争。

三、“烤肉机”（Broiler）作战计划

要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并要首先打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詹姆斯·福雷斯特

被称为“烤肉机”的作战计划，是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狂怒炮制的产物。与“铁制”计划不同，这一新的计划不是把重点放在假设的偶发事件上，而显然是从应急式的计划转变为一种实际的作战行动方案。只要战争爆发，五角大楼就要执行“烤肉机”计划。

（一）第一次柏林危机

美国与苏联正彼此以枪口相对，企图压降对方，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的重大冲突。它发生在柏林。

为制止盟军破坏和瓦解德国苏占区的企图，苏联于1948年6月24日封锁了柏林。苏联谴责盟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域变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基地，苏联试图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带，借以对付令其畏惧的和今后将要发生的西方的入侵。盟国认为苏联的这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西方的挑衅，并视其为东西方决心和意志的考验。

杜鲁门不失时机地运用了战争升级理论，威胁要将暴力行动的程度升级到运用原子弹。就在苏联首先采取封锁行动刚刚过去4天，杜鲁门就对美国新闻界宣布他正派遣60架具有携带原子弹能力的B—29型轰炸机前往柏林。这一部署发生在柏林危机刚刚发生之际，正表明了原子弹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参联会正在准备一旦需要就将这一危机升级为一场“全球性战争”。参联会正密切关注着柏林，并已提前请求全面审核了“铁钳”计划。到1948年，由于美国原子弹的储备最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与苏联的关系又急剧恶化，五角大楼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二）从“烤肉机”到“特洛伊人”

这个新的作战计划的代号更令人耸然：“烤肉机”。该作战计划要求以34枚原子弹一次性轰炸苏联24个城市。与早些时候的“铁钳”计划或“战略性的脆弱”计划相比，“烤肉机”有了显著发展并更为具体。

在局势恶化持续的几个月时间里，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有更多的原子弹可供使用，“烤肉机”计划也经历了若干个表现形态。该计划最初提交参联会是在3月10日，一个多星期后，它被重新命名为“嬉戏”（又称“强夺者”）计划。它对“烤肉机”计划作了微小的修改，要求以英国、巴基斯坦、印度和冲绳岛的基地，使用50枚原子弹对俄国20个城市进行轰炸。当柏林危机进一步发展到12月分，“嬉戏”计划又被修改。被再次修改的计划代号为“烤灼”（又称“飞木”、“半月”和“双星”），其中要求以8枚原子弹轰炸莫斯科，摧毁其方圆40平方英里的城区，并以7枚以上的原子弹轰炸列宁格勒。由于更多的“马克”3型原子弹正从装配线上制造出来，该计划曾设想对70个苏联城市使用原子弹。如果战争持续两年，那么将再有200枚原子弹投向苏联，可以摧毁苏联工业的40%，并使700万人死亡。

1948年7月28日，当局势进一步恶化和紧急空运开始实行之时，福雷斯特约见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和罗亚尔，讨论的主题是：是否执行“烤肉机”计划以反击对柏林的封锁。福雷斯特说他“将最优先考虑含有使用原子弹的战争计划，而其次再考虑选定不包括使用

原子武器的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要求得到在战争中对是否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的明确答复。

在整个柏林危机期间，福雷斯特都着迷于原子弹事务。从夏天到秋天，他都与其他高级官员商讨关于原子弹是否应该使用，哪些目标必须进行打击以及盟国军队是否有准备去执行相应的作战计划等等。进入 11 月，福雷斯特专程赴欧洲，以确认盟国在军事上是否为可能进行的原子战争作好了准备。是月 13 日，福雷斯特抵达柏林，与驻欧盟军司令卢修其·克莱将军会晤，并告诉他在战争中“要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并要首先打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天后，他到达海德堡，在那里会见了驻德美军司令 C·R·许布纳中将并对他说，如果战争爆发。“他将乐意看到一枚原子弹被投掷在莱茵河地区，因为他确信俄国人对原子效应知之甚微”。

取代“烤肉机”计划和进行多处修改而被称作“特洛伊人”的作战计划，预计首次空袭的构成是：由 133 架 B—29 型、B—50 型和新型的 B—36 型型轰炸机联合编队，对苏联 70 座城市投掷 133 枚原子弹，并随之以更多的刚刚离开装配线的原子弹投向苏联。

然而，到 1949 年中期，危机开始缓解，苏联放松了对进入柏林的交通的限制，与此同时，美国也停止了在苏联面前舞弄原子弹的作法。同年 9 月 30 日，空投最终停止了。两个超级大国都从柏林危机中走出来，从战争的边缘后退了一步，并开始尊重已经形成的东、西欧的既成事实。一个心照不宣的谅解为美国和苏联所共同接受，这就是：分隔成两个欧洲的界线是不容改变的，除非再进行一场全球战争。

柏林危机的结局，使得在对外政策中形成了一种一致的观点，即派遣具有“原子弹携载和攻击能力”的轰炸机到英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原子威慑起了作用。但这可能是难以自圆的结论。或许是由于西方的空运获取了成功而苏联又不准备对进一步的升级作出反应而解除了对柏林的封锁，或许是苏联人认识到西方不能允许其柏林占领区出现不稳定、也许是他们确实惧怕原子弹，但他们知道美国并不具备实施决定性原子闪击战的能力。

四、“扣球”（Dropshot）作战计划

假如可以产生大量的原子弹，战争的目的又是使敌人彻底屈服，那么战端一开就可冒些风险实施全面的原子袭击，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投降。

——美国空军参谋部

“扣球”作战计划的制定完成于1949年的早些时候。

尽管到1949年中期，柏林危机得以缓解，然而，这一年仍然是令美国人沮丧的。9月3日，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在靠近西伯利亚海岸北太平洋18000英尺的高空采集的雨水样品和随后的分析检验引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苏联已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爆炸了一枚原子弹。这使美参联会不禁大吃一惊。不信任情绪猛烈冲击着情报部门，苏联已经完成原子弹研制工作，比美国顶告估计的足足早了5—10年。杜鲁门和他的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对此惊叹不已。

随后几天白宫被更坏的消息所震动。毛泽东麾下的中共军队击溃了蒋介石分崩离析的军队，并已取得整个中国大陆。

（一）哈蒙的报告

在此期间，美国的核武器技术经历了双重的革命。首先，美国已生产出原子弹的新系列：“马克”4、5和6型。“马克”6型是第一种能够大批生产的原子弹。美国原子弹的储备不久便越过了200枚，这些原子弹或许已足够摧毁苏联每一个大城市和军事设施。第二，洲际航程的B—36型轰炸机使深入苏联纵深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正在成为现实。随着这两项技术的革新，执行“烤肉机”计划的最后的障碍看起来已经被克服。

鉴于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垮台和苏联已成功地实爆了原子弹，杜鲁门要求知道，如果战争将要到来，这些携带200枚原子弹的新型轰炸机是否能够给予苏联以“决定性”的打击。1949年根据国防部长的指令，由空军中将休伯特·哈蒙负责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向苏实施原子轰炸的效果进行评估。最终形成的哈蒙报告中指出，尽管核攻击将使270万人致死，400万人致伤并使2800万或更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甚至对苏联70个城市攻击仍不能“造成有条件的投降，摧毁共产主义的根基或极大地削弱苏联领导集团对人民统治的权力”；

——即使苏联的工作能力被削减了50%，“这种状况也不会持久，并且苏联通过重建工程或是依仗随后的具有重大效应的反攻，使其不利态势得到缓解”；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武装力量迅速进入西欧、中东和远东一些有选择地区的能力将不会受到严重地削弱”。

哈蒙报告直接导致了“扣球”作战计划的产生。

（二）对苏联实施“决定性打击”

面对“烤肉机”和在其基础上修订的“特洛伊人”计划的显而易见的缺陷，五角大楼清楚地知道，一旦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将在技术上不会具有执行“决定性打击”的能力。直到五0年代中期，“决定性打击”或许才可以成为可能。随着头脑中目标的修订，参联会战略调查委员会（JSSC）向五

角大楼报告，美国必须于 1953 年 1 月 1 日制造 400 枚原子弹，与此同时，参联会受命了一项在 50 年代中期使用包括原子攻击在内的对苏作战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武断地定 1956 年至 1957 年为对苏作战的开始）。这个代号为“扣球”的作战计划足足塞满了三个大卷宗，并作出了在 50 年代中期对苏联实施核攻击可以在不到二至四周的短时间内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的结论。为使这一诊断站得住脚，“扣球”计划还作了如此的假设，即战争可能拖延三年之久，而最终则需要对苏联发动地面进攻。

“扣球”作战计划估计在 50 年代中期的一场进攻将由 300 枚原子弹投向 200 个苏联目标所构成。因为远程 B—36 和 B—25 轰炸机具有足够的飞行半径从美国本土去攻击苏联。“扣球”作战计划写到：“美国应该在进攻开始后尽早发动战略空袭，飞机携带原子弹和常规炸弹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拉布拉多海盆、冲绳岛，亚丁——喀土穆——开罗地带、英国的基地和与适于完成主要任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攻击业已选定的苏联目标”。“扣球”作战计划还意味深长地作出结论：在 50 年代中期，美国可能有能力防止苏联对欧洲的入侵。

在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扣球”作战计划中，这一点十分清楚，即核储备两倍或三倍增长后，当巨型远程轰炸机（B—52 高空堡垒型）形成实战能力以及当美国研制出“超级炸弹”即氢弹之时，“决定性的打击”就成为可能。杜鲁门作出研造一种威力要强于“马克”3 型原子弹上千倍炸弹的决定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一旦与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能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五、朝鲜战争期间的核阴云和“敲诈”（Shakedown）作战计划

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原子武器。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 40 余年了，回顾那段历史，公开的资料中没有明显地表露出美国政府是否以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威胁。然而，最新解密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却揭示了这样的事实：美国战争决策者和五角大楼确实认真策划过对中国和朝鲜使用原子弹，并准备执行对苏实施大规模核突击的“敲诈”作战计划。

（一）朝鲜战争期间的核选择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冷战陡然转为热战。

当在战场上掌握着主动权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继续向北进犯，把战火烧到临近中国门槛的时候，一场地区性战争的局势突然间严重恶化了。麦克阿瑟和艾奇逊都没有理睬来自中国方面的多次警告，中国政府曾声明，对如此大量敌对的军队进至自己的边界表示严重关切。艾奇逊则认为，如果“中国想加入这场纸牌游戏，他们就必然作出更多的伪装而不是现在这样……我们不应该在很可能是中同共产党集团的讹诈面前表现不适当的畏惧”。

根据“升级控制理论”，在进行威胁时，威胁者必须对控制事态的升级有所准备。并且，当威胁者以提高暴力行动的程度来增大赌注时，其本身必须具有控制结局的能力。然而，麦克阿瑟却并非如此。中国人感到了威胁，断然派兵南进顿挫了麦克阿瑟的军队，地区性冲突瞬时转为一场国际危机。被麦克阿瑟吹嘘为“圣诞节凯旋”的进攻陷于窘境。1950 年 11 月 28 日，美国海军少将 W·G·莱勃向参联会呈送了一份秘密电文，请求参联会建议“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作为阻滞（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军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

两天之后的 11 月 30 日，也就是在朝鲜秋津水库美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投降之后，杜鲁门召集了紧急会议，宣称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去对付当前的军事形势”。当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包括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回答说：“对于原子弹的使用已经给予了积极的考虑。”

1950 年 12 月 6 日，当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杜鲁门就秘密批准了参联会的一项建议，即将原子弹的构件贮存在地中海巡弋的美国海军“富兰克林·罗斯福”巡洋舰上。

1951 年 1 月 11 日，前空军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赛明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神密会议上要求对中国实施原子攻击。会上他介绍了已呈交给杜鲁门并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00 号文件”中的这项计划。该计划认为，美国军事上所拥有的“主要优势……每周愈下”，文件主张对中国实施出其不意的原子打击以便最终导致其共党政权的瓦解，随之对苏联下达最后通牒，警告苏联不论它在何处采取侵略行动“都必被驱逐出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00 号文件”承认这即意味着与苏联的“政治摊牌”。

1951 年，小型战术核武器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的核武库，“马克—4”型

和 W—19 型是两种可以用 280 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小型原子弹。由于这种战术核武器的发展，使得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意见对五角大楼突然变得更富有吸引力。因为在朝鲜战场使用这种战术核武器将不会耗尽“敲诈”计划准备在全欧进行一场可能的核战争而需要的炸弹储备。

1953 年 2 月 11 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奥玛尔·布莱德雷将军叫嚷要注意开城地区，在这个 28 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现在已挤满了军队和物资”。从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应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该地区为这类武器提供了很好的打击目标。随后，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参联会关于在朝鲜有选择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建议，指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原子弹。在 5 月 6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次秘密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甚至亲自参与选定了朝鲜境内原子弹突击的目标，他认为北朝鲜境内的 4 个机场可以作为检验使用原子弹效应的目标。

1953 年 5 月 19 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参联会最后要求实施将战争扩展到朝鲜以外，并包括动用原子武器的大规模进攻行动。这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将要进行几个月时间的准备，而且要依现时正在进行的军事谈判失败或是成功而定。一份标题为“与朝鲜战争形势相关的行动方针（分析）”的绝密报告呈交给了国防部长。

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听完各种不同观点之后，同意参联会继续筹划在朝鲜可能动用核武器的方案。参联会立即着手修订朝鲜战争可能升级的秘密作战计划，并指示立即把这一变化通知到该战区的各级指挥官。

各项准备工作不久即将开始。仅需符合恰当的条件，而这种条件正是要由谈判桌和战场来决定的。这份促使战争升级的秘密计划被称为“奥普兰 8—52”作战计划，它由于准备使用核武器而正在进行增补修订。看来一切俱定，木已成舟。

然而，真是出意料，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了突破。所谓“作战行动的转换器”即美中双方军队首次开始大批交换战俘，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成功。恰恰正当美国为对朝鲜和中国实施可能的原子突击（这可能导致与苏联的全面战争）进行准备之时，谈判中突然出现解冻，使双方紧张的态势趋向缓和。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敌对情绪在下降，而且美国也从核灾难的边缘后撤了回来。

（二）最后的抉择——“敲诈”计划

最新解密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会议记录，同样揭示了为什么杜鲁门最终反对攻击中国计划的缘由。这是因为如果实施该计划，将迅速耗尽美国有限的核武库并将危及最新的战争计划：“敲诈”作战行动计划（也被称为“擒抱”计划）。该记录还泄露了其它几个曾被考虑的因素，如朝鲜缺少军事打击的目标，英法两国对美国实施核攻击持反对态度以及苏联可能对釜山和日本进行报复等。但奥玛尔·布某德雷将军认为，放弃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突击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这将使美国在“A 日”到来之时在欧洲毫无准备。

艾森豪威尔和参联会全然知道突然升级为核战争可能刺激苏联卷入这场核冲突。五角大楼最新的战争计划即“敲诈”计划就预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能始于或缘于朝鲜战争。“敲诈”计划认为：

“如果为执行‘敲诈’计划而发动大规模进攻的“A”日到来之时，朝鲜

的作战行动仍在进行之中，那么应准备将在朝鲜的盟军撤离或重新部署。这些军队的撤离和重新部署的成功与迅速，对于支撑“敲诈”计划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布莱德雷将军冷峻地回忆道：“我们认识如此的干涉行动（指进入中国）可能就意味着苏联发动一场全面战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将从朝鲜撤出我们的军队而准备执行‘敲诈’计划”。

“敲诈”作战行动计划与在柏林危机期间产生的“烤肉机”那种比较粗糙的战争计划不同，到1950年能打击苏联的原子弹大约达到400枚。每年都有上百枚新弹进入美国的核武库。先前，在“铁钳”计划期间美国每个月可增加一枚原子炸弹，而现在美国的核武库正在以每天几枚的速度增加。1950年7月，杜鲁门秘密授权将原子弹的构件海运至英国。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行动，因为它标志着原子弹第一次事实上跨越了大西洋。

“敲诈”作战计划的执行意味着美国在苏联卷入并由此引发全面战争之时进行的“最后的抉择”。该计划试图以数百架B—36架和B—50型轰炸机，对苏联100余座城市投掷超过200枚的“马克—6”型原子弹。

“敲诈”作战行动计划的一个文本中写道：

“首次核打击将大约于D+6（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6天）开始。重型轰炸机将从缅因州起飞，对莫斯科高尔基地域投掷20枚原子弹，之后返回英国。与此同时，从拉伯拉多起飞的中型轰炸机将以12枚核弹攻击列宁格勒并重新在英国基地集结，从不列颠诸岛基地起飞的中型轰炸机，将沿地中海的边缘飞抵苏联并对伏尔加河和顿河盆地工业区投掷52枚原子炸弹，这些轰炸机将通过利比亚和埃及的机场返回。更多的中型轰炸机从亚速尔群岛起飞对高加索地区投掷15枚炸弹，然后通过德黑兰、沙特阿拉伯返回。还是在这同一时间里，从关岛起飞的中程轰炸机将携带15枚原子炸弹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实施轰炸。”

六、“秃鹫”（Vulture）作战计划

我可以告诉你们，美国的航空母舰正在驶进东京湾，准备进行攻击。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五角大楼在策划对苏联实施全面核突击的同时，也确实认真考虑过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核武器。1954年，为使被困于奠边府地区的法军免遭灭顶之灾，五角大楼就曾制定了一个对越南军队投掷原子弹的“秃鹫”作战计划。

1954年3月，奠边府令人恐惧的沉寂被稀疏的迫击炮声所打破。3000余名饥饿难挨的法军官兵有不断飞来的炮弹打击下濒临死亡。亚洲的另一出活剧的最后一幕正在演完其无情的结局。美国参联会指出，欧洲志牌的殖民主义帝国在亚洲和非洲已陷入了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浪潮之中；法国可能屈辱地投降，给其它国家留下一块可供充填的空间，这就是西方世界很少关注的越南。

1954年1月，法军中将亨利·纳瓦雷曾经吹嘘道，如果越南人不来攻击法国在奠边府设置的“无懈可击”的前哨阵地，他将会感到“失望的”。他说这将为他提供理由去给予越南人以“实质性的打击，即便不是彻底击败的话”。但仅仅两个月之后，3.5万越盟军队在奠边府却掐断了法国占领军的生命线，从而结束了法国殖民主义长达100年之久的统治。

由于法军在奠边府的溃败，法国派遣保罗·伊利将军于1954年3月8日到华盛顿恳求最后的援救。只有美国的直接干预才能解救法国的印度支那。伊利将军在美国获得的要多于他所期望的。美国应允派遣新的部队和装备以挽救在奠边府的法军，美参联会提议向他提供2—3枚原子弹。

3月25日，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署秘密得出结论，认为原子弹能够扭转奠边府恶化的形势。这项计划破称为“在印度支那成功地使用原子武器在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可行性。”4月8日，草拟了代号为“秃鹫”的秘密作战计划。该方案计划在黎明时分由海军舰母战斗机投掷2—6枚3.1万吨级原子弹以取得优势。空军的F—8战斗机能够在接到预告号令的10个小时内对越南投掷钚弹，而且，海军AD—5，AD—6，F—2H和F—2B战斗机也能够把原子弹投向越南。为迷惑苏联人和中国人以及世界舆论，作战计划署建议美国的飞机涂上法国的军徽进行攻击以实施伪装。美国陆军情报局还对在越南境内使市战术核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研究，并且分析了诱发中国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4月10日，艾森豪威尔派国务卿杜勒斯和海军上将雷德福前往巴黎和伦敦，提出最后的建议，即以两枚原子弹去拯救被围于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并求得欧洲盟国对“秃鹫”秘密行动计划的支持。直接参与草拟这一计划的雷德福在与盟国的会晤中对用原子弹打破合围表示了信心，因为部署在那个地区的海军航空母舰已经全部装载了原子弹。

然而，盟国的反应却使杜勒斯和雷福特吃惊和失望。英国首相邱吉尔直率地说，英国公众将不会支持向越南人投掷原子弹。他表示英国欲使战争地区化，而不是使其升级和冒大国之间战争的危险。

就连法国外交事务部长比道尔特也被“秃鹫”行动计划所困扰，他一想

到一旦中国或苏联的介入可能造成的巨大浩劫和一枚原子弹的攻击将使他在奠边府的军队难以免遭打击就不寒而栗。

最后，还是越南人平息了美国和盟国之间出现的分歧。5月8日，也就是杜勒斯提出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两周之后，法国人彻底投降而越盟军队夺取了奠边府。

七、战略空军司令部基本战争计划

我们决不允许敌人首先进攻。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50 年代初期，美国战争决策者和军方人士中，对如何实施核打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另一种强调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Pre-emptive）。两者都要求首先发动核攻击，而且字面上也仅有几个字母和一个连字符之差，然而，两者仍有着实质性的差别。预防性战争主张在己方拥有绝对核优势而对方尚不具备实质性的还击能力之前的有利时机进行决定性的第一次核打击。先发制人的战争则是针对某种具体形势而言，强调在察觉对方有进攻准备的迹象之时迅速行动，首先动手。

（一）“A 日”飞在逼近

A 日，是 50 年代初期美国军界认为将在 1954 年左右出现的一个危险时间的代号。A 日的临近意味着美国将失去“机会之窗”——即在苏联具备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能力之前对其发动一次决定的核打击——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有利时机。这一时期，美国军方关于准备对苏联发动一场原子战争的要求日益强烈。

1953 年 5 月 9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组建一个称为“日光浴室工程”的绝密研究小组，来制订未来军事行动方针的建议。艾森豪威尔特别指出：“关于这项工程的存在和目的是必须保守的最高机密”。

两个月后，7 月 16 日，艾森豪威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用 6 小时听取了这个项目的三个工作小组制订的各种各样的建议，尽管三个小组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一致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

1953 年 8 月 13 日，也就是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第 2 天，美国空军参谋长第内森·特维宁提交了一份称为《正在临近的国家危机》的绝密报告。特维宁由于得知苏联已经爆炸了一颗 30 至 40 万吨当量的热核弹头而焦虑不安，他宣称，美国遭到报应的日子正在迅速逼近，到那一天，美国会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将处于不能接受的地位。

特维宁把美国的军事史划作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美国能够达到其军事目的，因为这时它的军力强盛和有两大洋保护免遭攻击。在第二个时期（他认为该时期刚开始），美国将不能防御自己免遭对其大陆的直接攻击。《正在临近的国家危机》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想法；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唯一合适的时刻正在到来。

特维宁将军的报告僵硬地概述了美国的选择：要么准备国家遭受屈辱和失败，要么准备与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对特维宁和空军来说，是否打一场全面战争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战争何时开始。

1954 年 5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听取了参联会高级研究小组起草的一项绝密报告。参联会对苏联爆炸的氢弹感到焦虑不安，要求对苏联日益增长的核武库给以注意。参联会高级研究小组建议，必须对苏联发动一场突然性的核攻击。

根据李奇微将军的回忆，该报告要求“在最近的将来对苏联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突然性战争”来阻止苏联获得氢弹，从而成为对美国的真正威胁。

在该报告中，参联会这个美国的最高军事机构被告知，美国拥有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以便“预防”战争的优势。

（二）一个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计划

事实上，早在参联会高级研究小组向总统提交绝密报告之前的两个月，即1954年3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制订了一个以“消灭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基本战争计划”。这个“基本战争计划”是以往的“烤肉机”计划和“烧的”计划所不能做到的。五角大楼1948年制订的“烤肉机”计划只打算将34枚“马克”3型原子弹扔在24个苏联城市里，而战略空军司令部1954年的“基本战争计划”却要求进行一场真正大规模的和决定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735架装备着最新型的“马克”6型原子弹（这是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原子弹）的飞机；1700个地面目标和409个机场将被炸成粉末。

“基本战争计划”写道：“预计战略空军司令部能用载着600至750枚原子弹从不同方向到达俄国上空的飞机，发动一场进攻，以便同时打击俄国的早期预警屏障。从发起攻击到全部原子弹扔完大约需要2个小时，这些原子弹上装有自动爆炸装置，一命中B类或D类目标就爆炸。……在2个小时的攻击结束后，俄国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外不会剩下什么东西。”

与“烤肉机”计划需要用尽美国有限的核武库中的所有原子弹去进攻苏联不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本战争计划”给予总统在选择攻击目标上以相当大的灵活性。例如，战略空军司令部能用从费尔恰尔德（华盛顿特区）、沃克（新墨西哥州）、卡斯怀尔（德克萨斯州）和拉姆斯通（缅因州）等空军基地起飞的轰炸机向苏联投掷200枚原子弹。这些轰炸机在途中能得到从休尔、阿尔森（阿拉斯加州）等地起飞的加油机的空中加油。随着空中加油机的增加，执行轰炸任务的轰炸机的数量还能增加“如果预先在海外基地部署空中加油机，战略空军司令部能用从国内基地起飞的所有轰炸机向苏联投掷400枚原子弹”。

不过，最大限度的攻击计划将需要“在发动重大攻击前在海外基地部署足够的加油机和轰炸机”。在这个攻击计划中，战略空军司令部能部署5个重型轰炸机联队（每个联队装备30架B—36飞机）和13个中型轰炸机联队（除去一个联队装备B—29飞机外，其他每个联队装备45架B—47飞机）。

“烤肉机”计划受到老式的B—29轰炸机的1500至1700英里的航程的限制（这一航程只够美国飞行员单程飞到苏联，因此使得轰炸苏联的任务成为自杀性的），而最新的计划包括使用能够轻易返回它们出发基地的洲际轰炸机。它们是：携带“马克”6型核弹的B—36型轰炸机，飞行高度4万英尺时的航程为8000英里，飞行高度3万英尺时的航程为8800英里；携带“马克”6型核弹的B—47型轰炸机，在最佳高度飞行时，空中加油一次航程为5600英里，空中加油2次航程可达7800英里；携带“马克”6型核弹的B—52型轰炸机，在最佳高度飞行时，空中加油一次航程为7800英里，空中加油2次航程可达9000英里（第一个B—52轰炸机中队预计在1956年年中编入现役，第二个B—52中队同一年年底编入现役）。

“烤肉机”计划预计一场核战争可能要数月甚至几年，而“基本战争计划”则对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迅速结束一场与苏联的核战争抱有信心，李梅将军还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持续30天以上。

“烤肉机”计划只能希望将对方一军，而1954年3月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报告却断然宣称，美国的目标是“实现一种将保证美国生存的胜

利”。

关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划怎样才能与已宣布的美国将永远不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国家政策相一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的回答是：“我已经多次听说过这一思想了，它听起来挺不错的。但是，它与美国的历史并不一致。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了。谁发动了美国独立战争 1812 年的战争、印地安人战争和美国西班牙战争。我想清楚地表示，我不提倡预防性战争，但我相信，如果美国被逼到角落里，我们在首先发动进攻上不会犹豫不决的。”

虽然到了 1954 年，美国的核武库中已拥有足以摧毁苏联的力量并能够防止大部分欧洲被苏联占领，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期间，苏联完善了一代远程轰炸机，拥有了直接对美国本土进行报复的能力。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另一个国家能用发动小规模但造成重大损失的第二次打击的形式而直接把战争引到美国的心脏地区，浩瀚的大洋不再能保护美国了。

机会之窗在完全打开之前砰然关上了。

尽管空军强烈甚至激动地要求参联会认真考虑对苏联发动一场突然核突击的可能性，参联会自己的高级研究小组也提议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而只有陆军的李奇微将军反对这种进攻计划，然而考虑到苏联已拥有的核能力和美国尚无保护自己不受苏联一次小规模核报复的盾牌，最终，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弃了发动突然袭击或预防性战争的计划，而不得不采用大规模报复战略。

虽然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在 1954 年被抛弃了，但由于每年都有数百枚小型战术核武器加入美国的核武库，因此五角大楼仍对战术核战争感兴趣。它们的注意力现在已转到下一个进行核高压的竞技场：两个分别叫做金门和马祖的小岛。

八、在金门马祖危机中策划使用原子弹

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能够有效对待中国大陆的机场。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金门、马祖是离中国大陆海岸仅数公里的小岛，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在 1954 年和 1958 年的两次事件中，美国曾宣称它愿意为了两个岸边小岛而冒核战争的风险。

（一）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考虑使用核武器

1949 年，蒋介石逃离中国大陆时占据了金门、马祖这两个岸边小岛，他在这两个岛屿上设防并将其作为将来入侵中国大陆的踏脚石。在 1954 年晚些时候，蒋介石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行动。他在金门和马祖分别屯兵 5.8 万和 1.5 万，并公开吹嘘他将“返回大陆”。为了对蒋军的挑衅作出反应，中国政府 1954 年 9 月开始对这些岛屿进行炮击。

美国参联会立即作出反应。在几天内，1954 年 9 月 12 日，参联会会见了杜勒斯，向他建立美国应该用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核武器以进行报复。坚持认为“秃鹫行动”能防止莫边府在 5 月份陷落的雷德福海军上将，这时也和空军及海军参谋长一起要求进行核打击。他们要求艾森豪威尔批准对中国的战略目标进行原子打击和派美军去金门和马祖。

虽然参联会要求进行核攻击，但艾森豪威尔并未下决心。应该为这两个小岛而冒核战争的风险吗？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否要求在离中国海岸 2 英里的地方建立战线吗？

11 月 23 日，当中国政府判决了在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被出落的 12 名美国飞行员时，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参联会再一次强烈要求艾森豪威尔批准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以报复这些审判。艾森豪威尔再一次与盟国讨论了对中国进行可能的核攻击的意见，然而，大多数北约国家断然反对美国鲁莽的干涉行径。邱吉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都嘲笑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不赞成为两个小岛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艾登要求有一个缓和时期和进行谈判，他建议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出军事力量以换取中国同意永不“入侵”台湾。当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金门和马祖的陷落将意味着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也会最终陷落时，邱吉尔并没有被打动。

与此同时，参联会仍继续准备在金门和马祖危机中使用核武器。在 1955 年 3 月 10 日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杜勒斯警告说，使美国人民对向中国进行原子打击的明显可能性做好准备的时候到了。他在这次会上说：“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能有效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

3 月 15 日，在艾森豪威尔的允许下，杜勒斯对新闻界宣称：“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的战术原子武器”。在第二天举行的一次紧张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要求澄清杜勒斯的话。总统说：“是的，当然它们会被使用”。然后他说了某些使整个房间鸦雀无声的话：“在任何战斗中，这些东西（原子弹）能被严格用于军事目标和军事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它们不应该就象子弹和其他任何东西那样被使用。”

3 月底 4 月初，海军上将罗伯特·卡内的话给这种紧张局势又加了把火，

他说总统正在计划“摧毁红色中国的军事潜力和结束它的扩张倾向”。他武断地对国家新闻界预测，战争将在4月15日爆发。参联会估计，中国人将在亚非国家会议之前占领这两个小岛，该会议预定4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

然而，卡内海军上将预言的4月15日最后期限过去了。中国和美国都不愿使局势更白热化。艾森豪威尔认识到蒋介石正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煽动一场战争，他命令蒋介石减少对中国的挑衅。蒋介石感到他被要求闭住嘴，因此甚至不会见美国代表团。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政府不希望与美国打仗。对这两个小岛的炮击大大减少。到5月份，炮击完全停止了。美国和中国就释放被中国逮捕的美国飞行员进行严肃的谈判。在危机消退后，一些报刊的社会评论说，为那两个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岛屿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是不合理的。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占领大陆的梦想。在三年后，他又企图挑起一场核危机。

（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又到了核战争边缘

1958年8月25日，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森豪威尔视察一座巨大的、设计用于抵挡直接核爆炸的防御工事。就在他走进山洞掩蔽部时，收到了未曾料到的消息。在间歇三年之后，金门——马祖危机又一次突然爆发。艾森豪威尔听取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紧急情况简报。

蒋介石一直发誓要“占领大陆”，为此，他在金门、马祖部署了10万军队，相当于他全部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这大大超过了三年前引发第一次危机时的军事力量水平。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4月24日开始再一次炮击这些岛屿。

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立即作出了反应。杜勒斯和参联会开始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9月4日，艾森豪威尔会见杜勒斯和他的助手古德帕斯特将军，讨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杜勒斯对这主意很热心。据古德帕斯特的说：“杜勒斯先生对原子武器问题很关注，他提醒说，我们已经按照在遇到任何规模的敌对行动的情况下使用原子武器的设想来安排我们的防务。他宣称，如果在情况危急时因为世界上的反对意见而不使用原子武器，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防务结构。”

不过，在这些年里，艾森豪威尔已经对在任何危机中都要威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意见持相当冷静的态度。他保持了使用核武器的选择，但又担心使用核武器会使美国公众惊恐和加深北约内部可能出现的裂痕。在与参联会举行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强调了小心地使美国人民做好应付在这场冲突中任何可能的升级的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9月6日，深信战争即将到来的特维宁将军拜会了艾森豪威尔，要求他授给第7舰队司令以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极力。特维宁争辩说这会有利于在战争情况下及时使用核武器，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

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全国电视上向美国人民解释局势的严重性。他提出了美国卷入第二次金门和马祖危机的可能性，并又一次用多米诺骨牌理论解释美国的核选择。

由于公众情绪强烈，艾森豪威尔排除了危机进一步的升级。这时，艾森豪威尔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国人愿意谈判，但美国怎样能使它自己从危机中脱身而又不丢面子和不触怒蒋介石呢？国防部长尼尔·麦克爱罗伊

建议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麦克爱罗伊说，他一直“想弄清，如果我们不能说服蒋介石撤离这两个岛，是否就没有其他人能接替蒋。”回顾 1953 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愿意考虑暗杀李承晚，如果他继续阻挡停战谈判的话。但艾林豪威尔排除了暗杀蒋介石的选择。

作为替代方法，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保全面子的办法。中国政府宣布，只在每月的单日向金门和马祖打炮，以便蒋军能在双日进行补给。艾林豪威尔“很想知道，我们是否在打一场英国古典喜剧中的战争。”停火谈判终于开始了。

第九章 从确保摧毁到打击军事目标

(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60年,美核大战作战计划一直由战略空军独家制定,但50年代后半期,随着各军种、各大联合总部纷纷装备核武器,它们又各自制定自己的核打击计划,以至造成打击目标的大量重叠和相当的混乱,有的重要目标被重复列入打击清单达六、七次之多。这时,制定全军统一的核大战作战计划已势在必行并刻不容缓。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其任期结束前完成此事,下令必须在1960年12月底之前制定出“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OP)。1960年8月16日,经总统批准国防部长盖茨下令成立直属参联会领导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JSTPS),负责SIOP的制定工作。从这时起直至冷战结束,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先后制定并经执政总统批准生效了6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

每个计划制定完成并获批准生效后,仍处于不断的修改过程中。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依据最高决策当局下达的新的目标政策,根据新发现的敌方重要目标和美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变化,对计划随时进行修订。每隔6至12个月就有一个新的SIOP版本出现,依次以字母排序表示(例如,1976年1月1日生效的SIOP—5,至1980年已修订为SIOP—5D。1983年10月1日生效的SIOP—6,至1989年已成为SIOP—6F)。“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是美军最重要、最机密的作战计划,本章拟从军事学术的角度,依据收集到的公开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2 号

(SIOP—62)

一旦获悉(苏联发动)实际进攻的警报,便迅即发起战略进攻。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SIOP—62 是美国关于核战争的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该作战计划于 1960 年 12 月完成,1961 年 7 月 1 日被批准生效,因当时这一天为 1962 财年开始之日,故此该计划被称为“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2 号”(SIOP—62)。这个核战计划仍然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产物,本属于前一章阐述的内容。现将这一核战计划列入本章,主要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把 6 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联系起来阅读和比较,以便把握美国核战计划发展变化的轨迹。

(一) 大规模先发制人的全面打击

1954 年 1 月,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总部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详细说明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根据他的说法,甚至如果苏联发动常规战争,美国也要用它的全部核力量进行打击。不过,如果假定艾森豪威尔仍保留进行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那么把美国政府的核政策称为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政策会更加精确。

在几乎整个 50 年代,美国奉行的就是“大规模报复”战略,与其相适应的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实质是依靠美国在核武器和战略空军方面的巨大优势,以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全面打击相威胁,慑止包括全面战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危机和战争。“大规模报复”战略和与其相适应的核力量运用政策的基础是美国所拥有的绝对核优势,其前提是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动用核武器,甚至实施“第一次打击”也不会招致报复。

“大规模报复”战略在核力量运用政策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强调在发现敌人有进攻的征兆或美国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迅即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于 1954 年 1 月 16 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今后无论是在朝鲜、印度支那、伊朗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新的代理人战争或灌木林火式战争,美国都可能立即使用原子武器对苏联或是红色中国进行报复。”艾森豪威尔在 50 年代中期一次参联会高级研究小组的汇报会上,专门听取了该研究小组关于美国应认真考虑在苏联力量构成对美“现实威胁”之前,“精心准备一场突然袭击苏联的战争”的建议。在当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他的强烈意愿:“一旦得悉(苏发动)实际进攻的警报,便迅即发起战略进攻”。他明确指出:“大战将是核战争。”当杜勒斯在公开场合使用外交辞令解释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安全”时,艾森豪威尔私下对一个国会代表团说,此战略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动手的话,就立刻揍得他们的灵魂出窍”。此外,艾森豪威尔在整个 50 年代中还反复强调美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行动的必要性。1956 年 3 月他指示参联会,“一旦得悉苏军将要有所动作,战略空军的轰炸机就必须立即出动。”1957 年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决不能容许敌人先打出第一拳”。

“大规模报复”战略在核力量运用政策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力求一举摧毁敌方核进攻力量和战争潜力。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核弹头的总数已达数千个，轰炸机数量也增至 1500 余架。核实力的增长使其可以制定同时对苏核力量和工业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作战计划。1955 年战略空军的 B 任务中已包括对苏集团国家 645 个机场的攻击，并准备使用 25 枚核弹摧毁苏核能源设施。在 D 任务中，战略空军计划攻击苏 134 个主要城市中的 118 个。参联会的报告称，“整个苏联——中国集团国家的人员伤亡将达 7700 万，其有 6000 万人死亡。”在遭到攻击的 118 个城市中伤亡人数比例将达居民总数的 75% 至 80%。鉴于如此之高的人员伤亡率，这些城市的工业能力在 6 个月中将完全丧失或不可能恢复。S10p—62 是一个缺乏灵活性，十分僵硬的核战计划，无论是在可能情况下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还是随后的反击，均属极端的大规模报复性质。虽然该计划从表面看包括 14 个子方案可供总统选择，但这些子方案只是在时间顺序上进入戒备的战略导弹和轰炸机数量不同，而一旦发起攻击，就需将美全部核弹投向苏中集团国家而无任何其他选择。S10p—62 在使用核武器和打击目标上均不作保留，凡敌性国家均不余遗力地予以攻击。虽打击目标中只有 15% 至 20% 是城市工业目标，但总体毁伤程度是极度惊人的。参联会向总统报告说，实施 S10p—62 “将使美在核大战中取胜”。取胜从军事意义讲主要指美能够成功地实施其作战计划。当时的作战计划要确保美对苏目标投掷核弹达到 75% 的成功率，以“摧毁或瘫痪苏核打击能力和主要的工业/城市中心”。

（二）“真令我震惊不已”

虽然 S10p—62 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指导下制定的，但他在听取计划完成后的汇报时私下对其助手说，这种毁损程度“真令我震惊不已”。

指导第一个 S10p 起草工作的政策依据是由国防部长盖茨签署的《国家安全目标政策》、《S10p 起草指南》和由总统亲自批准的 NESC2009 号文件。这三十文件要求，在 S10p 中，打击目标的优先顺序为：

- 1、苏战略核力量；
- 2、主要军政指挥中心；
- 3、城市/工业中心。

该计划还要求将这三类目标优化组合，同时予以打击。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意味着苏联对美国的进攻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55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下列战术警报的出现即意味着苏对美的进攻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

- 苏飞机以作战编队方式穿越美防空警戒线；
- 苏进攻美海外领土、军事基地或北约盟国；
- 相当数量的苏潜艇在可对美主要港口实施有效进攻的海区集结；
- 在美港口附近或主要近海航道布设水雷等。

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2 号虽然包括多个子方案，但实际内容差别不大，若付诸实施，美将在战争爆发时就发射所有的核武器，同时打击 NSTL 所列的位于苏联、中国等敌国的 4100 余个目标中的 2600 余个政治、经济、军事目标，预计将造成 3.6 亿至 5.25 亿人的伤亡。该计划从技术上讲，大致解决了核大战中的统一计划问题。从战略上讲，它贯彻了当时美政府宣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在战争一开始便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全面摧毁敌方核力量和支持战争的能力，迫使其迅速崩溃或屈服。

二、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3 号

(SIOP—63)

在一场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消灭它的平民。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1962 年，根据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打击军事力量”的政策主张，美国开始对原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导下制定的核战计划——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2 号(SIOP—62)进行全面审查修订，并重新制定了新的核战计划——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3 号(SIOP—63)，该计划于 1963 年 8 月 1 日被批准生效。这是一个与 SIOP—62 完全不同的核战计划。

(一)“打击军事力量”政策

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发生了危机。其中最主要直接的原因是 50 年代后期，苏联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使苏联获得了能够直接给美国本土造成巨大破坏力量的远程核打击能力。享有东西两大洋屏障的优越地理环境，不再能给美国人编织“安全之岛”的幻梦，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核武器而不受到惩罚的时代已经结束。到了 60 年代初，第二次柏林危机又达到高潮，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苏之间爆发一场战争的问题更加现实；而且，“大规模报复”战略企图以单一的手段慑止各种类型的战争和冲突的目标已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1961 年初，肯尼迪入主白宫，立即摒弃了僵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以“灵活反应”战略取而代之。肯尼迪认为，在苏联的洲际导弹威胁面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报复，而是如何在一场实际的核战争中使美国的城市免遭核导弹的袭击，尽量减少损失。并使总统在危机和冲突时能够在多种方案中作出选择，从而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适应“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1962 年 6 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位于安阿伯的密执安大学发表了对其后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有着深远而重大影响的演说。他说：“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消灭它的平民。”这一观点立即被称为“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或“不打城市”战略。这是美国战后首次提出的把敌方军事力量作为核战争中主要打击目标的政策主张。

此后，麦克纳马拉多次进一步阐述其战略主张。其基本观点是：在核交锋的初期阶段只攻击苏军事目标，但需保留在必要时可摧毁苏城市的能力。为此，麦克纳马拉在备忘录中写到：“我建议选择这样的（核）力量，它将使美具备此种能力：在遭到苏核攻击后，首先回击苏轰炸机基地、导弹发射场及其他与远程核力量有关的设施，以削弱苏核力量并限制苏后续攻击可能对美造成的损失；第二，与此同时保持一支受精心保护的预备力量，这支力量在需要时可按有控制的、精心安排的方式摧毁苏城市社会”。这就是所谓的“限制损失”的战略主张。虽然这一战略的提出和执行遇到了来自美国国内、欧洲盟国以及核技术发展上的层层阻碍和困难，以至到了 60 年代后期，与“大规模报复”战略一脉相承的“确保摧毁”战略思想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主要是反映在核威慑政策（即“声明政策”）上的转变，它并没有

对在“限制损失”战略思想指导下，以“打击军事力量”为基本内容的核力量运用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如1969年约翰逊政府一位助理国防部长所说的：“自麦克纳马拉阿伯讲话以来，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3号（SIOP—63）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第一个有多种选择的核战计划

在酝酿限制损伤战略的同时，制定新的SIOP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早在1961年上任之初，麦克纳马拉就指示参联会将有控制的反击和谈判间歇纳入作战计划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随后，根据麦克纳马拉的指示，国防部和参联会下达了反映新战略要求的《对核大战计划的政策指示》，作为制定新SIOP的政策依据。新计划根据中苏分裂的现实和新战略的要求，在规划打击目标时，将苏联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作了区分；也将苏联战略核力量与城市目标作了区分。在核力量运用上，提出了“战时威慑”概念，即保留一支战略预备队，在核战争初期避免使用，用来遏止敌人对美国城市人口的攻击。同时，为了能够“有控制地作出反应”，要求对美国的战略指挥、控制系统（C）进行可靠的保护；而对苏联的指挥、控制系统，则在交战初期避免打击，以免逼迫敌人作困兽之争而导致冲突升级为全面核大战。

与原来的作战计划相比，新的核战计划（SIOP—63）的最大变化是，它摒弃了“一下子”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方案，提出了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规定在核战争爆发时，按以下顺序对苏联的种类目标进行攻击：

- 1、战略核力量
- 2、远离城市的其它军事力量和军事资源；
- 3、城市附近的军事力量及资源；
- 4、苏联的指挥、控制系统；
- 5、必要时对城市——工业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击。

该计划规定，对第一、二类目标在必要时可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但与此同时应该制定出包括避免直接打击城市/工业目标和保留对某些国家不打的方案。经麦克纳马拉批准的SIOP—63实际包括了四个方案。其中第一案规定只对苏战略核力量进行打击，第二案包括打击苏常规军事力量，如果此案顺利实施，可将苏/华约地面部队消灭至只剩17个师（苏军7个师，其它华约国家10个师），其空军将失去有效作战能力。第四案与SIOP—62基本相同，即对所有目标同时实施不遗余力的全面打击。1962年11月21日国防部长办公室一份题为《关于1964—1968财年美战略报复力量的建议》的备忘录所列的1860个目标中，只有210个（占11.3%）是城市/工业目标。在计划动用的3253枚核弹中，只有349枚（占10.7%）用于打击城市/工业目标，且优先次序排在后面。

到了60年代中期，“确保摧毁”开始成为美国的一种主导的战略思想。当时美政府在公开政策声明中已将重点放在“第二次打击”上，但SIOP—63并没有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先发制人的可能性。参联会在1963年12月致国防部长的一份报告中称，美打击军事目标的力量“可在先发制人的情况下使用，以提供一种可对苏军事目标进行相当规模的第一次打击的方案。”这份由参联会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陆战队司令共同签署的报告（空军参谋长没有附签，他主张全面的第一次打击）主张SIOP方案应这样规划：“根据先发制人或报复反击的不同情况区分我们打击城市/工业和军事目标的力量”。SIOP—63中也确实包括了先发制人方案。麦克纳马拉对第一次打击持否定态度，但对首先使用和先发制人却持肯定态度。他在1963年致总

统备忘录中称，在战争初期，打击军事目标“可摧毁部分苏核投掷系统，并打乱剩余部分的协调性从而有助于我们防御体系完成任务，以此减少美国的损失”。即使没有第一次打击能力，率先实施打击军事目标的进攻仍大有裨益。他写道：“这可在最坏的情况下取得最佳结果”，这种进攻的目的在于“打掉苏绝大部分战略权力量，同时保留苏城市不打，从而胁迫苏避免攻击我国城市并接受和平条件”。

不难看出，SIOP—63与SIOP—62有明显的区别，SIOP—63是一个体现麦克纳马拉“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作战计划。它为美国战略核力量提供了一个在威慑失败情况下可以用于军事目的而作战的统一政策和战争计划，具有鲜明的实战特征。它还提出了许多反映“灵活反应”战略要求的战略概念，如“逐级使用”，“有控制地作出反应”以及“战时威慑”等等。可以这样说，60年代初，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主张和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制定的SIOP—63，成为其后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和新的核战计划发展演变的基石。

三、“歪球”（DuckHook）作战计划

我有一个结束越南战争的秘密计划。

——理查德·尼克松

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8 年抓住了属于他的机会。这年 11 月，他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民对越南战争无止境流血的厌倦和由此引起的深刻分裂，以怀揣“结束越南战争秘密计划”和“和平候选人”而赢得了总统选举。

尼克松所说的秘密计划就是代号为“歪球”的作战计划。这个在 1969 年 7 月 20 日最终形成核战计划要求使战争升级，包括对越南北方使用原子弹。

（一）最后通牒——核选择

当选总统尼克松委派海军作战部长托马斯·穆尔海军上将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起草了“歪球”计划，甚至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对此都毫不知情。与仅仅要求消灭奠边府的越盟的“秃鹫行动”计划不同，“歪球”计划要求特地安排一系列威胁，如果越南人无视最后通牒规定的 1969 年 11 月 1 日的期限，就对越南人投掷一枚战术核武器。象尼克松说的那样，以 11 月为期限的最后通牒是由亨利·基辛格所设计的核实战理论的一次直接应用。

按照“歪球”计划的一系列威胁将在数月时间里递出。如果越南人到 11 月 1 日还拒绝后退和停止在南方的所有军事行动，那么“歪球”计划将给总统提供一系列选择：在海防港布雷、空袭北越的水坝、从陆上入侵北方、对联接越南与苏联和中国的关键铁路线投掷原子弹。

只有尼克松的亲信助手才知道“歪球”计划。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助手威廉·瓦茨在一个偶然的发现发现了该计划的内容。他回忆说，8 月份他所有与基辛格一起出席一个晚会，当某个人谈到“歪球”一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立刻静了下来。基辛格后来在车里向他简单谈了该计划：“从广义上说，该计划的执行就是要向他们表明，我们是强硬的”。

几星期后，瓦茨亲眼看到了“歪球”计划，这些海军文件的封面被印成蓝色的，上面有一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该文件包括间谍照片和使用威胁的计划。“这些是非常大的赌注，我们不得不考虑它。”他严肃地对基辛格说。

基辛格的另一个助手罗杰·莫里斯看到了关于攻击目标的附件，上面显示至少准备在北越的几个地点使用两枚低爆炸当量的核武器。莫里斯回忆说：“该计划中一再使用‘猛烈的’一词……对北越进行猛烈的、不间断的轰炸以迫使他们回心转意……那就是全部含义所在。”

威胁在 8 月份开始。基辛格 8 月 4 日在巴黎秘密会见了越南人，私下传送了这个最后能牒：“如果到 11 月 1 日还没有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将被迫——非常不情愿地——采取有重大后果的措施”。

到 10 月份，由于从越南人那里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基辛格开始进一步对越南人施加压力。为了表明他是说话当真的，他不会进入全面核戒备状态，并叫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这是没有先例的。自从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还没有进入全面核戒备状态并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 B—52 轰炸机队派到空中准备进行核攻击。“三级戒备状态”就代表向核战争迈出重大的一步，“一级戒备状态”

代表“最高程度的力量准备”。

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知道两个核大国处于一场核战争的边缘，B—52 轰炸机和“民兵”式导弹已作好了进行一场全面核打击的准备。这是给苏联的一个不会使人误解的信息，目的是要苏联压越南人放弃在南方的军事行动。

（二）破产的计划

然而，随着 11 月 1 日最后通牒期限的临近，越南人并未显示出任何后退的迹象。最后通牒使美国的核实战论者陷入了困境。

在一份已开始的绝密备忘录中，威廉·瓦茨在 10 月 13 日恳求基辛格重新考虑以 11 月为期限的最后通牒：“美国可能被抛入国内暴力骚乱中。假如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将不得不准备接受其后果。普遍动员国民警卫队可能变得不可避免，使用美国陆军部队也可能接着发生。政府在处理国内分歧时面临的处境可能会象它实施 11 月计划一样严峻。”尼克松的助手们强调指出，对越南人投掷原子弹会在国内引起骚乱的浪潮。

尼克松承认：“我不得不决定如何对待这个最后通牒……但是我知道，在所有的抗议和罢课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会由于战争的任何军事升级而严重分裂……10 月 14 日，我毫无疑问地知道，我的最后通牒失败了……50 万人来到华盛顿举行 10 月 15 日的抗议活动……在 10 月 15 日夜里，我想到了这种和平抗议活动的讽刺性。我认为，它毁掉了在 1969 年结束战争的任何小的现有的可能性。”一级戒备状态持续了 29 个整天后不得不取消，否则使用过度的 B—52 飞机会开始发生故障。

“歪球”计划代表了将核实战理论最精心地应用于外交。它是“有控制的暴力”和“通过暴力的外交”的最高形式，但尼克松在最后一分钟否决了他自己的计划。

在越战结束后，有人问北越外交部长阮维桢，基辛格精心安排的威胁的理论对越南人是否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在巴黎秘密会谈期间，他曾走到基辛格旁边，告诉基辛格他已经读过基辛格关于运用威胁进行讨价还价的书。他说，基辛格认为，作出一个虚张声势的威胁而使敌人认为是真正的威胁是一件有利的事；如果向敌人显示真正的威胁而敌人认为这是虚张声势，那就坏了。阮维桢告诉基辛格：“我们越南人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威胁是真的还是虚张声势”。

16 年后，在《时代》杂志一次采访中，尼克松承认“为了达到那些目的（与苏联和中国建立新关系），我也不得不考虑怎样结束在越南的那场战争。选择之一就是大规模战争升级：或是轰炸水坝或是使用核武器。当然，也有第三个选择：撤退和脱身。把越南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人”。

四、在几次中东危机中的核选择

这象是一场恐怖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一场核战争正在末端等待着。

——理查德·尼克松

战后，中东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充满危机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曾多次对这一地区威胁使用核武器，以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一）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曾利用“核大棒”成功地慑止了苏联向这一地区实施渗透的战略企图。

1952年推翻腐败的法罗克国王后，纳赛尔上校成为中东的主要的民族主义领袖。由于英殖民帝国正处于严重衰落之中，他决定在被英国人1882年夺取的地区重新恢复阿拉伯控制。1956年7月，纳赛尔取得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10月29日晚，以色列侵略埃及占领西奈半岛。31日，英国和法国联合进行武装入侵。

尼克松回忆了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怎样发挥核武器的威胁作用以达到成为中东的一个主要角色的目的：“1956年，我们曾考虑在苏伊士运河使用核弹，而且我们确实在外交上使用了它。俄国人吁请我们与他们一起派一支联合部队去把英国人和法国驱逐出这一地区。艾森豪威尔回答说那是不能考虑的。我们正试图使用外交影响，但他不打算与俄国人一起反对我们的盟国。赫鲁晓夫自命不凡，他发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宣称俄国人将单方面进入中东地区（去帮助埃及人）。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很有趣。他叫美国驻北约大使艾尔·格仑瑟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格仑瑟说，如果赫鲁晓夫执行他使用导弹对付不列颠诸岛的威胁，莫斯科将被‘确定无疑地’摧毁。从那时起，美国在中东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角色”。

（二）1970年的中东危机

1970年，尼克松试图效仿艾森豪威尔的作法，以核武器支持侯赛因国王的政权并威慑苏联，然而这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

这一年9月15日，侯赛因国王命令5万人的陆军去一劳永逸地摧毁巴解组织在他国内的基地，巴解游击队与侯赛因国王的军队之间战争公开爆发，这时尼克松害怕侯赛因的计划可能引起反作用，导致侯赛因国王本人被推翻。这样将可能引起超级大国在这个富有爆炸性的地区发生对抗。尼克松写到：“这象一场恐怖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一场核战争正在末端等待着。”

当安曼于9月17日在一场全面战争中被吞没时，基辛格发出了威胁的“信号”，以便使苏联不介入这场危机。尼克松下令两艘航空母舰和14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140架飞机、1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东地中海集中。3个在欧洲的陆军营奉命准备在8小时内空降到约旦。在布莱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基辛格命令军事通讯不必使用专用密码，以便苏联人能得到这一信息。

但是，这次核威胁没有基辛格所希望的那样成功。虽然巴解组织被赶出了约旦，苏联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作出反应。他们在核威胁面前并没有畏缩。两年后，1972年，基辛格会见了研究核武器的特别小组，该小组的领导人是五角大楼防务研究和工程局局长约翰·S·福斯特博士。在那次会见中，基辛格宣称，1970年的约旦危机是核威胁几乎失败的例子。

（三） 1973 年的“十月战争”

1973 年 10 月 6 日，发誓要夺回在 1967 年战争中被以色列人占领的领土的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在战争的开始阶段，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在埃及军队突然攻击下顷刻瓦解。10 月 16 日，以军在北线取得主动后，派列阿里尔·沙隆少将率领部队乘埃军空隙突破大苦湖，发动了反击，战场形势迅速扭转。最后，以色列军队不但击退了阿拉伯国家的正面进攻，而且几乎包围了埃及的第三军并威胁要消灭它。虽然在叙利亚前线要求停火，以色列继续拉紧对第三军的绞索。

苏联人害怕埃及军队发生严重崩溃，象在 1956 年苏伊十危机中一样于 10 月 20 日再一次给美国发了一份紧急电报，提出联合派出美国和苏联军队去实施停火。美国则向苏联人保证，以色列将不会消灭第三军。两天以后，基辛格飞到以色列说服梅厄总理接受停火。他充满自信地结束了这次会见，深信所有各方都达成协议了。但是，以色列人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加强对第三军的围攻。10 月 24 日凌晨，美国情报机构发现苏联的所有 7 个空降师都处于戒备状态，这显示苏联人可能计划去支援第三军。

当晚 9 时，勃列日涅夫给基辛格发了一份紧急电报，指责以色列人违反停火协议并再次强烈要求派出一支美苏联合部队去实施和平。但是，这次勃列日涅夫的电报宣称，如果美国继续以苏联认为是不守信用的方式行事，苏联将考虑单方面行动。

夜里 11 时，基辛格召集处理危机专门委员会（即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该委员会包括基辛格、詹姆斯·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参联会主席托马斯·穆尔海军上将。该委员会当晚选定使用核选择。征得尼克松的同意后，午夜 11 时 41 分，参联会主席托马斯·穆尔海军上将命令美国核力量进入三级戒备状态。

翌日凌晨两时，美国核力量进入大规模戒备状态。50 至 60 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基地转场到美国本土。第 82 空降师（有 1.5 万军人）奉令在上午 6 时出动。空中加油机奉令起飞并开始非例行活动。航空母舰“约翰 F·肯尼迪”号离开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锚地开往中东。核实战论者感到很自信，认为这种核威胁只会被苏联情报机构认识到，因此在美国国内对这一升级行动保守秘密。

25 日中午，当一个超级大国正准备进行核战争一事已变得很清楚时，基辛格举行了一个紧张的记者招待会。基辛格以简单明了、使人不会发生误解的语文介绍了这次核危机的范围。

几年后，历史学家们在讨论该次核戒备的确切性质问题上发生歧议。尼克松承认，这次核戒备确实是针对苏联的，进行那样的威胁完全是他的决定。尼克松说：“我想发出那样的信号（以阻止苏联卷入），使核武器进入戒备状态达到了这一目的……那是我的决定。有许多传言说那是某个其他人的决定。其实它是我的决定。”

五、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5号

(SIOP—5)

在一次核攻击事件中，难道总统只能有一种选择，即下令大规模灭绝敌方的平民，而明知这将导致美国的民众将遭受到敌人大规模屠杀？

——理查德·尼克松

1970年2月18日，当选刚刚一年多的尼克松总统在致国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一次核攻击事件中，难道总统只能有一种选择，即下令大规模消灭敌方平民，而明知接踵而至的将是美国民众被大量屠杀这样一种现实？”难道总统应该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或是屈辱或是大屠杀，或是投降或是随灾难的后果？”在尼克松总统的指示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参联会开始着手审查美国的核战略和制订新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

(一) 进行有选择的核打击

60年代，美国的核力量运用政策存在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核威慑战略在北约盟国中的可信度降低。虽然麦克纳马拉反复声明，美国在必要时将根据灵活反应战略使用核武器来保卫北约盟国，但由于此战略所设想的核大战战局，不能不使北约盟国怀疑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对付苏常规进攻的决心。难道美国真会为保卫欧洲而毁灭自己吗？

第二，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3号）仍然比较僵硬。根据1970年美苏核武库的规模，即使美只实施打击苏军事目标的方案，其毁伤程度也是极为惊人的。按照SIOP—63中的最低一案，只集中打击苏联核力量，美国也需一下子发射数百个核弹头，并且肯定要杀伤几百万苏公民，从而必然引起苏相应的报复。所以确保摧毁战略无法回答下述问题：如果威慑失败，苏对美发动了有限规模核攻击，或在欧洲战场上北约盟国的常规防御失败，升级至使用战术核武器仍不管用，美国战略核力量该如何使用？麦克纳马拉在1968年1月致总统备忘录中承认：“如果战争以非全力以赴的方式开始，我们将希望实施有控制的和精心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以取得尽可能好的结局。缺少此类计划是我们当今最主要的弱点之一。”

第三，苏联积极扩充进攻性核力量和发展战略防御系统，使美确保摧毁能力受到威胁。60年代中期，麦克纳马拉在制定核战略时曾估计苏联在建立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之后，也就是在同样拥有了确保摧毁能力之后，会主动放慢核军备建设速度。但到1970年，事实证明他错了。那一年苏联洲际导弹数量（1300枚）超过了美国（1054枚），到1972年苏联洲际导弹数量超过美国达30%之多，三位一体投掷工具总数也超过了美国（苏2127件，美2000件）。同时，苏联还加紧建设保卫莫斯科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苏联核扩军势头使美国甚为担心：苏联不仅不能容忍自己处于核劣势地位，甚至不能容忍核均势，其目标在于取得核优势。

为此，美国着手制订新的核力量使用政策。

早在1969年1月21日，即尼克松就职的第二天，基辛格签发了第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其中写道，核战争“可能以危机逐步升级的形式发展

而来。……如果威慑失败，有选择的反应能力也许可以提供限制损伤的多种途径。”1971年2月15日，尼克松在外交政策咨文中称。“我们必须拥有能够对特定威胁作出在性质和水平上恰如其分反应的能力和办法。这意味着需要有必要的计划和指挥与控制能力，使我们能够有所选择，恰当反应，而不必依赖大规模的毁灭”。依据总统的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对核力量运用战略的调整进行了深入研究。1974年1月17日，尼克松签署了《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第242号》。此备忘录指出，必须进一步研究核力量有限使用方案，并正式列入新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该文件的核心思想是准备打逐步升级式的有限核战争。备忘录称，美国必须“留下一些至关重要的目标不打，扣作人质，给对手留有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的余地，这样做有可能取得对美国及盟国最为有利的结果”。

从1974年初起，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核战略的讲话，解释《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242号》，所以这个时期的美核战略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1974年3月4日他在国会作证时称：“在过去，我们制定了大规模核打击计划，据此可向苏联倾泻数以千计的弹头。……现在对打击方案的修改是为了给美国总统，无论他是谁，提供直至仅使用几枚核武器的方案。”

1974年4月，施莱辛格根据《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242号》的授权，下达了《第1号核武器使用政策》，在这两个文件的政策指导下，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拟制了“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5号(SIOP—5)”，该作战计划于1975年2月被批准，1976年1月正式生效。

1977年卡特勒入主白宫后，曾一度否定了“逐步升级的核战争”和“打击军事目标”的战略主张，理由是拥有充足的打击苏联城市目标的核力量，足以慑止苏联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因此不必耗费巨资去发展高精度的打击军事目标的核武器。然而，在他执政的后期又重新提出打击军事目标的核力量运用政策，1980年，统一的联合作战计划(第5号)的修订本(第5D号)就是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出笼的。

(二) 核实战理论与第一次打击武器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核实践理论在一系列的总统指令中被磨砺和完善。

《总统指令第18号》(1977年8月24日)要求在打击军事力量的目标上具有灵活性，这与《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242号》中指出的要求相似；

《总统指令第53号》要求彻底检修在核战争中为控制军事力量所必需的指挥、通信和控制系统；

《总统指令第57号》和《总统指令第58号》被称为“保持政府连续性”的文件，精心设计了在一场核战争期间以及其后保持一个能够运转的政府所必需的步骤，包括为政界和军界的“精英”们建造特殊的防核辐射掩体以及缩短在攻击后恢复时期为再行使政府控制所必需的时间；

《总统指令第59号》(1980年7月25日)第一次公开承认，卡特政府正在准备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它是《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242号》直接派生下来的东西，并在《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号》中得到延续。该文件代表了卡特完全皈依了核实战论。它代表了从“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根本转变，是《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242号》的改进，它指导美国武装力量准备进行各种各样的核冲突，包括进行有限的和延长的核战争以及对苏联领导和指挥结构进行“砍脑袋式的”打击。

在核实战理论形成和确立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威力巨大的第一次打击武器开始研制并即将部署。第一次打击武器的基本任务是摧毁对方加固的导弹发射井和通信枢纽以避免遭到对方的报复。精确性是确保这些先发制人的武器发挥最大效能的关键。这些武器是 MX（和平卫士）导弹、“三叉戟（D—5）”导弹和“潘兴”导弹。

MX 导弹和“三叉戟”型导弹不但威力大而且精度高。MX 导弹能将 10 个弹头投掷到目标的 300 英尺之内。而“三叉戟”导弹能将 14 个弹头投掷到目标的 400 英尺之内。因为它们是特别设计用于敌人的导弹力量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所以，它们被称为“主要的第一次打击武器”。

MX 和“三叉戟”导弹的精确性可与在 10 英里距离上击中一只苍蝇的眼睛相比。从怀俄明州发射，它可精确到足以将一枚氢弹投掷到莫斯科城区的一个足球场之内，或投掷到克里克林宫的院子里。

“潘兴”导弹可称作世界上最精确的弹道导弹，它能将核弹头投掷到离它攻击目标 100 英尺以内。具有如此的精确性，它能在发射后 6 分钟内将核弹头投掷到克里姆林宫的庭院里。而且，“潘兴”导弹还是一种配有机动发射车的固体燃料火箭，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执行发射命令。

（三）新核战计划的特点

首先，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 号的打击方案组合方式多样，灵活性大。核打击方案分为四个大类：大规模进攻方案、选择性进攻方案、有限核战方案和地区性核战方案。这几类方案有分散有组合，最少只使用几个核弹头。战略空军司令埃利斯上将 1980 年 3 月在国会作证时称：“威慑不能简单地分成各个具体方案……必须将其看成互相关联的整体”，他举例说：“作战活动可从位于关岛的安德逊战略空军基地直至中东展开，以对付苏在此地区的常规进攻”。作为选择性进攻方案的一例，他说，美国已制定了对靠近伊朗的苏军事设施，包括苏境内的军事基地和机场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可至少在 30 天内严重削弱苏在中东——波斯湾地区的部队投送能力”。

其次，打击目标数量大幅度增加。选拔余地大。1974 年该作战计划开始制定时，列入国家战略目标清单中的目标数已达 25000 余个，到 1980 年修订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D）中，打击目标又增至 4 万余个。这些目标分为五大类：苏核力量、常规力量、军政指挥中心、军事工业、与经济恢复有关的工业。

最后，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 号）包括一系列有控制的逐步升级方案。以往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主张在核交锋之初就全面突击苏联的洲际导弹，强调以实力手段摧毁苏联的核力量，以此来限制苏联的反击可能对美国造成的损伤，而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 号则试图以某种“保留”行动来“引导”苏联采取与美国相应的克制态度。一旦威慑失败，则运用逐步升级的有控制的有限核战争方案，重申在北约的常规防御失败时，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保证当美国或盟遭到苏联有限核攻击时，美国能够作出恰当而有效的反击。

六、悬在伊朗上空的原子弹

“若要在伊朗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或许必须威胁或确实使用战术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报告“波斯湾的潜力”

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伊朗再次爆发危机。执政的卡特总统效仿杜鲁门以来每位总统的先例，挥舞着核大棒，求助于核恐吓，旨在控制伊朗日益恶化的局势。

（一）“埃杰克斯”行动

这次冲突的渊源可溯及到34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第二年，美国和苏联曾在伊朗第一次“摊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单独约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后任苏联外长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递交了要求苏军从伊朗北部撤军；否则将实施原子突击的最后通牒。

第二次伊朗危机发生在1953年，那年6月30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中央情报局颠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计划，摩萨台将美国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中央情报局驻伊朗站长何密特·罗斯福起草了代号为“埃杰克斯”的行动计划，要求贿赂伊朗士兵并雇用德黑兰一群乌合之众引发骚乱，控制政府，以使国王重新掌权。杜勒斯听到该密谋的简要介绍时兴奋地说：“这正是我们铲除摩萨台那个疯子的方法！”

8月22日，中央情报局成功地在德黑兰激起暴乱并控制了政府。9月23日，艾森豪威尔秘密授予罗斯福以国家安全勋章。“埃杰克斯行动”的最大赢家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它们在一本万利的伊朗石油出口所占比重由零一跃升到40%，取代英国而成为主宰伊朗经济的势力。

此后数十年，“埃杰克斯行动”成为在全球范围从事隐蔽活动的范例。中央情报局称伊朗国王的政府是该地区最稳定的亲美政府。用美国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伊朗可以充作照看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利益的地区“宪兵”。

（二）人质危机与核选择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美国从拥有几颗原子弹到拥有近30000颗核弹头的庞大核武库。然而尽管五角大楼握有巨大军事力量（能在最遥远的海洋巡逻，也能将力量投入到最与世隔绝的地区），但在中东一群阿訇和农夫面前，这个武装巨人却完全无能为力。1980年卡特总统效仿杜鲁门以来每位总统的先例，求助于核讹诈，旨在控制伊朗日益恶化的局势。

1979年，农民的日益贫困化加之国王秘密警察的残暴行为最终引起公开造反。数百万名群情激情的伊朗人举行示威，推翻了政府，国王仓皇外逃。转眼间，美国被迫面对一个远比摩萨台政权更敌视“大撒旦”利益的什叶派政府。

1979年11月4日，3000名伊朗人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抓走人质，没收很多箱具体记载中央情报局数十年来如何操纵伊朗事务的文件，一次新危机爆发了。1980年1月23日，随着五角大楼的波斯湾战略的明朗化，卡特在其国情咨文里直言不讳地恐吓苏联，宣布苏联在波斯湾的任何行动“将遭到应有的回击，包括军事力量”。后来当记者称“卡特主义”为

王仲春、夏立平、朱光泽、郭新宁编著：《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核战争计划》，第313页。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以魁梧骁勇著称。

基督都中的魔王。

空洞的威胁时，卡特重申他“决心运用美国的一切力量实施它（指卡特主义）”。

卡特发表国情咨文两小时后，国防部长布朗含混不清地提到超级大国间发生核战争问题。后来在背景情况介绍会上，一位未留姓名但身居要职的国防部官员更为直率地提到核战争问题。他说，“我们正考虑在北海范围外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2月2日，五角大楼秘密报告“波斯湾的潜力”被公诸于众，该计划将核讹诈具体化，行将离开《纽约时报》而成为里根政府国务院高级官员的理查德·伯特弄到了这份报告。报纸标题页赫然刊登：“研究结果认为如果苏联在伊朗采取行动，也许需要动用美国原子武器”。文章宣称：“国防部关于波斯湾军事局势的一份报告已断定，美国军队无法阻止苏联推进到伊朗北部，因而美国应考虑在那里发生的任何冲突中使用战术核武器”。文章引用了报告中一句话：“若要在伊朗危机（意指苏联进入伊朗——译注）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或许必须威胁或确实使用战术核武器”。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澄清这一文章时说，可能会使用“从印度洋舰船发射的核巡航导弹”。这实际上强调了下述战略观点，即巡航导弹主要是用于干涉第三世界的武器，而其矛头并非主要指向苏联本土。

为使这些恐吓具有实际份量，卡特命令 B52 战略轰炸机 1 月到 6 月在阿拉伯海进行了 12 次引人注目的飞行，令人联想起柏林危机时杜鲁门派遣 B29 轰炸机去英国；或者 1969 年越南危机及 1973 年中东危机期间，尼克松提高军事戒备等级的作法。

当然，五角大楼预见的“最可怕的图景”（即苏联军队进入伊朗）并未成为现实。苏联在 2 月 26 日的《真理报》上嘲弄了这些被五角大楼用来维护其正在崩溃的中东政策的“最极端的措施”。苏联强调它无意侵略伊朗并抗议美国对该地区危机火上浇油。事后回想起来，倒是卡特政府在波斯湾局势中大惊小怪，以核恐吓来掩饰其在伊朗遭到的屈辱。

尽管如此，评论家们指出，伊朗危机最深刻教训的是高压政府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战争升级的最低一能台阶——秘密行动，屡次造成一些国家比原先更敌视美国。颠覆民选政府，诸如尼加拉瓜和伊朗，在这些国家人民心中造成逆反心理，造成这些政府比其前任更加敌视美国的干预。

七、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

(SIOP—6)

如果威慑失败，核战争爆发，美国必须占上风并能够迫使苏联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条件尽快结束敌对行动。

——卡斯珀·温伯格

里根执政后，坚持了 70 年代美国核战略发展的基本方向。1981 年 10 日，里根签署了《国家安全指示第 13 号》，批准继续执行卡特政府的《总统指令第 59 号》。1982 年 7 月，国防部长温伯格签发了《核武器使用政策第 82 号》。以上两个文件为政策指南，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制定“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该作战计划于 1983 年 10 月 1 日生效。这个作战计划进一步扩大了目标选择范围，突出了打一场“延宕未决”核战争的准备，制定内容更为详细的实战方案。

(一) 多层次的打击

美国 80 年代核力量运用政策强调打击苏联统治集团最为珍视的目标。这包括打击苏联政治军事领导目标，打击这些领导机构和地下掩蔽部，消灭这些人员（美方估计约 10 万人）；打击苏联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打击苏联军事目标，包括其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不但打击预定目标，还要打击在核交锋过程中发现的新的军事目标。与 50 年代的“敲诈”计划所要求的大规模轰炸机袭击不同，这时的“第一次打击能力”意味着发动一次多层次的、即攻又防的解除对方武器的打击，在打击中各种核武器同时协同动作。与公众的想法相反，第一次打击不是一种阵发性的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它要求老练地将各种复杂的武器系统配合起来，这些武器系统中的第一种都将起单独而极重要的作用。

——在核战争开始的几秒钟内，反卫星武器被发射去打击敌人的卫星早期警报系统，即“眼睛和耳朵”；电磁脉冲破用于搅乱它们的通讯网。这能防止敌人发现第一次打击和进行相协调的反击。

——紧接着，用“潘兴”式”导弹发动“砍脑袋”式的攻击。部署在西德的 108 枚“潘兴”导弹，能够在发射后 6 分钟内摧毁苏联的指挥中心和加固的导弹发射井。虽然它现在的射程是 1000 英里，但具有更强推进器的“潘兴”导弹改进型很快能飞行 2300 英里，这使得它众西德发射时足以打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摧毁苏联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 C1（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网。

——在苏联导弹能发射之前，发射数千枚 MX 导弹和“三叉戟”型”导弹（它们要花大约 30 分钟到达它们的目标）去摧毁苏联的导弹发射井。

——最后，任何可能逃脱这次猛攻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将被激光饱和精确制导的导弹打下来。

(二) “延宕未决”的核战争和巡航导弹

80 年代初列入 NSTL 中供选择的打击目标已达 5 万余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的打击目标仍分为四大类：苏核力量、常规力量、军政指挥中心、工业/经济。

“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号”对全面核大战作了两类四种假设，第一类为“戒备反应”，即在美苏双方都处于日常戒备状态条件下，美对苏或苏对美首先发动全面核打击；第二类为“全面动员”，即在危机不断升级，美苏进入全面动员后，美对苏或苏对美首先发动全面核打击。在“戒备反应”条件下，由于美保持日常戒备并始终能保证1/3以上的核弹头可生存，任何核突击，都必然遭到毁灭性的报复，因此，苏不会对美实施“晴天霹靂式”的全面核打击。如果由于危机升级而导致双方核部队进入全面动员状态，美可使几乎100%的战略导弹潜艇和战略轰炸机处于戒备状态，从而使更多的核弹头得以生存，从理性的逻辑推理，苏就更不可能对美实施全面核打击了。

由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苏都不敢贸然对美发动全面核打击，所以美实际需要对付的是逐步升级的有限核战争。美要争取在升级的每一步过程中都有能力、有办法胜过苏联，这样才能迫使其及早停战，并接受有利于美的停战条件。从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的角度看，制定逐步升级的有限核战方案，总是围绕着打击硬目标和分级冲突控制理论而展开的。

为了保证核力量使用政策的执行，美国从70年代就全面展开了对MX导弹、“三叉戟”型潜射导弹、B—1、B—2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研制，这些打击硬目标的核武器于80年代陆续进入现役。

分级冲突控制理论认为，一场“延宕未决”的核战争比一场全面的第一次打击的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号”明确规定，美国必须能够打一场持久的核战争。例如，在欧洲进行的一场战争中，数小时内核门槛就会被越过：核武器在主要城市爆发而使其化为灰烬。由于欧洲战区地幅有限，而且核兵器密度大，核战争将很快升级。然而，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想将核冲突直接升级到全面核大战。它可能逐步地水平扩展到新的地区。因此，即使欧洲爆发战区核战争后，核实战论者仍可通过威胁开辟新的战区，诸如中东、印度洋、东南亚等来加大赌注。

要迫使敌人在水平升级的某个阶段上投降或退让，核实战论者需要这么一种武器：

- 造价相对低廉而且数量充足；
- 射程远而且灵活得足以将世界联成一片；
- 多样、便携并且不易损，以便在任何升级水平上从世界任何地点由各种发射平台（飞机、军舰、卡车）发射；
- 高精度但未必高速度。

这就是巡航导弹。巡航导弹符合控制水平升级的所有要求，它不仅成为“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号”和分级冲突控制理论的支柱和新的一级阶梯，而且它也是一种最危险的武器。

事实上，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谋求重新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坚持“以实力求和平”，加速推行核武器现代化计划，认为“核战争可以打赢”。在此期间制走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7号”集中反映了这一战略思想，而这一作战计划所体现的美国核力量使用政策与美国的核威慑政策和核力量发展政策更趋一致。到了1986年，美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武器数量比1979年增加了20%；遭受“第一次打击后”残存的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增长75%，这明显地改善和提高了灵活反应能力和生存能力，有力地支撑着核力量使用政策，使核战计划更具可信度，更具威慑性。

八、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7 号

(SIOP—7)

里根执政期间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导条约生效，美苏开始撤除中程导弹。考虑到削减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将导致战略武器数量大幅度削减，以及一批新型核武器已经并将陆续进入核武库的实际，美战略空军司令部正加紧拟订新的作战计划。其根本目的是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合理调配打击目标，扩大打击目标选择范围，提高战略武器使用的灵活性，增强威慑效应。

1989 年底，布什政府批准了“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7 号”（SIOP—7）。以往新的作战计划都是伴随着新的威慑战略而出台的。如“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3 号（SIOP—63）是“限制损伤战略”的产物，并适应以后的“确保摧毁战略”的需要；“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5 号”（SIOP—5）是“施莱辛格主义”的产物；“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SIOP—6）是“抵销战略”的产物。而这次“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7 号”是悄悄出笼的，这与当时苏联大幅度的战略收缩，欧洲正在经历着格局性的变化不无关系。在这个时候，若大张旗鼓地解释将如何使用核武器显然不合时宜。当时刚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奇上将称，与“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 6 号”相比，新的作战计划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布什政府突出强调实战能力对于加强威慑的重要意义，认为核武器不仅仅用来遏制战争，还应该而且可以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作战，因而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在继承里根政府“打赢一场核战争”的实战威慑理论的基础上，新计划所体现的核力量使用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 1、仍以苏联洲际导弹系统为重点，并提出了逐步侧重对付苏联机动战略武器系统的新方案。首先摧毁对方可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系统是军事力量使用的原则之一。6 年前，当 SIOP—6 生效时，苏联除被称作“可转移目标”的指挥与通讯设施外几乎还没有什么机动武器系统。但其后不久苏联相继部署了 SS—24 和 SS—25 两种机动导弹。另据美空军情报部门透露，到 90 年代中期，苏联的目标约有一半将成为机动的，其中包括导弹力量的三分之二。尽管美国国内对确定打击机动导弹系统的可行性及后果持有异议，但技术上的进展提供了寻找并摧毁机动导弹系统的能力。美国空军称目前正在研制的无人操纵遥感装置和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卫星情报搜集系统将使美国能够确认过去因为模糊不清或到处移动而无法瞄准的目标，可以为作战计划中打击机动战略武器系统的新方案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 2、确定以苏联领导集团为战争初期的突击目标。苏联领导集团一直被列为美国核力量的打击对象。但难以确定地下掩体的位置和缺少摧毁坚固地下工事的武器系统，这一打击目标政策始终没有落实。此外，何时对这类目标实施攻击也从未明确过。但近几年来经过改进的间谍卫星以及源源不断移居西方的苏联公民提供的情报，使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目标确定人员能够发现苏联领导集团使用的许多地下指挥设施。1988 年，当时的国防部长卡卢齐批准公布了莫斯科附近地下几百码的超级加固地下掩体的详图。美国正研制的高强度金属弹头，旨在战争开端摧毁苏联制造战争的领导集团，美空军参谋长威尔奇直言不讳指出，B—2 飞机在 90 年代投入使用后，予定袭击的目

标将是“最坚固”和“最高价值的”即地下深层掩蔽部、莫斯科秘密地下铁路线以及城外主要军事指挥所的广大工事网。据美一军事官员透露，象正在拟定的新的作战计划那样预定在战争初期就对苏联领导人发动袭击并为此作出具体筹划和准备付出代价巨大的努力，是以前所未有过的。

3、重新确定和相应调配武器系统的打击任务。由于中导条约而被拆除的部署在西欧的“潘兴”式中程弹道导弹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的复盖目标，将由部署在美国本土的战略武器所替代；已于1988年底投入部署的具有较高命中精度和很强毁伤力的MX导弹，将逐步取代“民兵”导弹系列的任务；与此同时保留的“民兵”型导弹将遂行打击防护措施较差目标的任务；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低，更灵活的B—1型轰炸机将可能取代B—52型轰炸机，担任突破苏联防御体系的任务。可以推断，随着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美国核武器系统的打击目标将会作进一步调配。

4、主张建立一支精锐的战略机动力量。以往的作战计划只规定建立战略预备队，以实施“战争间威慑”和战争最后阶段使用。新的作战计划则强调建立一支由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组成的精锐力量，目的是为总统提供在一场危机中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以适应对苏联或另一个对手实施有限核打击的需要。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军备控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招它只蓄成是加强国家安全和增进国家根本利益——美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而生存——的若干工具之一。

——罗纳德·里根

第十章 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实质及制约因素

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巩固国防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由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性，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又是其军备控制政策的核心和主体。它与美国的核战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随着美国核军控政策的演变和美俄核裁军进程的发展，美国核军控政策对其核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日益成为其核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美国核军控政策的概念、作用与机构

（一）美国核军备控制的基本概念

何谓军备控制？美国国防部 1984 年版《军语辞典》的解释是：“军备控制的概念是指：1、依据明确的或不明确的国际协定所要控制的下列任何一个方面：武器系统的数量、类型和性能特点（包括指挥、控制、后勤支援事宜和一切有关情报收集的机关），以及缔约国各方武装力量可以保留的兵力、编制、装备、部署或使用的数量（军备控制的概念包含‘裁军’）；2、在有些情况下，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军事形势的不稳定。”

美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军备控制是国际上对于武器的发展、试验、部署和使用的限制。但同时承认各国军事设施的继续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军备控制有两个主要作用：减轻军事形势所孕育的某些危险件，以减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当冲突真的发生时，增加执行克制政策的可能性。军备控制含有敌对国家在军事政策方面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的意义。它还指一个国家为了增进世界安全而作出单方面减少作战能力的决定。”

美国政府认为：“军备控制可以减少战争危险；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排除或减少特殊事件或偶发事故产生的误会；阻止任何一方投入过多力量进行既浪费又危险无益的技术开发；有助于把武器装备现代化纳入稳定而不是动荡的轨道，减少对发展武器的动机所产生的误会，从而减少对对方意图作出最坏估计而发展过于昂贵的武器系统的必要性，降低武器库的破坏力和建造费用。”

以上可以看出，美国的核军备控制概念应该包含核裁军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在数量、类型、发展、部署和作用等方面限制或控制，裁减或消除核军备的国际商定的措施或单方面的措施。

（二）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地位与作用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把核武器作为它们争夺优势、压倒对手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们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建立了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的庞大核武库，并且从来没有放松进行核战争的准备。这种情况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迫使世界人民时刻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中。

在核军备竞赛的同时，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时期也一直在进行核军控谈判。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美苏（俄）核军控谈判已经历了酝酿试探、部分核军控，限制核武器数量、减少核武器数量等 4 个发展阶段。

冷战时期的美国核军控政策，是它与前苏联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之一。它与核军备竞赛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二者相辅相成，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作用，共同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服务。里根说过：“军备控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把它只看成是加强国家安全和增进国家根本利益——美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而生存——的若干工具之一。”

核军控政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上升的过程。在二

美国国防部《军语辞典》，第 36 页。

美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4 卷，第 479 页。

美国总统力量委员会研究报告（1983 年 4 月）。

里根 1987 年 1 月致美国国会的报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次大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曾一直有认为，“军备控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是一个非本质而且肯定是次要的方面”。但 8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核军备控制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前苏联的核武库已经发展到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的程度，这种“核超杀”能力使它们的核军备竞赛走到了双方愿望的反面：原是为了自身安全而大肆扩充核军备，结果核武器的大量积累反而使它们更加不安全；最初是为了准备打核战争而发展核军备，结果核力量的巨大毁灭能力使美苏都不敢轻易发动核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重视核军控谈判，将军备控制政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布什政府就曾将保持威慑和军备控制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根主要支柱。

（三）制订和实施美国核军控政策的主要机构之一——军备控制与裁军署

1960 年，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正式成立。它是直属于总统办公厅的独立办事机构。该署署长、副署长和助理署长都由总统任命并经过参议院批准。他们的职责是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提供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事务的咨询，制订军备控制政策报请总统批准，指导、保障和参加军备控制谈判，并与负责国家安全政策的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该署在军控领域职能齐全，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办公机构设于华盛顿国务院办公大楼第四层，现有 222 名全时雇员，另有 57 个职位由来自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特派人员担任。该署设有 4 个局和 5 个办公室。这 4 个局是战略计划局、多边事务局、核查与情报局以及核事务和武器控制局，它们分别由 4 个助理署长领导。

该机构的特点是：

机构工作层次高。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主要负责官员直接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可以直接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等提供政策咨询。这种高层次的工作机构对国家安全政策可以直接产生影响。

工作班子由跨部门的人员组成，协调性强。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有 1/5 的职位是由国务院和国防部人员兼任，他们对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和本单位的任务及有关政策不仅了解，而且有权干预，因此工作班子在业务上协调起来较方便。

工作人员专业化，知识结构互补。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机构职能分明，专业性强。各局、处的人员基本由外交专家、职业军官、自然科学家、律师等组成。他们分别具有丰富的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科技发展和法律事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使军控政策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重视研究和分析工作，加强理论指导。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拥有研究用的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和情报部门，有专用于研究的经费。各个方向局、处有指导国内军控政策研究的责任，与国外的军控研究机构保持交流的关系，对于专题研究项目拨发一定的预算开支，并举行一些国内或国际的学术讨论会。

重视宣传和舆论工作。军备控制与裁军署负有宣传军控政策的法定责任。它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增加公众的军备控制意识，向新闻机构、学者和公众介绍军控情况，并负责出版各类宣传资料。

二、美国核军控的目的与基本手法

（一）美国核军控政策的主要目的

美国核军控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国的核威慑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具体来说，它又具有下述多重目的：

1、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互为对手、争夺霸权的斗争是可能导致两国爆发核战争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双方政治关系紧张、军事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两国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此，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在这方面主要着眼于：第一，通过核军控谈判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降低双方的军事对抗，缓和紧张关系，减少两国在军事上迎头相撞的危险。第二，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稳定的战略关系。这种稳定的战略关系要求双方的核力量大致均衡，没有哪一方能够获得明显的核优势，双方中无论哪一方“即使在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首先进行打击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美国认为，核军控谈判能提高一方估量和预测对方现在和未来军事力量的能力，从而增加双方关系的稳定性，减少一方作出加速扩张军备、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等过度反应的可能性。第三，减少美苏之间发生非蓄意性核战争的可能性。核武器具有速度快、射程远、破坏力巨大等特性，因此，判断失误或技术事故，都可能导致美苏之间爆发非蓄意性核战争，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危机期间，双方处于高度敏感或紧张状态，因误解而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更大。通过军控谈判，可以增加美苏两国军事活动、核军备发展和战略意图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有助于预防非蓄意性核战争。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企图通过核军控谈判来大大削弱和裁减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库，另一方面将防止由于政治动乱所引起的意外的或未经授权而发射导弹的危险提高到重要地位。

2、限制和削弱对方，保护和加强自己。美国力图通过核军控谈判来限制对方核技术的发展，削弱对方的强项，同时保护自己的优势。例如，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总想打掉苏联陆基导弹的优势，而保持自己在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战略防御系统方面的优势。

3、制定核军备竞赛的规则，减轻经济负担。这包括两种方式：第一，控制某些种类核武器数量的增长。如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第二，削减或消除某些种类的核武器。属于这一类的核军控协议有中导条约等。在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上述两种方式都采用。4、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保持美国的核优势地位。60年代初以来，美国日益担心，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武器会使两个核超级大国失去权垄断和核优势地位，还可能增加世界上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和前苏联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等。冷战结束后，随着前苏联核威胁的减少，美国对核扩散的形势更为关注。

5、改善自身形象，捞取宣传上的好处。美国与前苏联拥有的庞大核武库是悬挂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因而一直遭到世界人民和舆论的谴责。为了应付舆论压力，美国还把核军控谈判作为改善自身形象、贬低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多重目的中，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4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末，美国核军控政策的目的侧重于改善自身

形象，捞取宣传上的好处；60年代，侧重于限制除两个核超级大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发展核武器和减少美苏之间发生非蓄意性核战争的危险；70年代至80年代，侧重于制订该军备竞赛的规则和在美苏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可预测的战略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又将防止核武器及其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扩散作为其核军控政策的重点。

（二）美国在核军控谈判中的基本手法

美国进行核军控谈判历来是为了达到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的政治目的，它也。一贯认为军控谈判是玩弄政治技巧的高级艺术。因此，美国对军控谈判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在军控谈判中经常采用的具体策略常有以下几种：

1、用实力地位促进谈判。美国历来认为，没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并适当地加以运用，就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协定。因此，美国一贯将保持强大的实力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它往往是一方面进行军控谈判，另一方面同时部署“为保证美国战略安全听必需的武器系统”，并调动美国舆论和盟国的各种力量来支持美国的谈判立场，还不断地向对手施加压力和进行心理上的威慑。美国人认为，正是因为里根总统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苏联人才同意在1985年重开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美国往往从这种观点出发评估形势：只有当他们创造的条件使对方感到如果不妥协情况就会更糟时，它的对手才会签订美国想要的协议。例如，1994年3月，当朝鲜不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某个核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后，克林顿总统随即宣布将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系统，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朝鲜实行制裁，以向朝鲜施加压力。

2、坚持“诱”和“压”两手并用的原则。美国利用其经济和贸易上的优势地位，在军控谈判中往往用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进行引诱，促使对方做出让步，并将这种做法与施加压力的做法同时使用或轮换使用。例如，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以签署贸易协定和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为诱饵，换取苏联作出许多让步，包括放弃削减战略核武器必须与太空武器挂钩的立场和同意海基巡航导弹不受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约束等。美国人曾说，如果苏联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方面拖延，“我们就将贸易谈判放慢到爬行的速度”。

不过，“诱”和“压”两手并用是件微妙的事。美国认为，在军控谈判桌上，最有可能奏效的方法不是“哗众取宠”的花架子，而是“隐蔽的压力”。因此，美国的手法往往是让对手看到，总统在国会遇到“某种压力”，它的对手必须考虑到这种压力，作出让步。

3、提出对方既不能接受又不能拒绝的建议。美国认为，在军控谈判中的一个有效做法，是提出对方既不愿接受又不能拒绝的建议。如果对方拒绝它，就会在政治上受到损失；但如果接受它，又违背自己的意愿，从而使美国不仅得到政治上和宣传上的好处，又迫使对手处于被动的地位。例如，1981年11月，美国提出消除欧洲中程导弹的“零点方案”，要求苏联拆除其部署在欧洲的SS—20中程导弹，交换条件是美国不在西欧部署“潘兴”型导弹和巡航导弹。美国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因为特别希望实行这个办法，而是指望苏联拒绝这个建议，并由此在政治上遭到损害。后来果然苏联拒绝了这个方案，从而使美国“一箭三雕”：一是苏联落入圈套，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失分；二是美国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在宣传上得分；三是美国如愿地在西欧部署了自己的中程核武器。

4、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寻求取得突破的机会。美国通过多年的军控谈判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必须发扬“马拉松竞赛”的顽强精神。曾长期参加美苏军控谈判的美国裁军谈判前代表马克斯·坎帕尔曼就说过：“我们不能带着最后期限来谈判。如果我们显得急于求成，苏联人将很乐意让我们匆匆签定一个不利于我们的协定”。他还认为，美国的谈判小组必须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作战，才能促使对手从原先的立场后退。

在与前苏联进行军控谈判时，美国就提出，苏联参加谈判的人都是政治战壕里的职业者手，美国人必须反复研究自己的立场，设计出几十种可能的辩论路线作为舌战中固守的据点，才能应付苏联人的挑战。美国还认为，在谈判中，保持一个强硬的合乎逻辑的立场至关重要。例如，美苏1985年恢复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后，苏联企图迫使美国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因此每次会谈心攻击该计划，“轮番轰炸”：在美国内部，也有人动摇，认为应在该计划上对苏联让步，以便早日达成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美国谈判代表的立场是，苏联必须首先放弃在战略核武器上的某些优势，美国才有可能与之讨论这个问题，经过5年多的唇枪舌剑，美方稳坐钓鱼船，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其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立场，终于迫使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一步步放弃了原先的立场。

5、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美国对于对手违反过去军备控制协定的行动决不放过。美国认为，一旦发现对手有违反过去军控协定的行动，美国心须将这一问题摆到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来解决，甚至可采取相应的步骤来抵销苏联违约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在削减战略武器第一阶段谈判过程中，美国发现苏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大型雷达站，就在谈判中揪住不放，迫使苏联后来单方面拆除了该雷达站。

6、运用谋略，出敌不意，争取主动。美国认为，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应该虚虚实实，使对方对美国的谈判方案难以预测，并应在适当时候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例如，在1955年7月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苏联提出的裁军方案，但突然提出“开放天空”的建议，使苏联感到措手不及，无法接受，不得不拒绝。美国因此在政治上宣传上得了一分。

三、制约和影响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各种因素

国际政治关系、美国与其他国家核力量的对比、核战略、核力量发展政策、技术发展、经济、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等因素都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产生影响和制约。

（一）国际政治关系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在美苏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通常影响美苏核军控谈判进程的状况和速度；反过来，核军控谈判的进展又常常促进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的缓和。可以说，在当时，美苏核军控谈判是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的“晴雨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核军控政策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由主要企图削减前苏联的核武库转到侧重防止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国际政治关系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在：

1、在美国与前苏联关系方面。在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当时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它们之间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首当时世界政治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各种矛盾的变化和发展，美苏关系在不同阶段也分别呈现出紧张和缓和等不同的特点。因为核军控谈判是美苏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之一，所以，当美国需要缓和美苏双方关系时，就常用推进核军控谈判的方法来减少两国的紧张关系，这时美苏核军控进程有可能取得进展；当美苏关系紧张时，美国也往往用推迟或中断核军控谈判的方法来向苏联施加压力，这时美苏核军控进程就停滞不前。例如，70年代初，美国有缓和美苏关系的需要，因此推动核军控谈判，与苏联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等一系列核军控协议，从而减少了美苏关系中的紧张气氛。但7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趋于紧张。因此，美国中断了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美国国会搁置了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这些行动又使美苏关系更加紧张。

2、在盟国关系方面，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1983年底，美苏中导谈判破裂，西欧各国为使该谈判早日恢复，纷纷提出各种倡议，并为美苏首脑会晤牵线搭桥，从而推动了美苏向达成中导条约的方向前进。又如，为使美苏中导谈判达成的协议不会损害西欧的利益，西欧国家进行了大量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方面。70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这种大三角关系对美苏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一定的影响。美国著名军控问题专家约翰·纽豪斯说，“（1971年）7月中旬，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尼克松将在翌年初访问中国的消息。……从此，进入了三角外交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在（美国向中国）开放的帮助下，最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该条约几乎禁止了反导弹导弹才有可能于3个月之后在莫斯科达成。”

4、在第三世界国家方面。美苏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很小。冷战结束后，这种影响和制约正在增加。例如，防止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已成为美国核军控政策考虑的重点之一。

（二）美国与其他国家核力量对比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在冷战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美苏核力量对比方面。美苏冷战结束后，俄

罗斯继承了原苏联 80% 的战略核力量。美苏（俄）核力量对比是美国核军控政策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美国有关对苏（俄）的核军控政策都是双方核力量对比的反映。这在美苏冷战时期主要表现在：

1、美苏双方核力量的大致均衡，是它们核军控谈判取得任何成果的前提。例如，50 年代末之前，美国的核力量与苏联的相比，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苏联的核武器还不能威胁美国的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缺乏对等谈判的物质基础。美国根本不想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达成核军控协议，苏联也不愿在核力量对比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用核军控协议来束缚自己发展核武器的手脚。因此，在此期间，美苏没有达成任何核军控协议。到 60 年代初，苏联开始大量部署洲际导弹，从而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问题上互相威慑、互为人质的关系开始形成，所以美苏产生了寻求某些共同安全利益的需要，双方开始陆续签订了一些核军控协议。

2、美苏核军控谈判的进程随着双方核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美苏之间的力量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当它们力量对比的天平出现倾斜时，力量上升的一方试图利用核军控谈判来维持自己的有利地位，而力量下降的一方则利用核军控谈判来限制对方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后者作出较大的让步，才能达成妥协。例如，70 年代初，在美苏核力量取得大致均势的情况下，苏联核武器发展速度快于美国，是力量上升较快的一方。因此，在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美国作出较大的让步。又如，80 年代中期后，美国因前一段大力扩充军备而成为力量上升较快的一方。所以，在中导条约中，苏联作出较大的让步。

（三）美国核战略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美国核战略是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核军控政策的理论依据。

50 年代，美国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慑止和打赢各种战争的希望都寄托于核武器。因此，美国根本不愿意与苏联达成任何核军控协议。

60 年代下半期至 70 年代，美国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思想，苏联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战略思想。根据这一战略思想，美国提出，核军控的重点应该是减少那些促使任何一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因素，确保双方进行核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当时它认为，一方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威胁到另一方的报复性的威慑力量”。因此，美国主张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同意将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向上平衡”。

1983 年，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并主张用“相互确保生存”理论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自那时以来，美国核军备控制的理论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主张在核武器数量上“向下平衡”，同时不允许苏联达到限制美国发展战略防御系统的企图。

（四）美国核力量发展政策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美国的核力量发展政策是它核军控政策的重要前提。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必须以不阻碍其核军备发展为条件，并尽力适应它发展核力量的需要。

例如，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美苏都将发展分导多弹头导弹作为它们下一步核力量发展的重点，因此，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未能就限制这种武器的发展问题达成协议。“在公开场合，每一方都为未能达成协议而指责对方。但实际上，美苏双方都没有因在会谈中未能限制分导多弹头运载

工具而表现出特别沮丧”。

又如，在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起初一直坚持禁止机动洲际弹道导弹。1989年4月，布什政府决定把已部署在导弹井内的50枚MX型洲际弹道导弹重新部署到铁路机动轨道车上，并继续拨款研制可在公路上机动的“侏儒”小型洲际导弹。在这之后，美国才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作出让步，同意放弃禁止机动弹道导弹的立场。

（五）技术发展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这里所指的技术包括军事技术和核查技术。一般来说，军事技术的发展是活跃的，它往往影响核军备控制的稳定性，而核查技术的发展则对核军备控制进程起推动作用。

1、军事技术的发展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国和前苏联只有在某一领域的军事技术形成相对均势后，美国才愿意与其在这一领域的军控问题上达成妥协。例如，70年代初，美苏都已掌握了地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技术，而这一技术在当时尚不过关，在军事上又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此双方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又如，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美苏都掌握了分导多弹头技术，因此双方才在为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规定向上平衡的限额问题上达成协议。

第二，当美国在某一武器技术上领先而它又在战略上需要该武器时，它是不会同意限制该武器的。例如，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战略防御系统”的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它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军控谈判中坚决反对对该武器系统的发展实行限制。

第三，当美国在某一武器技术上落后时，它会在以下两种方法中择其一：如美国准备或正在发展该武器技术，它会在军控谈判中不同意限制该技术的发展；如果美不打算发展该武器技术，它会在军控谈判中要求对该技术进行限制。

第四，美国在军控谈判中一般只同意限制过时的或当时还无法达到的技术，而不限制它正在大力发展的新军事技术。

第五，一项能代替原有军事技术作用的新军事技术的出现，将促使美国与苏联就限制原有的军事技术达成协议。例如，60年代初，美苏都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并且都在大气层核试验中取得了足够的经验，因此双方达成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部分核禁试条约》。

2、核查技术的发展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

第一，核查技术的发展可以为美苏核军控协议提供必要的条件。例如，60年代末美苏都已掌握了卫星侦察技术，可以监视彼此战略核武器的部署和发展情况，这为美苏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提供了必要的检查、监督手段。

第二，核查技术的发展往往赶不上军事技术的发展，因此，美苏的许多核军控项目往往因核查问题解决不了而难以达成协议。

（六）经济因素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长期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核军备控制则有可能为美苏核军备竞赛制定某些规则，适当放慢军备竞赛的速度或削减某些过时的、多余的核武器，从而节省部分费用。因此，美国在制定核军控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到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有愈益增大的趋势。从40年代下半期至6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经济境况良好，因此，它在这一时期的核军控政策

受经济因素影响很小。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国由于在侵略印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经济发生困难。与此同时，苏联也感到需要适当减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负担。因此，美苏在这一时期签订了若干可以使它们节约费用的核军控协定。1973年6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声称，如果没有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仅在1973财政年度内，他就不得要求国会多拨给国防开支150亿美元。

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维持和发展其庞大核武库所需的费用越来越大。如发展MX型洲际弹道导弹需耗资300至400亿美元，建造1艘“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潜艇需耗资13.5亿美元。因此，美国对核军控和核裁军的愿望更为强烈，先后与前苏联（俄罗斯）陆续签订了《中导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七）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美国核军控政策不仅受到国际政治中斗争和妥协的影响，而且受到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甚至美国领导人本人的能力、品质、风格等因素也可能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1、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和政治组织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在美国，总统虽然对核军控政策有最后决策权，但在制定政策时他要受到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其中对核军控政策形成影响较大的机构有：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各军种、中央情报局，各种利益集团等。

国会因掌握有对军费预算的审议权和对军备控制条约的批准权，所以对政府的核军控政策有相当大的作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等机构实际参与政府核军控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它们的意见对总统决策有直接影响。

各军种主要是经由三条渠道对政府核军控政策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二是通过国会议员、三是通过向政府提供其他国家发展军备方面的情报或研究报告。

中央情报局主要是经由两条渠道对政府制订核军控政策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通过向政府提供有关世界各国的情报或研究报告。

各种利益集团则主要是通过游说国会议员，间接地对政府的核军控政策施加影响。

例如，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曾以批准一项地下核试验计划，来换取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部分核禁试条约》的支持。70年代初，尼克松为得到共和党右翼、国防部和各军种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支持，同意发展“三叉戟”潜射导弹、B—1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70年代末，卡特总统批准建造MX弹道导弹，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支持。美国著名军控问题专家约翰·纽豪斯曾指出，总统处理军控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才能在其政府内部，特别是在国防机构内部，以及国会内部成功地兜售其政策。由于国会越来越处于派系纷争的无政府状态，总统兜售其政策也愈加困难。从杜鲁门以来的历届总统在有关超级大国问题上的许多（也可能是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迫

于政府内部施加的压力而作出的”。

此外，总统属于共和党还是属于民主党对核军控政策也有影响。在冷战时期，一般来说，属于共和党的总统签署的军备控制协议比较容易在国会获得通过。因为“在国会中，始终存在一个右翼参议员阵营，他们反对不管是属于共和党或是属于民主党总统所签署的任何军备控制协议。但是，如果总统是民主党，敌对阵营就会更大些”。

而且，美国总统的任期时间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据统计，在冷战期间，没有一项核军控协议是在一位新当选总统的第一年任期内签署的，而以在总统任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签署的协议为多。因为新当选总统上任后第一年内一般都要回顾和调整政策，第三年或第四年签署军控协议则有利于总统本人或总统所在的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

2、美国领导人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美国领导人有时可能在双方谈判达成核军控协议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个人作用。例如，尼克松、基辛格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就通过发挥个人作用加快了谈判的进展。

第二，美国领导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软弱，可能有碍于核军控谈判进程。例如，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在国内遭到猛烈的政治抨击。这削弱了他在谈判中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并使他无法得到与苏联达成核军控协议所需的足够的国内支持，从而大大推迟了美苏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时间。

（八）舆论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给人类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这一严峻的现实引起世界人民和舆论广泛的谴责和反对，从而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影响。

60年代初，美苏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和世界舆论对美苏大量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的谴责。

80年代初，西欧许多国家的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美国提出在欧洲消除所有中程导弹的“零点方案”，并推动美苏最终达成《中导条约》。

与西欧的反核运动相呼应，80年代初美国人民也进行了规模相当大的要求冻结核武器的运动。这一运动迫使里根政府开始认真考虑通过谈判削减美苏核武器的问题。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章 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发展轨迹

美国核军控政策的演变，大致经过了 4 个阶段：

一、核垄断与核优势阶段

(1945—1958年)

从1945年至1949年，美国独家垄断着核武器。虽然苏联1949年后也拥有核武器，但与美国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美国正是凭借这种核垄断或核优势，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核讹诈。在这一时期，美国核军控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利用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操纵联合国有关机构，通过核军控谈判来限制苏联发展核武器，以保持其核垄断地位。当苏联拥有原子武器后，又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完善核技术，以保持其核优势地位。

美国在该时期为执行上述政策，与苏联在核军控谈判中进行了两个重大回合的斗争。

第一个回合：美国极力保持其核垄断地位和苏联试图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斗争（1945—1949年）。

美苏在此期间主要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核军控谈判。为了垄断核武器，美国代表巴鲁克1946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即“巴鲁克计划”），要求先对各国原子能的发展和利用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然后再处置现存核武器。这有利于美国保持核垄断地位和进行核讹诈，而并不能确保销毁现存核武器。该计划还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法律根据。

苏联拒绝了该计划。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于同月18日提出一项反建议（即“葛罗米柯计划”）。此后，美苏两国围绕巴鲁克计划和葛罗米柯计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又陆续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提案。它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关于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问题。苏联主张先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然后再对和平利用原子能活动进行国际管制。而美国则要求先对所有国家的原子能研究、开发和生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然后再销毁美国的原子武器。

——核查问题。美国要求对各国核能研究的情况进行有损主权的核查，苏联则反对美国以国际监督为借口侵犯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原子能管制问题上是否拥有否决权的问题。美国主张，任何违反协议的一方“都应该受到迅速而确实的惩罚，在发生违反协议的情况时，安理会的任何常任理事国都不得对安理会采取的惩罚措施行使否决权”。苏联则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主张，坚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拥有否决权。

美苏在以上问题上尖锐对立，会谈毫无进展。1949年初，苏联退出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同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第二个回合 美国试图保持核优势和苏联争取核均势的斗争（1950—1958年）。

此时期，是美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大发展的时期。美苏先后于1952和1953年试验成功氢弹。1957年8月，苏联先于美国试验成功洲际导弹，引起美国朝野震动。美苏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在此时期，美苏的核军控谈判主要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内进行，双方围

绕下述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全面彻底裁军问题。

从 50 年代初起，美苏双方在全面彻底裁军（即禁止核武器和裁减常规军备的一揽子方案）问题上争吵不休。1955 年 5 月 10 日，苏联提出了一项新的裁军方案。其要点是：（1）建议分两个阶段将美苏中军队人数裁减到各 100 至 150 万，英法裁减到各 65 万；（2）关于核武器问题，建议第一阶段禁止试验和使用，第二阶段销毁核武器；（3）同意裁军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苏联的这个方案实际上采纳了西方的许多建议，特别是西方早已提出的分阶段裁军和国际监督等方案。

但在同年 7 月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拒绝了苏联的上述方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食言，避而不谈西方过去的建议，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该建议要求美苏交换标明各自军事基地位置的图表资料，一方的非武装飞机可以飞越另一方军事基地上空并进行拍照，以此减少和防止突然袭击，缓和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内部认为，该建议对美国来说具有“无论怎样总不吃亏的稳操胜券的优点”，如果苏联接受该建议，西方就会得到它所需要的情报；如果苏联拒绝，西方仍在宣传上占上风。而且，美国提出这一建议的前提就是建立在苏联“肯定会拒绝”的基础上的。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该建议只不过是针对苏联的一个赤裸裸的间谍阴谋。苏联的核技术正处于发展阶段，如果通过“开放天空”，让美国了解到苏联的底细，就会使苏联的活动余地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苏联拒绝了美国的建议。

其后，苏联又于 1956 年 3 月 27 日、1957 年 4 月 30 日和 6 月 14 日三次提出了裁军建议。每一次建议都是以西方原先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甚至有些建议的实质内容与美国曾经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但每一次都遭到美国的拒绝。

（二）禁止核试验问题。

从 1954 至 1956 年，苏联先后 4 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1956 年夏，美国表示愿意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但要求对禁止核试验进行国际监督。苏联表示不同意，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核试验”。双方当时都主要从宣传的角度提出核禁试的建议，并不真想停止核试验。

这一阶段的美国核军控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1、美国主要企图通过核军控谈判来维持自己的核优势与限制苏联核武器的发展。

2、在这一阶段，美国与苏联没有就核军控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美苏之间的核力量对比悬殊。美国居压倒的优势地位，尚未切实感到苏联核武器对自己的威胁。苏联则急于改变其核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利状况。因此，“双方好象都在心照不宣地避免限制武器竞赛”，不愿意用军备控制协议来束缚自己发展核武器的手脚。第二，美苏的核军控政策都处于形成阶段的初期。双方都缺乏经验，都在谨慎地了解对方的意图和改进完善自己的军控政策。它们都不愿意在自己所不熟悉的核军控问题上贸然签订协议。不过，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对一些问题的谈判逐渐深入，从空泛的议论发展到比较深入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从而为美苏在下一阶段达成若干核军控协议打下了基础。

3、美国的核军控建议具有很浓的宣传色彩。当时，世界人民要求禁止核

武器、反对世界战争的呼声很高，曾在 40 年代末期和 50 年代初期掀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此舆论压力下，美国企图通过提出各种新的核军控建议来达到改善自身形象、贬低对手的宣传效果。

二、部分核军控阶段

(1959—1968年)

从50年代后期起，苏联的核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美苏都开始大量装备和部署洲际导弹，从而都具备了对另一方国土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问题上互相威慑、互为人质的关系逐步形成。这使原来就存在许多内在矛盾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因此，美国开始收敛不可一世的核讹诈态度，放弃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从60年代初开始实行“灵活反应”战略。苏联则于50年代末开始实行火箭核战略，强调“在未来战争中火箭核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国际关系中出现三个新因素：第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60年代初，苏联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二，美苏关系有所缓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军事对抗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危险性。因此，它们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都试图作出一些努力来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美苏在防止中国等国成为核国家等问题上找到了某些共同利益。它们都担心核扩散会削弱它们的核垄断和核优势。美国试图阻止法国和中国拥有核武器。苏联则反对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并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持否定态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此时期的核军控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制定若干核军备竞赛的规则，以限制苏联谋求核优势；减少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阻止其他国家试验和拥有核武器，以保持美苏的核垄断地位。在此阶段，美苏核军控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双方就核军控中的若干局部问题签订了5项多边条约和一项双边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可分为3类：

(一) 尝试为美苏在某一领域的核军备竞赛制定某些规则和谋求宣传上的好处

属于这类的条约有：

1、《南极条约》。美苏等国1959年12月1日签署。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含有核军控内容的多边条约。该条约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在南极洲建立军事基地和举行军事演习；禁止在南极洲进行任何核爆炸和处理放射性废料”。美苏当时签署《南极条约》主要是为了达到宣传上的目的，该条约所禁止进行核爆炸和部署武器的地区正是双方都不愿意在那里进行核爆炸和部署武器的地区。不过，从长期看，该条约在保护南极洲环境和防止南极洲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2、《外空条约》。该条约全称为《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之活动所应遵守原则之条约》，美、苏、英三国于1967年1月27日签署。该条约中有关核军控内容的条文有：不在环绕地球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装置此种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部署此种武器，禁止在天体建立军事基地、设施和工事；禁止在天体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以及进行军事演习。

该条约对美苏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进行了某些限制。例如，条约禁止部署携带核弹头的武装地球卫星等。不过，该条约对美苏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美苏认为洲际弹道导弹只是部分进入环绕地球的轨

道，而不是该条约所禁止的在“环绕地球轨道上放置”携带核武器的物体。同时，该条约漏洞很多，又为超级大国以后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留下可钻的空子。

（二）减少美苏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

属于这一类的协定主要是《美苏关于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谅解备忘录》，简称《美苏热线协定》。这是美苏两国 1963 年 6 月 20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军控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两国政府之间建立直接通讯联系，以供紧急时期使用。该协定对美苏在以后的危机期间保持相互沟通，防止迎头相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该协定对美苏核军备竞赛本身并无直接影响。

（三）防止核扩散，维持美苏的核垄断地位

属于这一类的条约有：

1、《部分核禁试条约》。该条约全称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美、苏、英三国于 1963 年 7 月 25 日签署。美苏签订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无核国家和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大气层核试验研制和改进核武器。它们当时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中国、法国的。该条约没有禁止地下核试验，从而为美苏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完善它们的核武器留下了方便之门。

2、《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美、苏、英三国于 1968 年 7 月 1 日签署。其主要内容是：有核缔约国不得将核武器让与任何领受者，无核缔约国不得拥有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该条约对于核大国和无核国家是不平等的，它对无核国家作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但对危及世界和平的核大国的军备竞赛未作任何限制。该条约满足了美苏的共同愿望：巩固它们的核垄断，把美苏拥有核优势的状况固定化。条约也使美苏达到了各自的目的；美国通过改善对苏关系，可以倾注更大力量在亚洲推行军事扩张政策，苏联则在使联邦德国永远非核化以削弱其政治地位方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条约的消极作用正在减少，积极作用有所增加。它们对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防止核扩散体系起了重大作用，有利于减少世界上核污染和核战争的危险。

3、《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拉丁美洲各国 1967 年 2 月 14 日订立此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拉丁美洲各国不得以任何手段和形式试验、使用、生产、获得、接受、贮存、安装和部署核武器。美国 1968 年 4 月签署了该条约的第 2 号附加议定书，承诺“不对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各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采取这一行动主要为了换取防止核武器在拉丁美洲的扩散。

这一阶段的美国核军控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1、在核军控谈判中只涉及美苏核军控的外围问题，尚未触及其实质问题。在此阶段美苏达成的所有条约和协定都只关系到美苏核军控的一些枝节方面。双方根本没有讨论美苏核军控的核心问题——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问题。

2、侧重点是限制其他国家。在此阶段美苏达成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核军控协议是《部分核禁试条约》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而当时美苏签订这两个条约的目的都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武器。在这一阶段双方达成的所有军控协议都根本不限制它们自己核武器的发展，这使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愈演愈烈。

3、在形式上，以签订多边条约为主。本阶段美苏签订了5个多边核军控条约，占该阶段美苏所签军控协议总数的5/6。其原因与美苏在此阶段侧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有关。

三、限制核武器数量阶段

(1968—1984 年)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已形成大体上的均势。1970 年美国拥有战略核弹头 4000 个、运载工具 2260 件,苏联拥有战略核弹头 1800 个、运载工具 1745 件。其中,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的数量上已超过美国。此时,双方都具有遭受对方核袭击后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

此时,国际关系中出现三个新因素:

第一,美国在侵略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泥足深陷,投入的美军最多时达 53 万多人(1969 年),耗费了数以千亿美元。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甚至政治和社会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1969 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就在寻求使美国从侵略印度支那战争中“体面”脱身的途径。

第二,中苏两国根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结成的同盟破裂和双方在国家利益上发生严重冲突。1969 年苏联武装入侵中国珍宝岛和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此后,苏联大量向中苏边境增兵并部署大量针对中国的核导弹,甚至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联的这些所作所为使中苏关系处于严重对立状态。

第三,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以尼克松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政治家认识到,世界在向多极化发展,与中国改善关系,不仅有助于美国从越战中脱身和压苏联在外交上让步,而且有助于维持世界均势。因此,尼克松执政后,便开始设法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调整了其核军控政策,与苏联的核军控谈判在这一阶段有相当进展,侧重于限制战略武器数量问题。美苏在这一阶段达成的核军控协议可分为 4 类:

(一) 限制战略核武器数量

属于这一类的条约和协定有:

1、《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全称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英文缩写 ABM),于 1972 年 5 月 26 日在莫斯科签署。其要点一是只允许每一方部署两个有限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一个保护首都,一个保护洲际导弹地下发射井,每个系统可部署不超过 100 枚反导导弹;二是保证不发展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地机动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三是除了在其国家领土周边部署朝向国外的顶警雷达外,今后不得部署战略弹道导弹袭击预警雷达。

1974 年 7 月,尼克松总统第二次访苏期间,双方又签署了《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双方各放弃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区,美国保留在北达科他州的部署区,苏联保留在莫斯科的部署区,双方不再建新的。

该条约及其议定书对美苏在反导防御系统方面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某些竞赛规则,限制了它们地基反弹道导弹系统数量的发展。不过,该条约之所以能够签订,主要原因是当时美苏的反弹道导弹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耗资巨大,而作用极为有限。同时,这种反导导弹是依靠自身的核弹头来摧毁对方来袭的核弹头,其危险后果难以估量,已引起舆论的反对。而且,双方当时

都认为争夺核优势，保持威慑能力的主要手段是发展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但又担心对方会在反导防御系统方面悄悄领先，因此才签订该条约加以限制。

该条约也有很多漏洞，从而为美苏后来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例如，该条约并未禁止研究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成了美国后来开展“战略防御计划”研究和试验的借口。条约也未禁止发展反卫星武器系统，苏联借此空子领先发展了反卫星武器。

2、《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英文缩写 SALT I）。1972年5月26日签署。该协定虽然对美苏陆基洲际导弹发射器和潜射导弹发射器规定了一个5年时间的最高限额，但仍为美苏继续发展战略核武器留下了很大余地。该协定规定，美苏战略导弹发射器的限额分别为1710件和2358件，而当时美苏战略导弹发射器实际上分别只有1700件和2090件。其中，根据协定，在潜射导弹发射器方面，美国可由已有的656件增加到710件，苏联可由已有的740件增加到950件；在弹道导弹潜艇方面，美国可由已有的41艘增加到44艘，苏联可由已有的42艘增加到62艘。而且，该协定对美苏战略核武器质量的改进未作任何限制，特别是没有规定限制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其结果是，该协定签订后，美苏竞相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新式弹道导弹潜艇，掀起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3、《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 SALT II）。1979年6月18日签署。该条约虽然比 SALT I 规定得更详细具体，但仍只是为双方的战略核武器“向上平衡”规定了一些指标，而且对战略武器的质量基本上没有限制。这为美苏战略核武器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由于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美国国会以此为理由搁置了对该条约的表决，因此该条约一直未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不过，美苏政府当时都表示愿意遵守该条约。1986年5月，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宣布美国不再履行该条约规定的义务。

（二）减少美苏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

属于这一类的协议有：

1、《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议》。美苏1971年9月30日签署。

2、《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1973年6月22日签署。

（三）限制核试验

属于这类的条约有：

1、《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1974年7月3日签署。该条约规定，美苏自1976年3月31日起停止进行当量超过15万吨TNT的地下核武器试验。

2、《美苏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1976年5月28日签署。该条约规定，美苏将不进行爆炸力超过15万吨级以上的任何单个爆炸或总爆炸力在150万吨级以上的任何成组爆炸。

上述两个条约在限制美苏核军备竞赛方面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根据美苏当时已有的核技术水平，继续进行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已没有多大必要。这两个条约至今未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其主要理由是核查条款不健全。

4、为美苏在某一领域的核军备竞赛制定某些规则。

属于这一类的条约主要是《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简称《海床条约》。这是美苏 1971 年 2 月 11 日签署的一项多边条约。

这一阶段的美国核军控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1、由前一阶段的限制其他国家为主要目的转变为限制苏联为主要目的。在这一阶段，美苏签订的 8 个核军控条约和协定中，有 6 个是为了限制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此相关联，在形式上，也由上一阶段签订多边条约为主转变为签订双边条约为主。在此阶段，美苏签署了 7 个有关核军控的双边条约和协定，只签署了一个多边条约。

2、在战略核武器控制上的特点是向上平衡。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主要规定了美苏战略核武器增长的最高限额，而这些最高限额往往高于当时美苏所实际拥有的数量，再加上条约对当时侧重发展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等未加以限制，因此为美苏继续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战略核武器留下相当大的余地，以至造成美苏战略核武器越限制越多的状况。

3、美国将“相互确保摧毁”作为核军控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美国于 1964 年开始将“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应用于核战略，尼克松、福特、卡特等三届政府虽对该理论的某些方面有所调整，但基本上仍将该理论作为核战略的基础和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在此阶段，美国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确定其核军控政策的。在此时期美苏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共同特点是，削弱双方的战略防御力量，阻止双方的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过快增长，确保双方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有效性。而这些上符合“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因此，上述三个条约的签订，使美苏把它们之间的核均势和“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

四、减少核武器数量阶段

(1985 年至今)

1979 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苏核军控谈判一度处于停滞状态。8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一些促使美苏重新开始裁军进程的新因素：

第一，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美苏在综合国力竞赛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利。它们都有减轻军备竞赛负担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苏联的态势。里根政府 1981 年上台后，提出“重振国威”和“重整军备”的口号，大力发展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于 1983 年开始进行“战略防御计划”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美国经济自 1982 年走出“滞胀”的困境后，有一个长达 8 年多的战后时间最长的经济持续上升时期。而苏联从 70 年代下半期以来，逐渐背上许多对外扩张的包袱，特别是苏军在阿富汗遭到沉重打击，损失惨重。苏联经济的增长率进入 80 年代以来也落后于美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日益拉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裁军谈判中改变了以往的僵硬立场，为与美国达成妥协作出较多的让步，这为美苏裁军谈判取得进展创造了现实可能性。

第三，美苏战略思想发生变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3 月上台后提出“核战争无胜败论”、“合理足够论”、“绝对防御论”、“低水平的战略均势论”等新的战略思想。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承认：“核战争既打不赢，也决不应该打”。里根政府还主张以“相互确保生存”状态来取代 60 年代以来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状态。美苏战略思想的变化为美苏推进核军控谈判准备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四，美苏核军备竞赛的重点发生变化。80 年代，美苏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总数相当于 1945 年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 100 万倍，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美苏核武器具有的这种“超余”能力，使美苏都认为再在核武器数量上进行竞赛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它们都把核军备竞赛的重点转向提高核武器质量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美苏都企图通过裁军谈判削减多余的和老式的核武器，以便节省一部分经费转用于研制新型核武器和高技术武器。

特别是 1991 年底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冷战的结束，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已经彻底终结，世界正进入向新的国际战略格局过渡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也开始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在上述背景下，1985 年以来美苏(俄)核裁军谈判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 全部消除了美苏中程和中短程核导弹

1985 年 3 月，美苏重新开始 1983 年底中断的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同年 4 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冻结苏联部署 SS—20 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1986 年 1 月 15 日，又提出了一项在今后 15 年内分三个阶段消除全世界核武器的建议。其中主张在第一阶段的 5 至 8 年中完全销毁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弹道导弹，并同意实施现场检查。其后，苏联又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一是同意中程核武器问题与战略核武器问题脱钩；二是同意使中程核武器谈判与外空武器谈判脱钩；三是接受把部署在欧洲的中短程导弹与中程导弹一起消除的主张；四是同意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双零点”

方案。与此同时，美国也作出了一些让步。

1987年12月，美苏签署《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1988年6月1日，美苏互换《中导条约》的批准书，该条约正式生效。

《中导条约》的内容要点是：A、在条约生效后的3年内，双方将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000公里的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B、可以进行现场核查。

该条约在核军控条约中开了5个先例：第一，这是美苏达成的第一项在核武器数量上“向下平衡”的条约；第二，这是第一项消除整个一类核武器的条约；第三，美苏实现不对称裁减，美国要销毁346枚导弹和436个弹头，苏联要销毁703枚导弹和1585个弹头；第四，美苏在核裁军方面实现欧亚并重的措施；第五，美苏第一次同意进行现场核查。该条约的签订有利于缓和美苏的紧张关系和减少核战争的威胁，并有助于推动美苏核裁军进一步向前发展。不过，该条约规定要消除的核弹头数目不到美苏核弹头总数的4%。这对于美苏的庞大核武库并无重大影响，也没有削弱它们对其他国家的强大核优势和核威胁。因此，该条约的实际作用是很有局限的。

（二）在裁减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取得进展

战略核武器是美苏（俄）核军备的主力，因此它们长期以来在削减战略武器问题上都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直到90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美苏冷战结束后，美苏（俄）才同意大幅度裁减它们的战略核武器。

在80年代中期至1989年底，削减战略武器的问题在谈判中一直与大空武器问题紧密相连。这是因为太空武器是美苏双方正在发展的高技术项目。由于美国80年代中期在太空武器的研制上占了上风，苏联千方百计要通过军控谈判迟滞美国发展“战略防御计划”武器系统的速度，美国则毫不相让，反对在军控协定中把战略核武器与太空武器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太空武器问题成为谈判桌上美苏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1985年10月3日，苏联建议，美苏各自削减50%的“能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但要求同时完全禁止“发展、制造和部署打击性太空武器”。同年11月1日美国提出反建议，肯定了苏联削减核武器50%的建议，但不接受把“能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均列为削减对象，而提出双方陆基与潜地弹道导弹总数削减50%，并反对把禁止太空武器作为削减核武器的先决条件。美苏的这两个方案虽然在实际上相差很远，但毕竟双方都提出削减战略核武器50%的设想。

1986年6月10日，苏联又提出一个新的核裁军建议，主要内容是：（1）双方在15至20年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2）允许美国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限制在实验室研究的水平；（3）双方战略核武器限制在同等水平，运载工具总额限制在1600件，弹头限制在8000个之内，苏联在这一建议中对美国作了一些让步，使美苏在削减战略武器上的分歧大大缩小。

1986年10月，里根总统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首脑会晤期间，就下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10年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双方在继续从事该条约所允许的研究、发展和试验的同时，将严格履行该条约的各项条款；（2）在这个10年中的头5年（即1991年底前），双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将减少50%，在后5年（即1996年底前），双方将消除剩余的全部进攻性弹道导弹；（3）到10年期限结束时，除非双方达成

其它协议，否则任何一方如愿意都可部署太空防御系统。

这是美苏首次就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不过，由于双方在大空防御武器试验的范围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未能就上述问题签署协议。

此后，美苏继续就太空武器和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1989年1月布什政府上台后，基本继续了里根政府的核军控政策。同年9月后，美苏外长举行多轮会谈，两国在削减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接近。其中，苏联作出了较大让步，一是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同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相联系的方针；二是同意将限制海基巡航导弹问题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分开解决；三是单方面拆除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设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型雷达站。美国也作了一些让步，如不再反对部署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等。

1990年6月1日，美苏首脑在华盛顿发表《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双方在该联合声明中概述了两国已原则同意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条款，并表示决心在1990年底前完成该条约的草拟工作，以供随时签署。

1991年7月31日，美苏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 I）。根据该条约，美苏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将在7年内削减30%。该条约对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影响主要有：

将削减美苏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根据该条约，美苏部署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最高限额为各1600枚（架）。据此，美国和苏联将分别削减646枚（架）和900枚（架），削减幅度分别为29%和36%。该条约又规定，美苏部署的战略核弹头的最高限额为各6000个。据此，美国和苏联将分别削减4563个和4271个，削减幅度为43%和41%。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该条约将会使美国每年在战略核武器的采购和保养上节约大约30亿美元。不过，美苏将削减的都是过时的、多余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已经服役20年以上，即使没有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们也将在90年代退出现役，被新一代战略核武器所取代。而且，在美苏核武库“超饱和”的情况下，即使完成了这些削减，美苏已部署的核武器仍具有毁灭人类好几次的力量。

减少美苏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部署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最高限额为154枚（1540个核弹头）。据此，苏联的308枚SS—18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每枚装有10个分导多弹头）将削减一半。该条约还规定，每一方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将限制在相当于苏联现有水平的54%。

增加美苏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减少美苏用于第一次打击的核武器数量的同时，还规定双方可以各部署不超过1100个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弹头。这将提高美苏陆基洲际导弹的生存能力，减少其被第一次打击摧毁的可能性。而两国核力量生存能力的加强将有效增强双方对第一次核打击的遏制力。

使美苏战略核力量的结构趋于相似。长期以来，美苏“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结构有较大的不同，美国在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方面占有优势，而苏联在陆基弹道导弹方面占有优势。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这三种类型的核武器都规定了数量限额。这将促使美苏今后适当削减各自占优势的种类的核武器，而增加各自处于劣势的种类的核武器，从而提高双方战

略核力量之间的平衡程度。

将禁止美苏部署某些种类的新式核武器。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禁止美苏今后研制新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重型潜射弹道导弹、可移动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装载多弹头的远程空中发射巡航导弹等。

为美苏保持和发展战略核力量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这包括：

第一，在空基核巡航导弹方面。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有的可以装载多达 20 枚空中发射核巡航导弹，而条约只算作每架携带 10 个核弹头；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有的可以装载多达 16 枚空中发射核巡航导弹，而条约只算作每架携带 8 个核弹头。该条约还规定，不具有从空中发射远程核巡航导弹装备的重型轰炸机将只算作限定的 6000 个核弹头中的一个核弹头。而美苏目前装备的几种型号的重型轰炸机的载弹能力均在 4 至 24 枚之间，因此，它们的实际载弹量将会远远超出按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计算的载弹数。

第二，在海基核巡航导弹方面。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海基核巡航导弹将不受该条约的约束，每一方只须向对方提交一项宣布己方拥有该类型导弹的数量的声明，所宣布的数量不超过 880 枚。由于海基核巡航导弹未列入 6000 个核弹头的限额之中，因此，这将进一步增加双方的实际核武器数量。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即使按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完成裁减后，美苏实际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均将远远超出 6000 个的限额。据美国核军控专家计算，届时，美国可以“合法”部署战略核弹头 11636 个，其中弹道导弹弹头 4900 个（现有 7474 个），机载核武器弹头 5280 个（现有 4600 个）、海基巡航导弹核弹头 880 个（现有 350 个）；苏联可以“合法”部署战略核弹头 9658 个，其中弹道导弹弹头 4900 个（现有 10172 个）、机载核武器弹头 3500 个（现有 1040 个）、海基巡航导弹弹头 880 个（现在没有）。

第二，在战略轰炸机方面。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苏可以分别拥有具有从空中发射远程核巡航导弹装备的重型轰炸机 150 架和 180 架，而当时美苏只分别拥有该类型飞机 84 架和 97 架。因此该条约还将允许美苏分别增加此类型轰炸机 66 架和 83 架。

第四，在未部署的核武器方面。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只削减美苏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而对用作试验、定期换装、贮存以及备用等目的的未部署的核武器则未作任何限制。因此，美苏除在条约允许的范围内部署数量庞大的核武器外，还可以“合法”地大量增加未部署的核武器数量。

第五，在战略防御武器方面。在美国的坚持下，苏联放弃了将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研制和部署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挂钩的立场。因此，这为美苏发展战略防御武器留下了方便之门。

（三）在核禁试问题上进展不大

80 年代中期后，苏联已完成对新一代战略核武器更新换代（SS—24、SS—25、SS—N—23）所需的试验，对核试验的需要大幅度减少。而美国的“作俑”式机动洲际导弹和“战略防御计划”中的 X 射线激光武器等处于研制之中，需要进行核试验。在此背景下，苏联抓注“全面核禁试”这面旗帜，把禁止核武器试验作为阻止美国发展新一代战略武器和“战略防御计划”武器的突破口。1986 年以来，苏联一再呼吁美国与其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并一再延长苏联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日期，同时表示在核查问题上除可采用国家技术手段外，还可在必要时进行现场视察。而美国则不为所动，坚持进行

核试验。

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在核禁试问题上进展不大，只是在 1990 年 6 月美苏首脑华盛顿最高级会晤期间，签署了两项有关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核查措施的议定书。这两项议定书对分别于 1974 年和 1976 年签订的《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美苏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的核查措施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双方同意在核查过程中可以采用水压测量、现场视察和地震监测等手段。

这一阶段的美国核军控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1、在核武器数量问题上，由前一阶段的向上平衡转变为向下平衡，由单纯为核武器规定一个向上的最高限额转变为开始削减部分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已将核军备发展的重点由增加数量转向提高质量。

2、同意削减的核武器的范围比较广。不仅签署了消除全部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而且首次在削减美苏核力量的基石——战略核武器问题上达成条约。

3、促使苏联在核查问题上作出让步。从《中导条约》首次规定可以进行现场检查起，美苏在削减战略武器和核试验问题上也同意进行现场视察。这为今后美苏（俄）核军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二章 冷战结束后美国核军控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的彻底终结，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战略形势，开始大幅度调整核军控政策，将该政策的重点由冷战时期限制苏联发展核武器和保持美苏战略关系的稳定性，转到防止核武器及其投掷工具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同时谋求继续大幅度削减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库。

一、防止核武器及其投掷工具在发展中国家扩散

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把核军控政策由冷战时期重点对付苏联转到侧重防止核武器及其投掷工具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布什政府在 1991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声称：“当我们主要谈论欧洲和东西方军备控制的时候，我们应该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达成其他地区性和全球性军备控制的目标上。最迫切不过的问题是：阻止核、化学、生物武器及投掷这些武器的导弹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更明确地提出：“防止核扩散是冷战后世界军备控制的重点。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和尖端常规武器以及研制上述武器必需的技术的扩散。”美国为防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主要采取了下述措施。

（一）加强现有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的作用

现有的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主要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核出口国俱乐部”等三部分组成。

克林顿政府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实现防止核扩散这一目标的基础。因此，美国一方面要求所有尚未成为该条约签约国的国家尽快加入该条约，另一方面敦促该条约的签约国在 1995 年无条件、无限期地延长该条约。

克林顿政府谋求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以便使其有能力履行核安全保障制度。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强烈要求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实施完全的核检查，并多次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向朝鲜施加压力。美国政府还计划通过给予额外资助来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尤其是加强它探测秘密核活动的的能力。

克林顿政府还决定继续与“核出口国俱乐部”成员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出口委员会合作，以确保与核有关的出口受到严格的控制。

（二）谋求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克林顿政府计划，到 1994 年底或 1995 年初，所有核国家或即将获得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大多数无核国家，经过谈判签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如上述时间表行不通，美国将谋求使 5 个核国家维持暂停核试验状态，并在 1996 年完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克林顿政府还在国会的压力下，于 1993 年 7 月宣布将美国暂停核试验的期限延长到 1994 年 9 月，但是以其他同家不首先进行核试验为条件。

（三）在国际上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可裂变物质

克林顿政府准备首先推动制订一项多边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为核爆炸目的或是在国际保障措施之外生产高浓缩铀或分离出钚。与此同时，它还将采取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 1、在凡是可能的地方，杜绝过多储存高浓缩铀或钚的现象；在已经有这些材料的地方，必须确保这些材料具有最高水平的安全和可靠的保障，并向国际机构作出交代。

- 2、民用核催化剂不得使用浓缩铀。

- 3、鼓励作出更多限制性的地区安排，以便在不稳定和扩散危险性很大的地区限制裂变材料的生产。

- 4、把不再是美国威慑力量所需的可裂变物质置于美国自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保障协议的管辖之下。

（四）防止前苏联地区核武器的扩散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地区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的危险骤然上升。为了制止这种扩散的危险。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向俄罗斯和其他领土上有核武器的独联体国家提供资金，以裁减和销毁核武器。例如，美国国防部长佩里 1994 年 3 月下旬访问乌克兰期间，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1.75 亿美元援助，其中 5000 万美元用于销毁 SS—24 导弹的发射井装置，4000 万美元用于实施军工转产计划，500 万美元用于完善放射性材料的控制、计算和储存进程，还有 500 万美元用于组织出口监督。在此之前，美与俄、乌于 1994 年 1 月签署销毁乌境内核武器的协定。1993 年 10 月 24 日，美国还宣布将向哈萨克斯坦提供 8000 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拆除哈境内的核武器。

2、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采购从拆除的核弹头中提炼的高浓缩铀，并把这些铀转为和平用途，即作为美国核反应堆的燃料。

3、提供资金在莫斯科和基辅建立国际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使前苏联研制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科学工作者有选择短期民用研究和项目并得到资助的机会，以此防止前苏联核武器专家流散到其他国家。

4、向俄罗斯提供技术和资金，合作销毁前苏联的核弹头。

5、美俄 1994 年 3 月 15 日达成协议，同意相互允许检查对方从拆除的核弹头上取下的核燃料是否得到安全贮存。

（五）加强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为了防止弹道导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美国大力谋求强化已有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1993 年 1 月 7 日公布了经过修订的《导弹技术控制指导原则》。这个经过修订的指导原则文本，与它取代的 1987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文本相比，在两个问题上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将这项制度的管辖范围，由原来只禁止转让能携带核武器的导弹及其技术，扩大到禁止转让能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生、化武器）的导弹及其技术；二是将原来须达到有效负荷 500 公斤、射程 300 公里两条标准的导弹才禁止转让，修改为只要达到其中一条标准的导弹就禁止转让。

克林顿政府还打算将这一已有 22 国参加的多边性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推广成为全球性的防止导弹扩散的准则”。

（六）为建立战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而准备重新解释《反弹道导弹条约》

克林顿政府认为，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已拥有或正在研制弹道导弹，其中有些可能装上核、生、化弹头，这“可能对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军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加快了研制战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与此同时，为了使研制这种系统不受《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克林顿政府正与前苏联各国进行谈判，以重新解释该条约。根据美国的解释，该条约只限制战略反弹道导弹防御，而并未禁止新一代的战区反导弹防御。

二、裁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并已过剩的核武器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已没有必要保留象冷战时期那么庞大的核武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企图通过核军控和裁军条约，在裁减本国核武器的同时大大削弱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库。

（一）签订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美苏冷战和两极格局的正式结束。这种形势推动了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1992年1月28日和29日，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分别提出了核裁军新倡议，主张在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裁减美俄两国的战略核武库。根据布什的建议，双方将战略核弹头削减到4500至5000枚；叶利钦则建议双方削减到2000至2500枚。同年6月16日美俄两同总统在华盛顿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的谅解协议》，确定美俄在2003年以前，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各3492枚和3050枚。双方要求迅速将谅解协议拟成一项条约，以便早日签署。

在条约拟定过程中，美俄两国在下述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后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妥协。

1、美国要求俄罗斯销毁全部SS—18导弹的发射井，而俄罗斯以“节省开支”为由，提出利用这种发射井来存放单弹头的SS—25导弹。后美方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同意俄罗斯保留90个发射井，但条件是需进行改造。

2、美国要求俄罗斯消除全部携带6个弹头的SS—19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则以减少费用为由，提出允许将这种导弹改装成单弹头导弹。对此美方也作了让步，同意俄罗斯把105枚SS—19导弹改装成单弹头导弹。

3、美国希望自己能在将来B—52轰炸机退役后，把核武器装到B—1轰炸机上。俄罗斯则认为，如果美国这样做，则B—1轰炸机应计算在武器限额以内。根据妥协方案，美国可以那样做，但俄罗斯将有权派专家视察以确定哪些B—1和B—52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

在这些问题解决后，美俄两国总统于1993年1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全称《俄罗斯联邦与美利坚台众国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为START I）。

美俄能较快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1、美苏结束了它们之间的“冷战”状态。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完全没有必要保持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时所形成的、对双方都造成沉重经济负担的庞大的核武库。

2、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其前景很不明朗。美国迫切需要抓住时机与俄签约，以削弱俄的核力量，特别是要消除世界上最具有威力的和对美威胁最大的SS—18陆基重型多弹头洲际导弹。美同时还希望利用该条约，对独联体中部署有核武器的乌克兰、哈萨克斯但和白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敦促它们尽快批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实践成为无核国家的诺言，从而消除其对前苏联地区核武器扩散的担忧。

3、俄罗斯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对美国作出了重大让步。俄还希望通过签订该条约进一步改善美俄两国的关系，争取西方更多的经济援助。而且，俄罗斯的SS—18陆基重型多弹头弹道导弹在10至15年内将陆续失效，如果不是根据该条约进行销毁，也要单方面销毁。

4、超级大国核武器的数量已达到能使它们双方毁灭好几次的程度，这使它们都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从而大大减少了核武器的实战意义。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战略核武器总限额

该条约的实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条约生效后7年内，双方将部署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三者所载核弹头的总数削减到各3800枚至4250枚。其中，部署的潜射导弹弹头不超过2160枚，部署的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弹头不超过1200枚，在上一限额中，部署的重型洲际导弹弹头不超过650枚；第二阶段，即到2003年1月1日以前，双方将上述各类核弹头总数削减到各3000至3500枚。

2、战略弹道导弹限额

——双方消除包括重型洲际导弹在内的全部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弹头各自削减到1700至1750枚。

——销毁或改装已部署或未部署的所有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的发射装置（包括试验和训练用的）；其中，改装后的发射装置（包括试验和训练用的）只能发射单弹头导弹。

——消除包括试验和训练用在内的所有重型洲际导弹发射井。具体措施是：（1）将发射井上部挖掉8米或炸掉6米；（2）改装成只能发射直径小于2.5米的洲际导弹的非重型洲际导弹发射井，但改装数目不得超过90个。

——部署和未部署的所有陆基重型洲际导弹，或按本条约议定书的规定加以销毁，或用作运载器通过发射加以消除；重型洲际导弹不得转让；每方有权对另一方导弹的消除和发射井的改装进行核查。

——从2003年1月1日起，双方不得生产、拥有、试验和部署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

——双方不得生产、试验和部署超过本条约规定的载弹数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

3、重型轰炸机限额

——部署的机载核武器数目按实际载弹数计算，每方不超过750至1250枚；每种型号飞机每架的载弹数按本条约备忘录规定计算，每个型号抽一架飞机展示，向对方证实装弹数目。

——允许每方将100架未装备远程核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改为执行非核任务，不计入限额总数，且不必改变结构，但其基地要和核轰炸机分开，与核弹贮存库应相距100公里以上。这种非核轰炸机可以重新用于执行核任务，但此后不得再次转为执行非核任务。

——核与非核轰炸机要有可区分的特征，且要通过展示和核查加以证实。

（二）单方面裁减战术核武器

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它已无必要保留冷战时期那样数量庞大的战术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单方面裁减其战术核武器。1990年，布什政府撤销了美国更新其陆基战术核武器的计划。1991年9月27日，布什又宣布，美国将撤除其安置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陆基战术核武器并运回国加以销毁；撤除其水面舰只和攻击型潜艇上的所有战术核武器（包括所有的“战斧式”核巡航导弹以及航空母舰上的核炸弹），这些核弹头中部分将被拆除

和销毁，部分将保留在美国中部地区，如果将来发生危机，必要时还可使用。

（三）美俄两国的核武器将不再瞄准对方

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 1994 年 1 月 13 日在莫斯科达成协议，停止把各自的核导弹瞄准对方国家及盟国，其中一些导弹将对准无人居住的海洋，而大部分导弹将不再瞄准任何具体的目标。这一协议有助于进一步缓和美俄之间的核关系。不过，该协议仍主要是一种象征性意义的，因为通过电子计算机重新调整这些导弹的目标只需要几分钟。

美国还在 1994 年 3 月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规定从 1994 年 5 月 30 日起不再将乌克兰作为美国战略核导弹的目标。

三、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国际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对国际安全和军控形势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将较大幅度削减美俄的战略核武器，但它们仍保留了与冷战后形势很不相称的庞大的核武库。根据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美俄将削减它们各自战略核弹头的 2/3。同时，该条约废止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关于每架重型轰炸机不论携带多少枚核航弹和短程进攻性核导弹均按 1 枚弹头计算，以及携带远程核巡航导弹的弹头均按折半计算的不合理的“计数规则”，从而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重型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总数。而且，该条约规定全部消除陆基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由于这种导弹容易促使对方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因此全部消除这种导弹有利于核战略关系的稳定性。

但另一方面，即使美俄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将它们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各 3000 至 3500 枚。它们剩下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仍然过于庞大，这是与冷战后时期的新形势不相符合的，而且仍是对人类安全的重大威胁。

第二，为潜在的可逆性留下了某些方便之门。该条约没有规定严格的核武器销毁措施，因此存在潜在的可逆性。首先，该条约只削减部署的核武器，而未规定销毁裁减下来的核弹头。这样，卸下的成千上万的核弹头可以被保存起来，一旦需要仍可重新使用。部分老弹头虽然将被拆卸，但从中回收的核材料仍可用于再生产核弹头。其次，该条约对消除运载工具的规定很宽松。例如；该条约允许潜射弹道导弹和核潜艇通过减少载弹量而自身数目大体保持不变。这种减少载弹量而不削减运载能力的做法，为将来加载核弹头留下了方便之门。

第三，美俄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将存在一定的不对等性，这将使美国占有某种核优势。在“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中，原苏联的优势是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美国的优势是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根据该条约规定：俄罗斯将全部消除其战略核力量的支柱——SS—18 陆基重型多弹头洲际导弹。这样，美国经过改装的民兵型导弹摧毁加固目标的能力将是俄罗斯保留的 SS—25 和 SS—19 导弹的 4 倍。到 2003 年，美俄两国潜射弹道导弹和弹头数目虽大致相等，但由于美国潜射导弹的精度和可靠性较好，因此，它摧毁面目标能力和加固目标能力将分别比俄罗斯大 19% 和 30 倍。美国战略轰炸机的核弹数目也将比俄罗斯多 500 枚，摧毁面目标能力比俄高一倍。综合以上三个方面进行估算，到 2003 年以后，美国战略核武器的作战能力将超过俄罗斯，即美国摧毁面目标和加固目标的能力将分别比俄大 20% 和 8 倍。这将使美国占有对俄的某种核优势，从而有可能打破以往被视为战略稳定性重要前提的美苏（俄）核均势。

从第一颗原子弹问世至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然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的核武器，给最早拥有它而且是最大有核国家的美国带来的并非是巨大的安全感而是相反。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曾不遗余力地试图解决这一“核困境”，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讲，代表着这种努力。然而，只要核武器这种巨大毁伤力的武器在世上存在，无论制定出多么灵活的战略，多么有限的使用方案，都摆脱不了核危机、核报复和核战争的阴影。要想一劳永逸地走出这一困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部、干净、彻底地销毁一切核

武器。

